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學院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滿鐵公學堂教科書與「排日」問題（1923-1931）

Textbook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929-1931: A Case Study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Railway Zone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指導教授：周婉窈先生

Adviser: Dr. Chou, Wan-yao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June 2009



摘要

本論文根源於這樣的問題：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其真實面貌究竟為何？先行的研究已為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勾勒出大致的輪廓，但有些研究看待此問題時，容易有過強的道德評斷與目的取向，將日本方面的狀況理解為相當單純而平面化；有些研究偏重於教科書問題與外在政治、外交事件的關係，對於教科書問題教育微觀面向的探討，如教科書問題生成的具體教育環境、發起方日本方面當事者在教科書問題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上，有些薄弱。

本論文藉由研究九一八事變前滿鐵中國人小學教育也就是公學堂教育中，因使用中國教科書而引發中國有所謂「排日」教科書問題的特殊個案。試圖從政治、外交與教育多面向的角度，盡可能地理解發起方日本方面的想法，並從東北地域史的視角出發，跳脫一國中心史觀之局限性，以理解中日戰爭前的中日教科書問題。從此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教科書問題如何從教育現場的問題演變為政治、外交層面的問題，它是一個涉及層面頗廣的一個問題。

本論文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1920 年代滿鐵公學堂使用中國教科書的情況，並且解釋滿鐵公學堂為何要使用中國教科書；一為 1929 年、1931 年兩次日本方面蒐集「排日」教科書，出版《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事件，並對兩書進行了分析。兩件事情表面看似沒有關連性，不過 1929 年、1931 年《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出版與滿鐵公學堂相關人士有所關連。在長春公學堂堂長小林治郎的提案、前任滿鐵學務課長保保隆矣的支持、滿鐵公學堂各校的分工下，對中國「排日」教科書有系統收集的工作才得以落實，成為兩書出版的基礎。

不過在討論《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出版與滿鐵教育者之關連性的同時，同時也要注意兩者間的關連性並非如此地緊密，而有空隙存在。在本個案中「排日」教科書的問題因滿鐵公學堂的相關人士而起，不過事件的後續發展不一定在他們一開始的預期之中。從事後的結果來看，看似可以說本個案是滿鐵教育者、日本政治家與右派分子「緊密合作」的結果。不過筆者認為此事件並不能如此簡單地下定論，對當事者而言，是否明確地意識到此點，恐怕是很有疑問的。

以上是筆者對本論文的基本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從本論文的個案中可以看到，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有其醞釀、發展的環境，主要引起教科書問題的當事者，有其複雜的面向，需要小心留意。

關鍵字：九一八事變 後藤新平 松岡洋右 大川周明 教科書問題

目 次

壹、序論.....	1
一、問題提出.....	1
二、相關背景文獻回顧.....	3
三、研究範圍與主題.....	7
貳、滿鐵公學堂的教育環境.....	11
一、後藤新平與滿鐵.....	11
二、滿鐵附屬地.....	15
三、滿鐵公學堂的教育概況.....	18
參、滿鐵公學堂教科書使用的演變.....	27
一、九一八事變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概況.....	27
二、1923-27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情況.....	30
三、1928-31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情況.....	36
肆、滿鐵公學堂與「排日」教科書.....	43
一、1929 年的《支那排日教材集》.....	43
二、1931 年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	48
伍、《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之分析.....	53
一、兩書中所見之中國教科書問題.....	53
二、《打倒日本》中所見之中日歷史事件與近代中國.....	58
陸、結論.....	62
附錄.....	65
徵引書目.....	82
圖片出處.....	89

壹、序論

一、問題提出

「教科書問題」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中常被提起的議題。什麼是教科書問題？簡單地說，是因教科書所引起的政治、外交問題，這不僅是個教育問題，也是政治、外交的問題。近來史學研究對政治史有重新重視的趨向，與過去專注於政治事件、制度的研究不同，現在的研究取向注意政治與各領域如文化、思想間的互動。若如此，「教科書問題」或許會是一個具意義的議題。

事實上，不只是現在，在中日戰爭前中日間就有所謂的教科書問題。與現在教科書問題主要以日本中學、高中課本為中心不同，當時的教科書問題以當時中國小學所用，經官方相關教育機關審定之課本為中心，主要由日本方面引起的一連串政治、外交問題。

許多學者如丸山真男（1914-1996）都曾指出近代日本一個很大的特色是對外在環境變化相當敏感，²日本人對「巨大的他者」³中國編寫的教科書不可能不聞不問，特別是所謂的「排日」教科書。今天身處知識爆炸時代的我們已很難想像，對於1920、30年代的青少年來說，教科書影響力的巨大，這很有可能是某些人認識其家鄉以外世界的唯一方式。⁴當然我們也不能太過強調教科書的影響，當時中華民國使用的教科書，用現在的話可說是一綱多本的審定教科書，而非像日本那樣一致性的國定教科書；1929年中國學齡兒童的平均就學率不過22%，最高的遼寧省就學率是34%，⁵而這樣的數字是否能代表實際的就學狀況還很有疑問，這與當時小學就學率將近100%的日本相比，也有很大的差異。但對一些日本人來說，他們認識到教科書潛在的巨大影響力，認為中國的「排外」運動中，最惡毒的便是針對日本的反帝國主義教育，因為它與政治、經濟的「排日」相較，影響更深層，其灌輸了尚在蒙昧階段青少年「錯誤」的觀念，「想到受此等教育兒童成人後於彼我國交之影響，吾人不禁戰慄。」⁶相對於經濟上的杯葛日貨，教科書似乎更可以代表國家的意志。當中日關係開始緊張時，教科書問題也會浮上檯面。

關於中日戰爭前中日間的教科書問題大陸學界對此問題討論最多的是徐冰，有一系列

²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70），頁198-199。

³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頁78。

⁴ 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4），頁274。

⁵ 不著作人，《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傳記文學，1971），第四冊，頁169。

⁶ 東亞經濟調查局編，《支那國定排日讀本》（東京：東亞經濟調查局，1931），序頁1。

的論文，介紹清末以來中國教科書與日本的關係、民國時代廿一條要求與九一八事變前後兩次比較大的中日教科書爭議，並計劃寫與此有關的博士論文。⁷關於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討論較多的是日本學界，砂山幸雄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全面性地介紹中日戰爭前的中日教科書問題。他認為民國時代有三次比較大的教科書爭議，發生在廿一條要求、五四運動與九一八事變前後。他指出近代中國教科書的一個特色，就是時事特別是所謂的「國恥」會立刻被寫入教科書中。而對這些「排日」教科書最熱心批判的是日本軍部與在滿日人，他們常將中國的「排日」教育與愛國教育混為一談，軍部用其來正當化如九一八事變這樣的軍事行動，在滿日人則以此來對抗平日常遭遇的抗日運動威脅，以上兩者常強調「排日」教科書使「排日」運動日益高漲，而中國政府是「排日」教科書幕後的指使者；外務省的態度比較冷漠，駐中國的官員調查後常認為「排日」教科書並無想像中嚴重。⁸從砂山的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人對中國「排日」教科書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至於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可能的解釋是，他們所處立場、時間差異的問題。

另外值得介紹的是中國外交史研究者川島真（1968-）的研究。他從宏觀的角度看近代中日的教科書問題，認為從近代雙方教科書寫的發展，似乎可以發現這樣的傾向：雙方藉由貶低對方、肯定自己，來形塑自身國民的認同。以歷史教科書為例，近代日本在追求「文明開化」的目標時，除了尋找偶像——歐美國家以外，另外也以負面的對象——中國來肯定自己，在日本編輯的歷史裡頭，明顯有描述日本是成功的文明國家，中國則是負面對照的趨向。中國教科書的情況則是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很難想像有強大中國的情況下，必須強調「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認同」來喚醒中國。因此，強調喪失國權過程的中國近現代史，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研究很重要的課題。在這樣的前提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列強中涉入中國事務最深的日本，自然的成為帝國主義的樣板。「與 19 世紀末尚且嚮往日本的成功不同，在 20 世紀初期中國編輯的教科書中，日本已成為最具侵略性和沒有公理的國家。」⁹中日的歷史認識有巨大的差異，至 1930 年代幾乎無法進行理性溝通。

先行的研究已為中日戰爭前的中日教科書問題勾勒出大致的框架，本論文基本上也在先行研究的框架上繼續發展，不過這並不意味過去的研究沒有需要修正、補充的地方。徐冰與不少研究近代中日關係的大陸學者一樣，看待此問題時容易有過強的道德評斷與目的

⁷ 徐冰，〈中國近代教科書與日本〉，《日本學刊》，1998：5（北京，1998.9），頁 108-115。

徐冰，〈1914 年中日教科書紛爭論考〉，《日本學論壇》，1999：1（北京，1999.1），頁 1-7。

徐冰，〈民國時期中日教科書考略〉，《日本學刊》，2001：2（北京，2001.3），頁 125-138。

⁸ 砂山幸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特集〉戰前期教科書問題研究（2））〉《中國研究月報》，59：4（東京，2005.4），頁 8-10。

⁹ 川島真，〈中日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問題為主〉，中國研究工作坊（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舉辦），2005 年 12 月 13 日。見川島真研究室，2009 年 1 月 20 日瀏覽，網址：www.juris.hokudai.ac.jp/~shin/

取向的問題，將日本方面的狀況理解為相當單純而平面化。徐冰認為 1920、30 年代的中日教科書糾紛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為日本侵華政策服務，是有組織、有計畫，由軍方實施、駐華機構緊密配合的日本侵華戰略構想中之一環。¹⁰這樣的說法有些太武斷，如上述砂山的研究顯示，日本軍部與外務省對中國「排日」教科書的看法並不全然一致，即使 1930 年代的狀況也許符合徐冰的說法，但在 1920 年代之前，看不出日本方面對中國「排日」教科書批判是日本在華各組織「緊密配合」的結果。

這樣的問題是研究中日戰爭前的中日關係、中日教科書問題研究者很容易發生的情況。會研究中日戰爭前的中日教科書問題的研究者，通常關懷的課題是，為何當時中日關係會走向衝突？而研究教科書問題。由於已有既定的答案，即日本人是衝突的主要引起者，因而在探究衝突發生原因時，常將原因與結果間賦予強烈的因果關係，「一定是一種有計畫的行為，所以才會產生後來的衝突。」歷史的複雜性常被忽略，所謂的日本人是怎樣的人？是一種同質性高的人？同質性有多高？除了軍隊與政府，民間到底在中日教科書問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中日教科書問題與「為日本侵華政策服務」的關連性是怎樣？從一開始就很強？這些問題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砂山幸雄與川島真的研究相對來說沒有上述的問題，不過由於他們的研究比較傾向從宏觀、結構的角度，即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與外在政治、外交事件的關係。對教科書問題關於教育微觀面向的探討，如教科書問題生成的具體教育環境、當事者在教科書問題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仍顯薄弱。如同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教科書問題不只是教育問題，也是政治、外交問題。也許限於篇幅，不容許兩位研究者進行更微觀的研究，不過基於歷史研究要盡可能去理解具體人事的前提下，仍有必要去理解當事者的心境，他們所體驗、理解的世界，這樣我們才能為他們的行動，做出比較符合歷史情境的解釋。

上述對先行研究的省思，即過高的道德評價、對政治、外交與教育領域互動不夠強調是本論文問題意識的來源。本論文的問題是，在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其真實面貌究竟為何？特別是日本方面的狀況為何？是怎樣的環境造就了教科書問題？本論文便是基於這些問題而進行的研究成果。

二、相關背景文獻回顧

除前述徐冰、川島真、砂山幸雄等人的研究外，本論文還得力於許多論文的啟發，不過限於篇幅，在此僅說明對本文最有啟發的論著。由於討論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日本如何走向戰爭之路的問題，首先討論與此有關的研究。丸山真男對戰前日

¹⁰ 徐冰，〈民國時期中日教科書考略〉，頁 125-138。

本軍國主義的批判，有需要修正之處，¹¹但其對戰前日本敏銳的觀察，至今仍值得注意、介紹。丸山指出戰前特別是 1920 年代以降日本帝國政治運作的奇特性，掌握權力的上層官僚、軍人盲目而無計畫：

並且他們大都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所驅使，戰慄於失敗的恐懼而盲目向前衝。可以說他們想要戰爭，但也可以說他們想要避免戰爭。想要戰爭，卻又要避免戰爭；想避免戰爭，卻又敢於選擇戰爭之路，這是事情之實相。¹²

丸山認為除了右派份子，另一群戰爭的積極鼓吹者是由小工廠廠主、小商店老闆、小學教員、一般官吏組成的「疑似知識分子」。他們地位、生活水準雖不高，但由於日本社會對家長權威的強調，他們對其下屬如店員、勞工、學生，有著如小天皇權威的權力關係；他們的知識是片段的，但因道聽塗說，在地方上仍屬博學多聞的人，並對時事喜歡發表見解，所以稱他們為「疑似知識分子」。他們對日本的大陸發展，產生內心的共鳴：

東亞各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使他們心中起了如同是在其店舖、工作場或其支配的集團裡屬下或下輩的反抗之心理作用。因此，他們成為日華事變〔蘆溝橋事變〕或太平洋戰爭最熱烈的支持者。¹³

丸山指出了日本走向戰爭之路的盲目性與全體性。雖然不一定有直接關連，但這也是目前西方學界不只日本帝國主義研究，而是世界帝國主義研究中的重要看法。以討論日本帝國擴張與「滿洲」關連性的研究為例，Matsusaka Yoshihisa 反思日本帝國擴張的盲目性，他檢討「理性」決策的迷思，也就是認為日本帝國的擴張只是一種有計畫、處心積慮的結果。當然，日本帝國的擴張確實有其邏輯一致性，但其擴張也許不少是盲目、混亂決策下的產物，以為可以解決的問題的決策，反而是擴大問題。從在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陸軍、外務省與滿鐵的互動便可看出這樣的狀況，彼此各自為政，互相牽制又互相合作的混亂結果，使原本屬於少數激進派的陸軍反而佔了上風，使日本走上了戰爭之路。¹⁴

楊露誼 (Louise Young, 1960-) 則反思日本帝國擴張的全體性，她從全面相帝國 (total empire) 的觀念來看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全面相帝國指稱的是戰爭總動員，不只政府，帝國下的社會也在這帝國的發展中扮演著一種積極而非被動的角色。她質疑過去將日本的戰爭責任，歸咎於是少數軍人橫行之說法。以「滿洲國」的創建為例，不只是軍部、政府，

¹¹ 如橋川文三、伊藤隆的批評，橋川認為要更深入理解右翼分子內心的想法，伊藤隆則質疑「日本法西斯主義」概念適用性的問題。見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東京：講談社，2009)，頁 11-24。

¹²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70)，頁 91-92。

¹³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頁 70。

¹⁴ Yoshihisa T.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1-14.

知識份子與媒體對「滿洲」給予烏托邦式的幻想，並掀起全民的戰爭熱，將戰爭視為解決國內外問題的最佳答案。¹⁵

關於日本如何走向戰爭之路除了盲目性與全體性，西方學界還重視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概念。Peter Duus (1908-) 指出非正式帝國最初是研究者研究大英帝國時提出的概念，此概念並非萬能，但解釋十九、二十世紀列強在中國的條約體系時還算恰當。從帝國主義比較研究的觀點來看，英國與日本在中國非正式帝國有所不同，由於日本領導東亞的文明使命感「黃種人的負擔」與過度涉入的經濟利益，使得日本不像英國最終放棄了非正式帝國，反而走向正式帝國之路。¹⁶前面提到的 Matsusaka Yoshihisa 繼承了這樣的觀念，特別關注從日俄戰爭以後到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發展。他檢討過去特別是美國學界，研究的興趣集中在「滿洲國」，¹⁷太強調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走向正式帝國的轉捩點。他認為日本帝國的擴張雖然有其盲目性，但也有其一致性，如果想真正理解日本帝國擴張與「滿洲」的關連性，則必須瞭解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中國東北非正式帝國的發展。¹⁸

在討論完關於日本如何走向戰爭之路的重要研究後，接下來想討論與研究場域中國東北有關的東北地域史研究問題。近來西方與日本學界都出現以東北地域史為研究範疇的研究，Rana Mitter (1969-) 受西方中國研究重視區域研究學風影響，研究九一八後面對日本勢力，東北地方社會如何應對的問題；¹⁹西村成雄 (1944-)、小林英夫 (1943-) 與塚瀨進 (1962-) 則從戰後日本學者反省日本帝國擴張的「滿洲」研究出發，反思過去日本的研究重視日本的國家力量在東北的運作，對東北地域社會的關心相對薄弱之問題。²⁰在這些東北地域史研究者值的一提的是山室信一 (1951-)，他在關於「滿洲國」的研究中指出空間認識的重要，他提及東北廣闊大地帶給他的震撼及隨之而來的反省：「深紅夕陽落於一望無際平原的彼方，這是在日本時絕對無法體驗的廣闊感。時間感、空間感都一樣，日本

¹⁵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55-114.

¹⁶ Peter Duus, "Japan's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An Overview."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vi -xxix.

¹⁷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當我向同學們表示自己想研究 20 世紀前半中國東北的歷史時，同學們常直覺地認為我想研究「滿洲國」。對我而言，倒不會因為同學們無法理解自己的研究課題而沮喪，反而對大家為什麼想到 20 世紀前半中國東北的歷史首先就聯想到「滿洲國」這樣的想法感到好奇。

¹⁸ Yoshihisa T.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pp. 1-16.

¹⁹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 15.

²⁰ 西村成雄，〈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の課題と方法〉，《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93)，頁 1-35。小林英夫，〈〈滿洲〉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頁 56-72。

樋口秀實，〈“滿洲國史”的爭論點——同時代與後世的觀點〉，《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33-134。

的常識在這裡有可能不適用……。」²¹他認為空間認識常是歷史研究者容易忽略的地方，因此，山室看近代中國東北的問題時重視從重層的空間認識角度切入，他認為要瞭解「滿洲國」，對中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近代東亞史、近代世界史都必須要有所瞭解。²²由於歷史的機緣，使得 20 世紀上半的中國東北，雖已成為以漢人為主的地域，但蒙古人、滿人的影響力尚在，並且此地區與蘇俄、朝鮮、日本的關係也相當密切，絕對無法忽視。即使是討論中日關係，若不將其他勢力的互動放入考慮的話，將很難了解問題的整體面貌。

歸納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關於日本如何走向戰爭之路研究多元解釋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要盡量避免從單一角度、有預設立場的態度來理解事情，「對於理解這樣的事情來說，道德的辯護或非難是別的次元的問題」。²³丸山與 Matsusaka Yoshihisa 對日本帝國擴張盲目性的思考，使我們反思過去太強調日本帝國擴張是一種處心積慮行為的看法。當時的人們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正導向戰爭之路，發生戰爭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當事者明知是錯的還這麼做，在於當事者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²⁴這讓我們知道想要理解歷史，盡可能地理解當事者的想法、當事者所處的環境一事相當重要。另外，丸山的「疑似知識分子」、楊露誼的全面相帝國、Peter Duus 與 Matsusaka Yoshihisa 對非正式帝國的討論，使我們更加注意日本帝國擴張隱微的部分，並不是軍人、政治家創建的正式帝國才值得關注，非正式帝國與正式帝國間的關係也值得注意。

研究中日關係時，如何能避免單一角度、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受到山室信一重層空間認識的啟發，筆者認為研究中日衝突時，要盡可能地避免僅從國別史的視角，如中國或日本單方面的視點來看問題，因為這樣會過於強調政治上的歸屬問題與道德上的判斷問題，始終有不完備之處。比較理想的處理方式是以區域如中國東北作為主要視角，來看各種勢力、民族在此區域的互動。如同在臺灣史的研究中，曹永和（1920-）提出的「臺灣島史」的概念一般，²⁵因為某些區域空間上的特色，以區域作為研究範疇，解釋有效性比較高。在此同時，其他視角如國別史也不應該被拋棄，我們也許可以有一種重層的理解，對歷史進行區域史、國別史、多重國家關係史、世界史等互補而非互斥的理解，以增進我們對歷

²¹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2004），頁 378。キメラ為 Chimera，為西方古典神話中一種獅頭、羊身與蛇尾的怪獸，山室以此比擬滿洲國，獅頭是關東軍、羊身是天皇制國家、蛇尾是中國皇帝。

²²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頁 376-377。

²³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在まで》（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頁 33。

²⁴ 加藤陽子就從戰爭「論理」的角度來看日本近代史，她認為瞭解當時的人們如何認識戰爭是很重要的事，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們願意支持戰爭。見加藤陽子，《戰爭の日本近現代史》（東京：講談社，2002），頁 8-9。

²⁵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 445-449。

史的認識。

三、研究範圍與主題

上述文獻回顧中所涉及的概念、問題或許過於廣泛，筆者也不認為概念可以無條件地運用在本研究中，或是在本研究中有效地回答這些問題。但其確實引發了筆者進行研究的興趣，並指引了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筆者期望以多元的角度來進行研究，雖然處理的是民族主義的問題，但希望盡量能超越民族主義的框架。因此，本文想以中國東北地域史為主要視點，研究日本滿鐵的中國人小學教育中，因教科書而引發的一些問題，本論文的題目為「滿鐵公學堂教科書與「排日」問題（1923-1931）」。以下將對本文題目進行簡要的定義，說明其時空範圍、特色、局限性、格式的問題，並大致說明章節安排與使用的材料。

首先是題目的定義問題。滿鐵公學堂是 1909 年至 1937 年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其鐵道附屬地所進行的中國人小學教育，其教科書的使用相當多元，有中國、日本文部省與滿鐵自編的課本，本論文將集中於因使用中國教科書而引發的種種爭議。本論文使用的「排日」一詞，指的是日本方面有人認定中國有攻擊、污蔑日本事物的行為。事實上要清楚界定何謂「排日」行為是相當困難的，一些中國方面認定是「愛國」，呼籲自身要自立自強的行為，有時也被某些日本人認定是「排日」行為。本論文沿用當事者的用詞：「排日」，但加上引號，表示筆者並非無意識的使用此詞彙。

其次是本研究的時間、空間範疇。選擇以 1923 到 1931 年為研究的時間，是由於此時在中國東北中日關係進入新的階段，中國民族主義日漸高漲，日本相較溫和的對應並未取得明顯的效果。1923 年發生了收回旅順、大連租借地的運動，1924 年在東北則出現收回教育權的運動；因應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滿鐵公學堂教育在 1923 到 1931 年，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應對，但仍無法平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不滿，滿鐵教育者的頓挫與不滿逐漸醞釀。這樣的頓挫與不滿，是最後日本方面以武力解決問題的一個根源。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正式控制中國東北，則是另一番局面。

本文既然以中國東北地域史為主要視點，有必要簡單地界定「東北」及其他相關地名如「滿洲」的意涵。「東北」依現在的意涵指的是中國東北部，也就是遼寧、吉林與黑龍江三省之地。在清代，這片區域常被稱為「關外」或「關東」，關外與關東原意指的是山海關之外或山海關以東的地區，理論上指的不止是現在東北三省的地域。不過隨著時間演變，關外與關東指稱的範圍越來越接近現在的東北地區，因此俄國人在 1898 年租借遼東半島時，便將其租借地稱為關東省，日本人也加以沿用，但改稱為關東州，才有往後關東軍這樣的名稱出現。1907 年奉天（遼寧省的舊稱）、吉林與黑龍江正式建省後，逐漸以東

北、東三省來稱呼這區域，而外國人則多稱這裡為滿洲。滿洲一詞在清末之前主要是部族名稱，清末時逐漸成為地區名稱，可與東北、東三省互用，由於 1930 年代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滿洲」一詞遂帶有日本侵略中國的特殊含意。另外，滿洲、滿州常為人混淆，但考量到中國王朝正統性的問題，自許為水德的清朝稱其部族為滿洲，滿洲一詞應為比較正確之稱呼。²⁶

日本使用的「滿洲」一詞還引伸出南、北滿與「滿蒙」的概念。原來根據日本與俄國在日俄戰爭後三次私自劃分勢力範圍的密約，依哈爾濱與長春之間的界線將「滿洲」分為南北兩部，依通過北京的經線將內蒙古分為東西兩部，南滿洲與東內蒙古，即民國時期的察哈爾省之一部與熱河省同屬日本勢力範圍的地區，合稱為「滿蒙」。中國方面當然不會承認這樣概念，因此才有 1915 年日本政府提出廿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上述地區擁有特別利權的事情。²⁷無論「滿洲」、「南滿」這樣的概是否帶有侵略色彩的意涵，在從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之間的東北還算是有效的概念。因此本研究雖然從東北地域史的立場出發，但地域上還是比較偏重於「南滿」地區，也就是吉林省南部與奉天省這樣受日本勢力影響較大的地區，特別是從大連到長春南滿鐵路沿線的諸城市，這裡是當時中日勢力交會的最前線。

關於本研究的特色及其局限性問題。本研究的特色是：這是個「邊界」的研究。在議題上，它是外交、政治與教育交界的教科書問題；在空間上，想處理的滿鐵公學堂位處的滿鐵附屬地，是中日勢力交會的前線；在時間上，1920、30 年代之交是近代中日關係產生關鍵性變化的年代。可以說這是個特定中的特定研究，將時空限定在很短的時間、很小的空間，研究約 10 所左右的小學。因此本論文無意也沒有能力去回答關於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的整體樣貌。不過，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處理的範圍雖然很特定，但由於其「邊界」的特性，或許可以比較尖銳地反映問題的癥結，筆者抱持著如此的想法而進行研究。

目前研究中國東北的中日關係之學者主要以中國大陸、日本與美國的學者居多。作為一位來自臺灣的研究者，可以從兩種途徑切入中國東北的中日關係研究。一是中國近現代史，一是與臺灣史相關之比較殖民史、日本史的角度切入。筆者以為中國東北與臺灣自然有許多相異處，但也有一些相同處，如在二十世紀上半，同為漢人占優勢的區域，同樣有

²⁶ 見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1（臺北，2003.6），頁 37-38。以下引用論文名稱有「滿州」者，本文並不做更動，但請讀者留意。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增補版》，頁 320-321。

²⁷ 即使經過上述的說明，其實日本人使用的「滿蒙」一詞還是個很模糊、籠統的概念，它所指稱的區域會隨時間演變而擴大，最後可以指整個「滿洲」與蒙古地區。如「滿洲國」事實上不只包括原本「滿洲」概念指稱的東三省，還包含熱河省。1930 年代以降，特別是有擴張思想的日本人偏好使用「滿蒙」這樣更曖昧不明的概念來取代「滿洲」的概念。見加藤陽子，《滿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東京：岩波書店，2007），頁 19-28。

爲日本殖民的經驗。臺灣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國東北的中日關係課題是可以發揮自身特色，從中國近現代史與比較殖民史的角度切入，跳脫中國大陸與日本學者固有的框架，如批判或反省戰爭責任問題。當然，這樣的研究途徑並非完美無缺，若不深入研究，對比較殖民史、日本史與中國近現代史都有一定程度理解的話，容易淪爲泛泛之談。本論文比較偏重從比較殖民史的角度切入問題，使用的資料也多爲日文資料，並不意味筆者認定中國近現代史的知識不重要，而是筆者認爲自身對比較殖民史的理解太過缺乏，而想先從此下手。雖然也盡力注意從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角度切入，但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來說，或許還是太過貧乏、不足。本論文的局限性，請各位讀者留意。

關於時間格式與用語的問題。由於本文牽涉到許多中日紀年的問題，爲求簡便，本文紀年統一以西元爲主。另外用語的問題，在不影響理解的前提下，本文儘量使用依照當時的稱呼。專有名詞會加上括弧，以提醒讀者；另外，關於一些有價值判斷的用語，如「支那」²⁸、「排日」與「滿洲」則加以括弧，表示筆者並非無意識地使用這些用語。

關於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問題。除了本部分，以下論文的貳到伍部分，第貳、參部分將介紹滿鐵公學堂之教育環境，與滿鐵公學因應此環境而使用教科書的狀況。包括了滿鐵此鐵路公司爲何會進行中國人教育、公學堂所處之滿鐵附屬地之特色與滿鐵公學堂之教育概況。另外，也說明了 1920 年代以 1928 年東北易幟爲分期，1923 至 1928 年、1929 至 1931 年滿鐵公學堂使用教科書的狀況，並說明當時中日教科書問題的基本狀況。第肆、伍部分將說明滿鐵教育者如何收集「排日」教科書，並對其所出版的書籍內容進行分析。包括了 1929 年因應京都太平洋會議而出版的《支那排日教材集》與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前夕出版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看這些書如何理解中國教科書問題、近代中日歷史事件與對近代中國之認識。

最後，關於本研究使用資料的問題。本論文由於比較偏重從比較殖民史的角度切入，研究的是日本人設立的中國人小學即滿鐵公學堂，使用了相當多的日文材料。其中大量使用的是最近臺大圖書館購入的 23 冊《「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這是本論文的基礎資料。另外，藉由申請本系獎勵研究生海外研究計畫的機會，在長春市立圖書館、遼寧省立圖書館與大連市立圖書館得以收集到《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研究史》、《奉天教育雜誌》、《遼寧教育史志資料》、《南滿教育》與《滿鐵教育たより》等對本論文來說是相當珍貴的資料。本論文雖然與中國教科書有關，但在當時中國教科書版本眾多且保存不易的情況，本論文並未大量使用中國教科書的資料。使用大量日文資料，會不會影響筆者理解

²⁸ 「支那」一詞在日本，原本是十七世紀漢學學者避免使用「中國」這樣本身具有文化優越性的用語而出現的名稱，當時還是一個比較中立的詞彙，直到 20 世紀上半才逐漸帶有輕蔑的意味。見 Steve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3-4.

事件的觀點？筆者自然想避免這樣的問題，但若仍有問題，還請讀者不吝指正。



貳、滿鐵公學堂的教育環境

本部分試圖對九一八事變前中國東北滿鐵附屬地教科書問題的背景進行必要程度的瞭解。首先，在後藤新平與滿鐵部分，滿鐵這公司有怎樣的特色？這樣的特色與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有怎樣的關係？其次，在滿鐵附屬地方面，什麼是滿鐵附屬地？在法的定位為何？它有何特點？再者，滿鐵公學堂的教育概況方面，在學制、師資、學生與家長上是怎樣的狀況？

一、後藤新平與滿鐵

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05）中擊敗俄國，藉由與俄國的和約，日本繼受了俄國在「南滿」的利權，包括了旅順、大連的租借地及「長春、旅順港間之鐵路及其一切之支線並其附屬一切之權利、特權及財產」。²⁹又在與中國的善後條約中，除了使中國承認上述和約外，還另外取得從安東（今丹東）到奉天（今瀋陽）鐵路的租借權。³⁰日本因此在1906年成立關東都督府來管理關東州租借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來管理南滿洲鐵路附屬地，正式展開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擴張行動。

滿鐵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滿洲經營」的實質重心，滿鐵並非一般的公司，它是個國策公司，其本質是政治性的。³¹與其說滿鐵是半官半民的公司，不如說它是日本自己經營的國策公司，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俄國東清鐵道公司的綜合體。³²滿鐵具備了國家的性格：的確，「滿鐵」是一個國家。它不僅對生活在滿洲人們的生活方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它如實地反映著國家的理想、意志和期望。當時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整合性和矛盾，幾乎都以相似的形式在滿鐵被表現出來。³³

²⁹ 1896年俄國與中國達成協定，以民辦的東省鐵路公司名義建立橫越中國東北通往海參崴之東清鐵路。1898年俄國取得東清鐵路南部開設支線的權利與旅順、大連租借25年（1898-1923）的權利，東清鐵路在民國後改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中東路。〈日露講和條約（1905.9.25）〉，《日本外交年表暨主要文書》（東京：外務省，1988），上冊，頁245-249。

³⁰ 安奉鐵路前身為日俄戰爭時日軍為運兵而建造之輕便鐵路，中日約定日本擁有鐵路正式開通後15年之租借權（1908-1923）。〈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1905.12.22）〉、〈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1905.12.22）〉，《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53），頁167-169。

³¹ 加藤聖文指出，一些特別是日本的研究者僅從一般的公司史的角度來理解滿鐵，有很大的盲點。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会社」の全貌》』（東京：講談社，2006），頁13-14。

³² 日本政府在滿鐵設立前，曾派人考察英國東印度公司，欲以英國東印度公司作為滿鐵的範本；不過滿鐵在實踐上，則頗受俄國東清鐵道公司影響，如鐵路附屬地在管理上雖然有所不同，但仍繼承了這樣的名稱。這樣的觀念得力於島田俊彥一書的啟發。島田俊彥，『《關東軍》』（東京：講談社，2005），頁26-27。

³³ 草柳大藏，『《實錄滿鉄調査部》』（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上冊，頁13。

滿鐵之所以成立，來自於時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成為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1857-1929）的構想。雖然研究者已指出過去的文獻，常對後藤對滿鐵的影響有過高評價的問題，³⁴即使如此，後藤對滿鐵的影響還是不容忽視。後藤對滿鐵最主要的影響，不在於滿鐵此公司日常運作的層面上，憑單一個人要完全左右擁有數萬名成員、存在近四十年公司之運作是不可能的事。後藤的影響在於形塑滿鐵作為國策公司定位，理念層面的問題。

當然，作為一半官半民性質公司的滿鐵在經營有兩個面向，一是使日本國家的勢力在「滿洲」發展作為國策公司的面向，一是確保公司自身發展、利潤作為私營公司的面向。在實際的運作中，在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狀況，兩個目標有時會互相衝突，在某些時間點，滿鐵作為國策公司的角色比較薄弱，如 1920 年代受到日本本國政黨政治的影響，滿鐵常成為政黨維持政治資金、拉攏支持者的重要資源，³⁵此時滿鐵作為國策公司角色比較弱。但大體來說，滿鐵作為國策公司的角色，始終存在，這是後藤在創立滿鐵之初就已設定的目標。

後藤新平在〈滿洲經營策梗概〉中認為日俄戰後日本「滿洲經營」的要訣為：「陽為經營鐵路，陰為實行各種政治發展措施。」³⁶會有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後藤對鐵路「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 的信念，他相信技術對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性，鐵路代表著一種優越文明的展現。³⁷生活在汽車、飛機發達時代的我們，很難想像 20 世紀初鐵路的力量，鐵路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還是一種潛藏的軍事力量與文明的象徵。搭乘火車經南滿、西伯利亞鐵路至歐洲是當時從日本到歐洲最快的方式，³⁸在後藤的構想中，滿鐵是日本與西方文明接軌的大動脈，他認為滿鐵對日本國家發展相當重要。³⁹

後藤的想法另一方面則與當時日本的國內外局勢有關，日本雖然戰勝俄國，但贏的很勉強，若在中國東北進行正式的殖民，戰後財政困難的狀況不容許，英美等國也不會同意，更重要的這樣會強化俄國的敵對感。⁴⁰因此，後藤認為利用鐵路公司對「滿洲」進行非正

³⁴ 最先對此進行質疑的學者是 Matsusaka Yoshihisa，他認為過去對滿鐵的相關資料，為了合理化滿鐵的存在，常對後藤新平對滿鐵的影響有過高的評價。這種論述的代表著作是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寬於 1940 年代出版的《滿鐵外史》。見小林英夫，《滿鉄：知の集団の誕生と死》(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41。小林英夫，《〈滿洲〉の歴史》，頁 77-79。

³⁵ 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会社」の全貌》，頁 50-67。

³⁶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勁草書房，1965)，第二冊，頁 651。

³⁷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p. 394.

³⁸ 即使到 1930 年代，由海路從日本到巴黎仍需三個月的時間，而由陸路從日本到巴黎則需半個月的時間。而乘船轉接西伯利亞鐵路到歐洲則約需三星期。小林英夫，《滿州と自民党》，(東京：新潮社，2005)，頁 52。

³⁹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 94-103。

⁴⁰ 當時，日本與俄國的軍部都有一種看法，認為樸資茅斯條約的簽訂不過是暫時的休戰而已。見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上) (臺北，1986.6)，頁 385。

式的經營最符合當時日本國家利益。



圖一：滿鐵標誌

(大連市中山區魯迅路水溝蓋)。

M字為滿鐵之英文縮寫，中間類似 I 字者代表鐵軌。

由於當時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正擔任滿洲軍總參謀長，是日本陸軍作戰的實際指揮者，聲勢正如日中天，而使後藤新平的意見有實踐的可能。1906年11月滿鐵正式成立，兒玉原本就屬意後藤擔任滿鐵總裁，起初後藤不願接任，原因是「殖民統治無核心」，也就是當時未確立以滿鐵作為「滿洲經營」中心的體制。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的「滿洲經營」一直缺乏一致性，是關東廳、關東軍、滿鐵與外務省領事館的四頭政治。在日俄戰爭後日本政府內各種勢力角力下的情況下，以伊藤博文（1841-1909）為首的政府高層雖然希望以滿鐵作為「滿洲經營」實質的中心，但也必須向陸軍妥協，以代表陸軍勢力的關東都督府作為滿鐵的監督機關，造成了「滿洲經營」形式上的中心關東都督府與實質上的中心滿鐵互相爭奪領導地位的狀況。此現象到了1919年以後，由於基於文武分離原則的官制改革，將關東都督府分為文治官廳關東廳、專門的軍事組織關東軍後，加上原本存在的外務省領事館，「滿洲經營」多頭馬車的狀況更加複雜。⁴¹因此，後藤新平對就任滿鐵總裁一事相當猶豫。不過，因兒玉的猝逝而使事情的發展急轉直下，後藤在取得政府高層以滿鐵作為「滿洲經營」的實質中心之承諾後，同意接任滿鐵總裁。不過他所擔心的「殖民統治無核心」問題，事實上始終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42

後藤新平擔任滿鐵總裁的時間只有一年八個月（1906.11-1908.7），在職期間還低於滿鐵首腦的平均，不過他還是影響滿鐵最深的一位總裁。⁴³筆者認為他對滿鐵的影響主要有

⁴¹ 日本在「滿洲」各機關互相競合的結果，造成了有軍事實力的關東軍放棄協調，以自己的方式發動九一八事變來解決「滿洲問題」。1933、34年，藉由改組滿鐵，並且以關東軍司令兼任日本駐「滿洲國」全權大使與關東廳長官「三位一體」的方式，解決了多頭統治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滿洲經營」可說是關東軍獨大的一元統治時期。矢內原忠雄，《滿洲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4），頁32-51。岡部牧夫，《滿州國》（東京：講談社，2007），頁73-75。

⁴²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頁83-87。

⁴³ 滿鐵的首腦在1917-1919年間稱為理事長，1919-29年間稱為社長，其餘時間稱為總裁，滿鐵39年（1906-45）

兩點，一是「文裝的武備」、一是「理想性」。「文裝的武備」一詞是後藤常用的話語，是他對於「滿洲經營」的理念，不過此話語的意義隨時間演變而有所不同。起初「文裝的武備」是相對於「武裝的文弱」而言的，也就是與其在滿洲駐紮大量的軍隊，造成日本負擔弱化國家，不如以非軍事的設施來增強廣義的軍事力量，如建設有寬廣走道的醫院，以便在戰時收納傷兵。不過到後來後藤「文裝的武備」觀超越狹義的軍事觀點，而具有廣義的安全保障意義，也就是藉由使「滿洲文明化」以獲取當地人的支持，至少消除其反感。⁴⁴對不少日本人來說，「滿洲文明化」是日本向中國與西方列強證明日本式近代化之價值的機會，證明日本具備可以在中國東北這樣國際競爭環境中發展的能力。⁴⁵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後藤新平的「文裝的武備」或許是最狡猾的帝國主義。不過，如果與後來關東軍相比的話，還不失為一種穩健的作法。後藤將滿鐵視為實踐其「文裝的武備」觀的機關，因此作為一鐵路公司的滿鐵，相當重視與鐵路事業沒有直接關係的學校、醫院、調查事業。「文裝的武備」可說是滿鐵經營的基調，中國人教育便是後藤「文裝的武備」觀之實踐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因為日本沒有必要一定要在鐵路附屬地進行中國人教育，如俄國在中東鐵路附屬地就沒有進行中國人教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後藤的「滿洲文明化」並非僅是一種高遠的理想，而還有冷靜的計算，冷靜的計算包含了對經費、各國觀感的考量。他在〈滿鐵總裁就職情由書〉中認為對殖民教育不可操之過急，不可斷然施行與日本一致的同化式教育，這是他在臺灣任官時所理解到的事情，在「滿洲」這種不屬於日本領土的地方更應如此。⁴⁶後藤在臺灣時修正了伊澤修二（1851-1917）傾向同化教育的規劃，對公學校的設置採取謹慎的態度。⁴⁷我們之後將看到滿鐵並未在其附屬地普設公學堂，公學堂相對來說並不採取同化主義的教育方針。從結果來看，滿鐵在中國人教育的舉措，相當程度地符合後藤的殖民教育觀。

後藤新平對滿鐵的另一個影響則是「理想性」。我們不能說沒有後藤，滿鐵社員就沒有理想性，應該說滿鐵社員的理想性因為後藤的緣故，更被強化了。後藤新平將滿鐵視為「滿洲經營」中心的想法、重視有實際能力人才的理念，使得滿鐵社員總有著「是我們在建設著滿洲」的自負心，⁴⁸這樣的自負心反映在滿鐵的社歌上：

間有 17 位領導者。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国策会社」の全貌》，頁 244-249。

⁴⁴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頁 94-103。

⁴⁵ Kenichiro Hirano (平野健一郎),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2: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 (Cambridge, MA: Thesis (Ph.D.)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p. 4-6.

⁴⁶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草稿)》(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學務課，1937)，頁 207-208。《「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⁴⁷ Patricia E.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44.

⁴⁸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冊，頁 224-225。

從東方 有道光來了 承載著光明 在東亞的土地上 是使者的我等
我等的使命 看吧 如北斗之星的顯著 閃耀著
曠野 曠野 綿延萬里的曠野⁴⁹

這種將中國東北視為曠野的想法，筆者稱之為「曠野意識」。對不少滿鐵年輕社員來說，「滿洲永遠是張白紙」，幻想在此創造國家、打造沒有剝削的社會或「民族協和」的理想。⁵⁰我們不能說這樣的意識僅是一種侵略者自圓其說的想法，而不具任何善意。但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想法確實太過天真而不切實際，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主觀的善意」。⁵¹「曠野意識」最大而根本的問題是，有意、無意地忽視同時居住於中國東北兩三千萬中國人。之後我們將看到這樣「主觀的善意」將會造成怎樣的問題。

二、滿鐵附屬地

由於滿鐵公學堂位於滿鐵附屬地，我們必須對滿鐵附屬地有一基本的理解。滿鐵附屬地的全名是南滿洲鐵道附屬地，是從 1906 年滿鐵成立至 1937 年將附屬地行政權交還與滿洲國的這段時間，⁵²包含了從大連至長春的南滿線、從奉天至安東的安奉線及旅順線、營口線等支線鐵路沿線，由滿鐵管理的鐵路與市街用地。日俄戰爭後，日本從俄國手中繼承的鐵路附屬地面積原來只有 149.7 平方公里，後來經過藉由收買等方式，鐵路附屬地不斷擴大，到 1936 年底其總面積約為 524 平方公里，⁵³在面積約 110 萬平方公里的中國東北中幾乎可說微不足道。人口在 1930 年底，有日本人 111,514 人與中國人 254,593 人，在當時中國東北近三千萬的人口中，也是少之又少。⁵⁴不過其所在位置貫穿了中國東北南部的重要城市，經濟、戰略的重要性頗高，不容小覷。

滿鐵之所以得以管理這些地區，可追溯到 1896 年俄國開通中東鐵路而與清朝訂立的條約。在中文的相關記載為「凡該公司建造、經營、防護鐵路所必需之地，又於鐵路附近開採沙土、石塊、石灰等項所需之地，……凡該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納稅，由該公司一手經理。」⁵⁵在清政府的認知中，該條可能僅是表示這些土地可免稅之意。但同條約之法文版

⁴⁹ 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会社」の全貌》，頁 8-9。想聽滿鐵社歌的朋友可上 youtube 聆聽，感謝洪紹洋學長提供此訊息。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_6stBhR5A&feature=related 2009 年 2 月 22 日瀏覽。

⁵⁰ 草柳大藏，《實錄滿鉄調査部》，上冊，頁 70。

⁵¹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頁 9-14。

⁵² 1937 年「滿洲國」收回治外法權一事，實質上意味著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控制更加穩固。維持滿鐵特殊公司的地位，對關東軍進行對蘇戰爭的準備，反而是種阻礙。岡部牧夫，《滿州國》，頁 95-98。

⁵³ 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卷 12，頁 301-302、305。

⁵⁴ 松本豐三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8），頁 2085。

⁵⁵ 〈東省中俄合辦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6.9.2）〉，《中外條約彙編》，頁 351-353。

相關記載卻為「該公司於該區域有絕對的排他的管理權」之意，俄人利用此條加以寬廣解釋、認定，宣稱擁有鐵路附屬地並對其有「絕對的排他的行政權」，並以此行使司法、警察、駐軍、課稅與教育權。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鐵路附屬地這樣的概念是俄國在中國東北所創造，並為後來的日本繼承，世界其他地區並沒有一樣的情況。⁵⁷鐵路附屬地的法律的地位究竟為何？算不算日本的領土？這個問題相當複雜，眾說紛紜。在說明這個問題，得先說明什麼是租界、租借地。租界本身就是一個極複雜的概念，如果勉強給予定義的話是：「列強在中國等國的通商口岸開闢、經營的居留、貿易區域。其特點是外人侵奪了當地的行政管理權及一些國家主權」，⁵⁸一般來說，租界的主權仍屬於被租國，列強取得的是該土地的永租權，並可擁有一般的行政權，如教育、土木、警察權等權利，但並不擁有完全的主權，如居住於租界中國人之司法、收稅權。租借地是「列強出於軍事目的向弱小國家租借的大片戰略用地」。⁵⁹租借地與租界的不同處在於，租借地的面積比較大，租借國在租借期間，實質上可以行使等同領土的統治，但租借地的主權仍在被租借國手上，理論上期滿就應歸還於被租借國。⁶⁰由上可知，列強在租借地所進行的統治，會比租界更趨向列強本國的統治，只是兩者理論上都不能被視為是列強的領土。

若從上面的定義考慮到實質的作為來看，俄國將鐵路附屬地視為租借地，因為俄國對鐵路附屬地的中國人收稅並進行司法審判，並實施同化主義原則的教育；而日本則將鐵路附屬地大致視為租借地與租界之間，與租借地關東州採取略有不同的統治方式，如與本文有關的對中國人兒童之教育。不過滿鐵附屬地的地位還是與租界不同，它在日本官方的認定中是「外地」，屬於「準領土」。⁶¹滿鐵附屬地的教育、土木與衛生等地方行政由滿鐵負

⁵⁶ 此句法文為“La société aura le droit absolu et exclusif de l'administration des ses terrains”，有「絕對的排他的行政權」之意。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東京：外務省，1966），卷12，頁302。

⁵⁷ 與鐵路附屬地勉強類似的例子，大概只有德國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內建造的巴格達鐵路，德國擁有鐵路兩側20公里內礦山採掘權與鐵路附近的森林採伐權。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卷12，頁309。

⁵⁸ 我們一般指的租界事實上包含了使館區、外國兵營、外國人墓地、外國人居留地、公共通商場、避暑地等性質各異的區域。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379-385。

⁵⁹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309。

⁶⁰ 由於羅馬法99年的期間有永久的意味，在不少在滿日人眼中，租借99年的關東州是個「不還也沒有關係」的地方。山室信一，《日露戦争の世纪——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界》（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60。松原一枝，《幻の大連》（東京：新潮社，2008），頁24。

⁶¹ 1890年明治憲法施行時日本已有的領土為，本州、四國、九州與北海道四大島，及千島、沖繩、小笠原等列島，以上區域被稱為「內地」，1890年以後增加的殖民地被稱為「外地」（1905年獲得的庫頁島南部地區「樺太」在1943年被納為「內地」）。「外地」是否就是日本帝國的領土？當時日本法律界也為此爭論不已，不過一般的見解是「外地」是領土，否則至少也是一種「準領土」，如關東州。山本有造，《「滿洲國」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頁3-5。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卷1，頁1-2。

責，並徵收「維持修繕費」，⁶²受關東都督府、關東廳監督；其他的行政如警察、通信則由關東都督府、關東廳負責，軍事則由關東都督府、關東軍負責；司法則由各地領事館依治外法權負責管轄附屬地內的日本人。⁶³

滿鐵附屬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理位置特殊，各附屬地差異性大且深受中國影響。滿鐵學務課長保保隆矣（1883-1960）形容附屬地如同日式庭園之庭石般點狀的存在，又如大海的小舟，很難不得不受周圍波動。⁶⁴滿鐵附屬地散落於從大連到長春約 700 公里的鐵路沿線上，從外人的眼裡這都是中國東北，但對當地人來說，大連與長春在自然與人文景觀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對長春人來說，大連或許是「溫暖」的，因為那邊一月均溫還有零下五度，而非長春的零下十七度。⁶⁵各附屬地所在的地區差異性也很大，有因鐵路開通才興起的城市如公主嶺、瓦房店，也有老城市如奉天、遼陽；有工業城市如撫順，也有商業城市如長春、奉天，也有農業城鎮如熊岳城；有的附屬地如松樹 1930 年代中期人口不過兩千餘人，也有附屬地如奉天有人口近九萬人。滿鐵附屬地在理論上仍屬中國領土、各地差異性大且深受中國影響等特色，是理解滿鐵公學堂教育很重要的一個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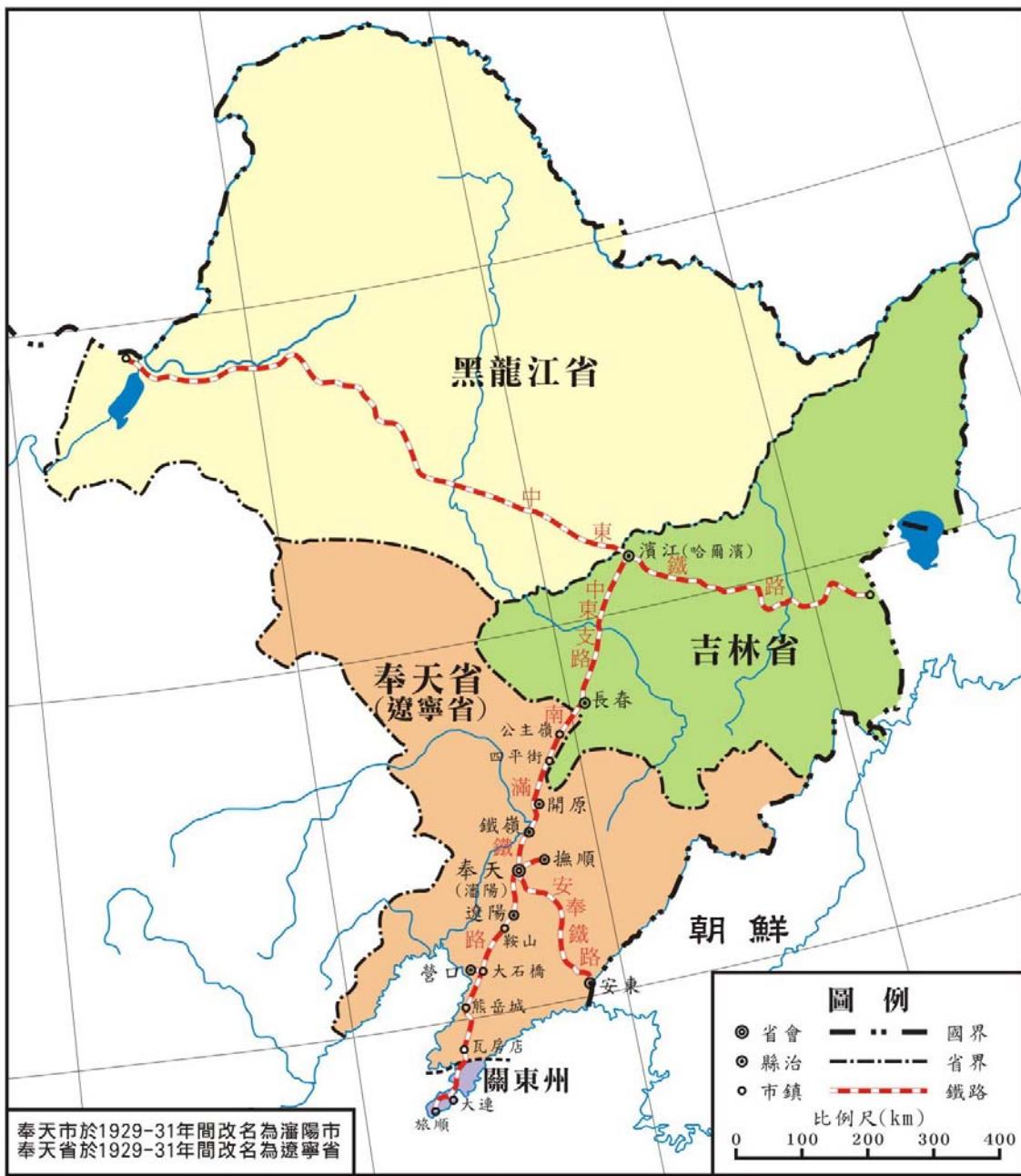
圖二：1930 年代的奉天附屬地
春日町通り（今瀋陽市太原街）

⁶² 此為為維持地方行政所徵收之費用，理論上不具國稅之性質。因此滿鐵附屬地居住之中國人曾抱怨，被徵收中國方面的國稅及滿鐵附屬地的「維持修繕費」是雙重壓榨。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卷 12，頁 319-21、329-330。

⁶³ 關於司法案件審理，附屬地內中國人理論上由中國法庭管理，但由於附屬地內並未設置中國法庭，實際上由日本法庭管理。程維榮，《近代東北鐵路附屬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8），頁 181-182。

⁶⁴ 保々隆矣，〈滿洲の教育〉，《教育科學》（東京：岩波書店，1931），第 10 冊，頁 23-24。

⁶⁵ 塚瀬進，《滿洲の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57。關東長官官房文書課，《關東廳要覽》（大連：關東廳，1932），頁 19-20。



圖三：九一八前中國東北要圖

三、滿鐵公學堂的教育概況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初等教育，與其在中國東北的行政一樣，多元而不統一。依主管者可分為三類：滿鐵、關東廳與外務省領事館所管的學校；依民族則大致可分為三類：日本人的小學校、朝鮮人的普通學校與中國人的公學堂。⁶⁶

⁶⁶ 1931年以前，日本在中國對中國人進行教育的情況，還有1914-22年日本占領下的山東膠州灣地區。膠州

表一：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初等教育（1925年）

民族 主管者	日本人		中國人		朝鮮人	
	名稱	校數	名稱	校數	名稱	校數
關東廳	小學校	18	公學堂 普通學堂 書房	10 107 207		
滿鐵	小學校	27	公學堂 補助學校	10 6		
領事館	小學校	5			普通學校 書塾	371 12

資料出處：高橋嶺泉，《滿鐵地方行政史》，頁 569-571。

由滿鐵主管的中國人初等教育包括了公學堂與補助學校。其中，滿鐵附屬地公學堂在 1928 年有 10 所公學堂，教員 92 名，學生 2,982 名，年度經費 184,944 日圓；⁶⁷補助學校為非滿鐵直接經營，但支付部分經費並派遣教師的學校，在 1926 年有 6 所學校，職員 22 人，學生 732 人。⁶⁸在滿鐵附屬地內還有中國人自設的書房，在 1932 年有 74 所，學生 1,834 人。⁶⁹由於補助學校與其他中國人學校與滿鐵的關係較淡薄，且相關資料也很缺乏，本文對滿鐵中國人初等教育教科書問題的研究將以公學堂使用的教科書為主。

如前所述，滿鐵公學堂是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的具體實踐。滿鐵的教育者也明確地意識到滿鐵中國人教育與臺灣、朝鮮的殖民教育不同，不但是異民族，而且還是異國民的教育。⁷⁰1909 年的〈蓋平公學堂規則〉中規定附屬地公學堂教育的目標是：「公學堂以教育附屬地支那子弟，而施行德育、授與實學，成為有用之良民為主旨。」⁷¹〈蓋平公學堂規則〉以 1908 年第一次修正〈關東州公學堂規則〉為範本，第一次修正〈關東州公學堂規則〉說明關東州公學堂的教育目標是：「公學堂以留意兒童身體之發達、教授日本語、施行德育、授與其生活日常普通之知識技能為主旨。」⁷²比較兩者主要的差異點在於〈蓋平公學堂規則〉特別強調教育的對象為「支那子弟」，沒有「教授日本語」而多了「有用之良民」這種模糊的文字，推測可能是避免中國方面的反感。

灣地區共有 37 所公學堂，教育方針承襲德國，除日語外，學科大致與中國相同，經費由守備軍司令部負責，1922 年為中國收回。蔡杏芬，《抗戰前十年中國的小學教育：魯青地區個案研究，1928-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15-18。

⁶⁷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柏書房，2000），第二卷，頁 84。

⁶⁸ 補助學校有海城東語學堂、私立鞍山公學堂、遼陽日語學堂、奉天外國語學校、吉林中國同文商業學校、安東中日懇親學堂等六所。見高橋嶺泉，《滿鐵地方行政史》（大連：滿蒙事情調查會，1926），頁 850。

⁶⁹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165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⁷⁰ 法貴慶次郎，〈滿鐵在職當時〉，《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學務課，1937），頁 16-1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⁷¹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24。

⁷²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19-28。

前面的因素，加上滿鐵附屬地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滿鐵中國人初等教育在實踐上，不止與俄國中東鐵路附屬地小學不同；與理論上同為異民族、異國民的關東州教育也有所不同。特別在 1920 年代，它採取「現地適應主義」的方針，各校的差異性很大。以下將從滿鐵公學堂的設置、學制、經費、師資、學生、家庭背景與學習情況等面向簡要地說明其實際狀況。

表二：滿鐵公學堂一覽表

學校	創立時間	備註	學校	創立時間	備註
蓋平公學堂	1909.6		四平街公學堂	1914.6	
遼陽公學堂	1912.4	1924 年廢校	公主嶺公學堂	1916.4	
長春公學堂	1912.11		奉天公學堂	1919.4	
瓦房店公學堂	1913.5		松樹公學堂	1920.4	
開原公學堂	1914.3	無高等科	撫順公學堂	1920.4	
熊岳城公學堂	1914.4	無高等科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9-270。

根據滿鐵教育者的看法，滿鐵公學堂的歷史可分為三期，分別為 1909-23 年的建設期、1924-31 年的「受難」期與 1932-37 年的擴充期。⁷³ 滿鐵公學堂以 1909 年創立的蓋平公學堂為開端，到 1920 年間陸續成立 11 所公學堂。部分公學堂如熊岳城、開原、長春公學堂的前身是日本人小學校之中國人特別學級，獨立設為公學堂意味著滿鐵中國人、日本人二元教育的確立。此點與俄國中東鐵路小學就有很大的不同，中東路小學都是俄式小學，中國人理論上也可以進入俄式小學就學，但由於俄式小學教學使用俄語，語言上的障礙，使得俄式小學幾乎都是俄國人兒童在就讀。直到 1923 年中國方面部分收回中東路後，才在中東鐵路沿線一帶大量設置中國人就讀的學校。⁷⁴

在學制部分，滿鐵公學堂深受中國學制影響。與關東州中國人教育相較（詳見附錄表一至三），滿鐵 1909 年的〈蓋平公學堂規則〉雖然修業年限為四至六年，與 1910 年中國四至八年的學制不同，不過授課科目中包含了清末高等小學堂擁有的讀經、講經學科，而同時期關東州的公學堂並無此科目。1914 年頒布的〈附屬地公學堂規則〉，雖然依舊使用公學堂而非中華民國初等、高等小學的名稱，但學制與中國學制相同，同樣為初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與當時關東州公學堂初等科四年、高等科二年，偏向日本方面的學制也有所不同。1923 年頒布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公學堂規則〉，在初等科一二年級停止教授日

⁷³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編《公學校日語學堂教育の實際》（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初等教育研究會，1937），頁 2。《「満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九冊。

⁷⁴ 一次大戰後隨著帝俄瓦解，俄國在中東鐵路影響力驟減，1924 年的中俄協定與奉俄協定確立了中東鐵路由中俄共管的原則，1926 年 8 月形式上收回中東鐵路的教育權，但實質上俄方仍有極大實權。雷殷，《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哈爾濱市國際協報館，1929），頁 57-58。水野明（李明）著・鄭樸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241-286。

本語，另外在學制上也隨 1922 年中華民國施行新學制而調整為初級四年、高級二年。而同時的關東州並沒有在初等科一二年級停止教授日本語，而僅是減少日本語教授時數。⁷⁵

在經費方面，滿鐵全體教育經費約 1/3 來自滿鐵附屬地居民繳納之地方費，約 2/3 則來自滿鐵會社補助。以 1922-24 年度為例，公學堂經費不過滿鐵全體教育經費的 6%-8%，而小學校是 30%-34%，因此，當時的滿鐵教育者認為中國人教育可說是連九牛一毛的程度都不到的特別教育。⁷⁶1920 年代滿鐵附屬地內中國人的數量大約是日本人的兩倍，但小學校的校數卻將近是公學堂的三倍、教師數將近四倍、經費則約五至六倍，⁷⁷兩者間的落差相當大，不過與奉天省其他小學校相比，公學堂經費還是相對的充裕。理論上公學堂應該只讓附屬地中國人子弟就學，但事實上公學堂有 1/5 的學生來自附屬地外，可見公學堂在運作上符合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理念，將眼光放到整個中國東北，而非限於狹小的附屬地上。不過，公學堂的經營事實上也是一種冷靜的計算，當 1920 年代滿鐵會社營運出現危機與「排日」問題接連出現時，滿鐵對中國人教育的消極政策就很明顯，開始有刪除中國人教育經費以轉嫁到日本人教育經費的意見。⁷⁸

在師資方面，公學堂教員約 2/3 為日本人，1/3 為中國人。⁷⁹日本人教員初期多以通中國語的東亞同文書院、東京外國語學校畢業的學生為主，由於缺乏教育訓練，後來以師範學校、滿鐵教員養成所與普通中學畢業的學生為主，不過後者語言能力就不如前者。日本人教員屬於滿鐵社員，以小學校停職職員的身份到公學堂任職，由於難回任小學校教員，一般認為從小學校到公學堂任教是降格。因為身份沒有保障，公學堂教員常在日人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兼差，流動率高。值得留意的是，公學堂教員中也有對中國人教育抱持著使命感的人，這種人為了實現日本式「共存共榮」中日友好理想，願意獻身於公學堂教育。這種類型的人因長期在公學堂服務，通常能成為公學堂堂長，對滿鐵中國人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發言權。⁸⁰

公學堂日本教員的長處是認真、熱心，擁有專業技能，教學法活潑，熱心聯絡家長，

⁷⁵ 不過奉天、撫順公學堂仍在初級一年級教授日語。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一卷，165-225；第二卷，頁 19-82。

⁷⁶ 小林治郎，〈中國人教育を回想して將來に望む〉，《南滿教育》，特別號（大連，1926.11），頁 20-27。《『満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四冊。

⁷⁷ 滿鐵附屬地的小學校，至 1928 年有 29 所小學，教員 406 名、學生 13,425 名，年度經費 1,112,854 日圓；同時期的滿鐵公學堂有 10 所公學堂，教員 92 名，學生 2,982 名，年度經費 184,944 日圓。許興凱，〈日本在東三省之文化侵掠〉，《教育雜誌》，21：4（上海，1929.4），頁 95-109。

⁷⁸ 飯塚南行，〈吉浦氏の滿洲教育上特に改善を要すべき點〉，《南滿教育》，101（大連，1930.4），頁 60-64。

⁷⁹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107。

⁸⁰ 楓木瑞生〈滿鐵の教師たち——中國人教育に携わった日本人の履歴〉，《同朋大學紀要》2(名古屋，1988)，頁 67-103。

並著重體育、音樂等實作科目，這是當時中國教育相當缺乏的。⁸¹有公學堂畢業生很感念日本人恩師的啟發，告訴他「盡信書不如無書」、「為了考試的學習對將來沒有幫助」的道理。⁸² 滿鐵公學堂教員也有相當可取之處。

不過，公學堂日本教員也有不少缺點。最大的缺點是語言不通，上課時學生遇到不了解的地方以中文詢問老師，卻被叱責為上課不認真，使不懂的學生不敢問問題，優者更優，劣者更劣；處理學生間的爭吵時，判斷容易失當，「日語良者，無理者變有理者，日語不良者，有理者變成了無理者」；學生以中文罵老師，老師聽不懂，助長學生對老師的鄙夷心；中國人習慣的事情卻被老師禁止，常引來學生的冷笑；態度傲慢，對學生常以一種使喚的態度，或常顯現民族的優越感，如屢屢說「要像日本子弟一樣」。這些缺點使得滿鐵公學堂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⁸³

中國人教員則以舊式師範傳習所、日式中等教育未受師範教育畢業者為主，他們負責教中國語、修身、地理與歷史等需大量使用中文之科目，他們的待遇遠不如日本人教員。滿鐵公學堂有堂長、教諭、副教諭與助教等職稱，由於教諭、副教諭要有日本教員、准教員資格，堂長由教諭中升任，這意味著中國人教員只能擔任助教。⁸⁴ 在待遇上，中國人教員不是小學校之停職職員，沒有退休金與恩給，本俸本已不如日本人教員，又沒有四至八成之外地加給，薪資可差到四倍以上。⁸⁵ 在 1920 年代中國東北的教育者眼中，對這些非新式師範教育出身的教師評價很低，認為滿鐵是「用中國之不良教師施以非中非日教育」。⁸⁶ 在內外不受重視的情況下，這些教師對教學或者採取消極態度，或者反過來對日本多加批評，成為「排日」教育的鼓吹者。⁸⁷

在學生、家庭背景與學習情況部分，公學堂吸引希望可以藉由日語學習而方便工作與升學的學生，學生的家庭背景、學習情況與附屬地的狀況一樣多元。起初不少附屬地的中國人對公學堂抱持著恐懼與不安的態度，認為公學堂是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為補充壯丁，或

⁸¹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奉天：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初等教育研究會，1937），頁 101-102。

⁸² 周祥福，〈奉天公學堂の卒業生として〉，《滿鐵たより》，36（大連，1937.8），頁 8-9。

⁸³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101-102。

⁸⁴ 楠木瑞生，〈日本旧殖民地における教育——1920 年代の「滿州」における中国人教育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紀要》，20（名古屋，1973.3），頁 121-133。不過中國人助教 1926 年後也可任教諭。楠木瑞生，〈滿鉄の教師たち——中国人教育に携わった日本人の履歴〉，頁 73。

⁸⁵ 外地加給的比例和該地至大連的距離成反比，如瓦房店為四成、長春為八成。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冊，頁 100-110。

⁸⁶ 〈教育廳謝廳長歡迎日本全國教育視察團詞（1924.1）〉，《遼寧教育史志資料》（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第二集，頁 909。

⁸⁷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中国人用教科書の変遷〉，《「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東京：綠蔭書房，2005），第八冊，頁 148。

是要進行實驗製作藥液而騙取中國兒童的機構。⁸⁸因此，滿鐵公學堂為招攬學生，最初採取免學費、交通費、教科書與文具費，興建學生宿舍的作法吸引學生。⁸⁹

1910 年代以後，附屬地中國人對公學堂的恐懼感逐漸消除，雖然滿鐵的上述補助可能也發揮了作用，但主要還是與整個中國東北的環境發展有關。⁹⁰日俄戰爭後，中國東北出現了近代化的趨向。隨著大豆貿易的發展，1915-25 年是中國東北經濟相當發展的時期，鐵路沿線的城市出現都市化的趨向。1923-30 年每年有一百萬以上的移民來到東北，是當時世界少有的移民潮。⁹¹在中國東北近代化的趨向下，新式的初等教育也漸次普及。從清末開始，由於歷任地方領導者如清末的督撫趙爾巽（1844-1927）、徐世昌（1855-1939）對教育有一定程度的重視，⁹²加上奉天省沒有大的戰亂相對安定，使得奉省的家長逐漸接受新式初等教育，奉省的初等教育發展在中國各省中算是相當突出。1929 年遼寧省的平均就學率是 34%，遠高於中國全國平均的 22%，居中國各省之冠。⁹³

若就讀重視日語教育的公學堂，在日本影響力頗大的中國東北方便工作與升學，反而有利。根據調查，學生來公學堂的原因有：學日語可以在日本相關機關工作、入日本上級學校、受「新學」教育與學費便宜。⁹⁴有不少公學堂畢業生或中輟生在滿鐵與其相關企業鐵路從業員、礦坑工作，如 1920 年代撫順公學堂退學的學生中有 90% 的人是因為工作的原因，他們全部都在礦坑就職，⁹⁵因此滿鐵教育者還自誇地說「沒有公學堂就沒有鐵路」。

⁸⁸ 飯河道雄，〈創業期の設施〉，《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88。《「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⁸⁹ 滿鐵公學堂免學費，後期除了日文教科書外，書本費、文具費不再免費但可貸與，帽章只發給一次。當時還出現有人掛籍在公學堂騙取交通補助，以便利其在附屬地間經商的情況。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1550-1553。《「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諸石熙一，〈教師の苦心と意氣〉，《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64-171。《「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30。

⁹⁰ 楓木瑞生，〈日本旧植民地における教育——1920 年代の「満州」における中国人教育を中心として〉，頁 127。

⁹¹ 平野健一郎（1923 年の満州）《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4），頁 244-245。范立君，〈近代關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3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5、271。

⁹² Dogald Christie, Iza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 and recollections of Dogald Christie* (C.M.G. London: Constable, 1914), pp. 199-201, 226-227.

⁹³ 不著作人，《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二冊，頁 469-471。1920 年代奉天省的小學分成省立小學、縣立小學、私立小學，省立小學皆為六年的完全小學，經費由省庫支出狀況較佳，到 1929 年有 18 校，其中 13 校在省城奉天；縣立小學分初級、高級、完全小學，經費由地方公款支出，到 1929 年有 9,363 校，其中大部分是四年的初級學校，有 8,496 校；私立學校有 734 校。奉天省初等教育發展雖然相對來說不錯，但仍有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經費不足問題，特別在張作霖時代後期，將大量經費用於軍事上，1926 年奉省歲出甚至有 95% 用於軍費，僅用 1.3% 於教育上；其次是教育品質的問題，奉省的初等教育的城鄉差距很大，偏重於四年制初級小學，學生難以繼續升學，鄉村的許多村立小學其實是過去的私塾就地合法而成，在師資、設備上都很簡陋。郭建平，《奉系教育》（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頁 120-130、156-163、302。保々隆矣，〈滿洲の教育〉，《教育科學》，第 10 冊，頁 35-38。

⁹⁴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478。《「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⁹⁵ 飯塚南行，〈吉浦氏の滿洲教育上特に改善を要すべき點〉，《南滿教育》，101（大連，1930.4），頁 60-64。

⁹⁶不過，在滿鐵工作的中國人只能享有傭員的待遇，與日本人傭員與社員的待遇相差甚遠。因此，對家庭背景好的學生來說，畢業後最好是繼續升學，更有發展性。當時中國東北的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並不發達，1920 年代整個遼寧省只有東北大學與馮庸大學，⁹⁷但小小滿鐵附屬地、關東州就有滿洲醫科大學與旅順工科大學，往日本方面學校升學，似乎比較容易。不過若往日本方面學校升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日語的問題，日本方面中等學校雖然也收中國小學畢業的學生，但由於一般科目都用日語教學，入學後他們的學習進度常落後於公學堂畢業的學生。⁹⁸因此若想往日本方面學校升學者，就讀滿鐵公學堂頗為有利。

滿鐵公學堂各校增設高等科、高級科多在 1920-24 年之間，反應了此時公學堂教育活絡的狀況。1920 年代滿鐵公學堂學生約 4/5 的人來自附屬地內，約 1/5 來自附屬地外，申請進入滿鐵附屬地公學堂的中國兒童約只有 40%-50% 的人可以順利入學。⁹⁹附屬地內中國人兒童的就學率約在 30%-50%，雖然與附屬地內日本人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幾乎 100% 的就學率有段差距，但即使在中國就學率最高的奉天省來說，還是就學率頗高的地區。

公學堂入學者的年齡在 1932 年有 7 歲至 15 歲者，公學堂的學生不一定只來自附屬地及其附近，如長春公學堂的學生有遠從數百公里外的瓦房店、熊岳城、蓋平與海城來者。¹⁰⁰學生的家庭環境與學習情況隨地區的不同有所差異，蓋平、熊岳城這種接近農村的地帶，家長多從事農業，學生學習的狀況很不好：

乃查各公學堂學生除因親戚鄰里婚喪事故曠課者外，春季在家助其父兄播種，夏季牧牛，秋季在田間工作，學校幾為一空。洎乎萬寶告成，始緩緩歸來。然席未煖而天早寒，書未讀而心已放。是先生未放學生假，而學生竟放先生假矣。¹⁰¹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撫順公學堂，其家長多為礦工，經濟狀況不佳，退學者多。而開原、長春、瓦房店等商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家長從事工業、商業的比例就比較高，奉天公學堂的家長中商工業及官吏者超過一半，家境普遍富裕，相對學習情況比較好。¹⁰²

滿鐵公學堂的教育與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臺灣的初等教育相比，有一些共通的情況，如學生年齡落差很大、書房依舊存在、對於從事農業的家庭來說，受新式教育有困難、日本

⁹⁶ 飯河道雄，〈創業期の設施〉，《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81-189。《「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⁹⁷ 〈遼寧省民國十八年教育概況〉，《遼寧教育史志資料》，第二集，頁 61-63。

⁹⁸ 劉家珍，〈松樹公學堂及び熊岳城農業學校の卒業生として〉，《滿鐵たより》，36（大連，1937.8），頁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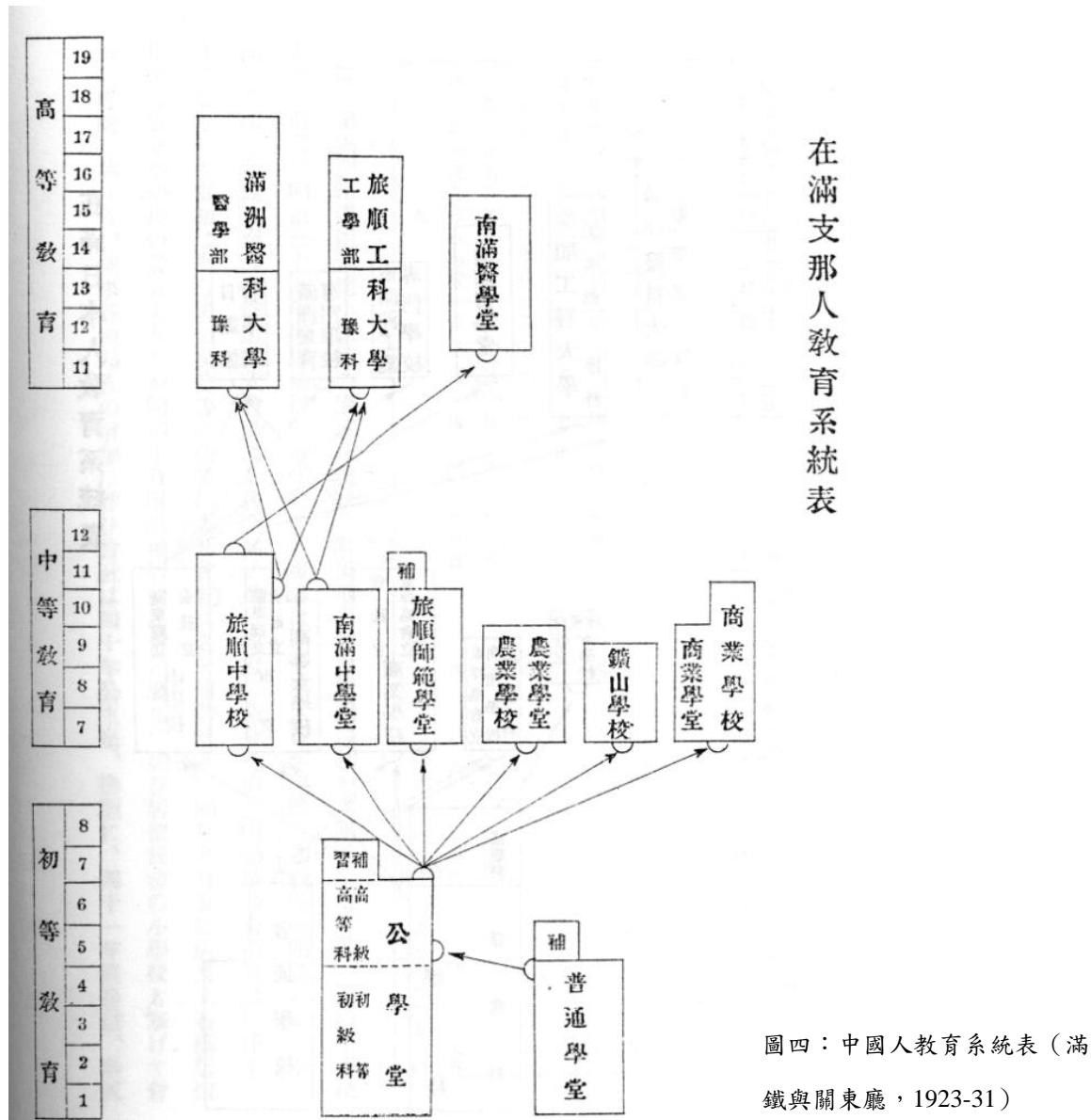
⁹⁹ 各校入學方針不一，瓦房店公學堂不論附屬地內外，幾乎都可以入學，入學率達 90%；其餘則是附屬地內優先入學，四平、長春公學堂則不讓附屬地外學生入學。另外，女性就讀高等科的人數很少，1923-31 年間，每年僅 6-26 人左右，奉天公學堂以南的學校不接受女性入學。這與各校收容數、堂長態度有關。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冊，頁 85-95。

¹⁰⁰ 井上暉雄，〈思ひ出二三〉，《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11。《「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⁰¹ 邵俊文，〈改良滿鐵公學堂教育之我見〉，《東北文化月報》，6：2（奉天，1927.1），頁 17。

¹⁰²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82-99、118-121。

方面的教育機關基於經費與其他考量，對漢人小學的設置不算積極。¹⁰³不過兩者也有差異點，如滿鐵公學堂學生的地緣性較低，有遠從數百公里來的學生、滿鐵公學堂學生仍可選擇中國方面的學生，滿鐵公學堂的環境競爭更顯著。滿鐵公學堂的教育因其空間環境有其獨特的地方，不過也有些地方是當時的普遍狀況。以上的比較提醒我們，理解滿鐵公學堂教育時，必須同時掌握其特殊性與一般性，才能更逼近歷史現場的真實狀況。



圖四：中國人教育系統表（滿鐵與關東廳，1923-31）

¹⁰³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6），頁 26-108。



圖五：遼陽公學堂宿舍狀況



參、滿鐵公學堂教科書使用的演變

本部分將說明 1923-31 年間的滿鐵公學堂教科書問題中，滿鐵公學堂教科書使用演變的狀況，以 1928 年底東北易幟為分界點可分為前後兩期。在背景知識方面，九一八事變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概況部分，民國初年中國教科書的發展狀況有何特色？這與九一八事變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有何關連？在 1923-28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部分，當時滿鐵公學堂如何選用課本，到了 1929-31 年又有怎樣的改變，這與中國東北時局的變化有怎樣的關連性？

一、九一八事變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概況

在說明九一八事變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概況之前，由於當時的教科書問題主要是針對中國教科書而引起的，我們必須先掌握民國初年中國教科書的基本發展狀況。從 1901 年清廷重新宣布實施新式教育，到 1942 年國民政府施行國定教科書制度為止，中國教科書採審定教科書制度，即教科書大致上由各書局編輯，經政府教育相關部門審核後發行。¹⁰⁴受市場競爭機制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劇烈變動環境之影響，此時中國教科書的特點是變動快、多元且重視愛國教育。

使用審定教科書的中國與當時使用國定教科書的日本，兩者有不小的差異。戰前日本也經曾有過審定教科書，但從 1903 到 1945 年，日本都是使用國定教科書。¹⁰⁵清廷在實施新式教育時，原先的構想也想管制教科書，但官方出版的教科書品質低下，與民間出版的書籍無法相比，最後只能容許使用民間課本。¹⁰⁶

由於出版教科書利潤很高，民國時期各書局紛紛投入教科書市場，教科書出版的狀況真可用百花齊放來形容，如 1937 年中國出版了 4100-4300 種教科書。不過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能在教科書市場中屹立不搖的書局並不多，只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與開明書局四大書局，其中又以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最突出。這兩家書局事實上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兩家書局，在 1930 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全中國四成多的書籍，中華書局則約是一成多，兩者合計可達六成的比重。¹⁰⁷

¹⁰⁴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8。

¹⁰⁵ 佐藤尚子編，《日中比較教育史》（橫濱：春風社，2002），頁 60-71。

¹⁰⁶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頁 8。

¹⁰⁷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39-40。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頁 115。

兩家書局在中國出版界的成功，很大程度可以歸功於其在教科書領域的發展，兩家書局都是靠教科書起家。商務印書館在清末一連串教育改革中，憑藉著日本資金與日本人顧問出版最符合新學制的教科書，打敗其他書局，成為教科書界龍頭；辛亥革命後，中華書局乘著商務印書館對政治動向顯得猶豫之際，出版鼓吹共和、革命的教科書而崛起。商務印書館在吃了一次虧以後，往後在遇到政治、文化變動，如國民政府北伐或白話文運動，也很積極地編輯新的教科書。由上可知，判斷時勢是教科書競爭成敗的關鍵，因此各書局以尚「新」為能事。如商務在民國初年出版的新式共和國（1912）、新法（1920）、新學制（1923）、新時代（1928）教科書，而中華則出版了新制（1913）、新式（1916）、新教材（1920）、新小學（1923）、新中華（1927）教科書，真可說無「新」不成教科書。¹⁰⁸

不過在「尚」新的同時，舊的教科書並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而是新舊並存的局面，如即使到 1929-31 年間，商務仍繼續出版新學制、新時代教科書。可能的解釋是，這反映當時中國新舊文化錯雜的情況，如 1920 年代中國一方面大趨勢是推行白話文教科書，一方面某些地區如奉天省卻有人想回復文言教科書。¹⁰⁹另外，各地採用教科書的狀況歧異性相當大，同一校上下學期用的教科書常常不一樣，以奉天省遼陽縣為例，教科書的選用依書局與縣教育公所的關係而定：「春季採用商務本，秋季採用中華本，內容不相銜接，哪管它教學規律」。¹¹⁰在推行國定教科書的日本，幾乎不可能出現像中國這樣多元的狀況。

前面提到判斷時勢是教科書競爭成敗的關鍵，那麼當時中國的時勢是什麼？民國時代中國教科書有兩個一貫的主軸：進步與愛國。¹¹¹進步指的是對現代文明的憧憬與嚮往，愛國則是建構一個團結、一致的中華民族，借用學者李澤厚的話就是啟蒙與救亡。¹¹²中華書局是國家主義教育的大本營，左舜生（1893-1969）、陳啓天（1893-1984）是代表人物。在激烈的競爭下，中華書局常強調自己的教科書注重國民教育，尤重「國恥」與割地、賠款等事，批判商務書局因有日資而避談甲午戰爭的賠款，商務則趕緊撤除日資並反擊中華只會牟利。¹¹³至少到 1920 年代初期，中華書局的教科書還可以勉強說比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愛國」，但 1920 年代末期以後，中華、商務的教科書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這情況恐怕是商業競爭機制與愛國意識間微妙的互動下的產物。

¹⁰⁸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頁 27-28、128-131。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頁 132-135。

¹⁰⁹ 〈復縣中學教員為條陳教育改革給奉天省長呈（1923.11.23）〉，《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第四冊，頁 295-297。

¹¹⁰ 楊效震，〈解放前遼陽教育概況（1904-1946）〉，《遼寧文史資料》（瀋陽：瀋陽人民出版社，1985），第十二輯，頁 154-181。

¹¹¹ 関斗基，〈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教科書と時代状況——1920 年代末から 1930 年代初期の初等学校教科書の内容分析〉，《近きに在りて》，44、45（東京，2004.6），頁 137-151。

¹¹²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2002），頁 1-46。

¹¹³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頁 71-73、138。

在商業競爭機制與愛國意識間微妙的互動下，總體來說，中國教科書有著越來越「愛國」的趨勢。當然，「愛國」不必然等同於「排日」，但至少日本方面出現了認定中國進行「排日」教育的聲音。民國時代有三次比較大的教科書爭議，發生在廿一條要求、五四運動與九一八事變前後。20世紀上半最早的中日教科書問題可以追溯到 1914-1915 年廿一條要求前後，9月《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的社論批評 1912 年發行以來以已重印 14 版邵伯棠的《高等小學校論說文範》，認為其充滿了偏激的「排日」文字，並批評日本政府坐視不管。同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1821-1926）正式提出抗議，教育總長湯化龍（1874-1918）回覆說，這本書不是審定教科書，只是輔助讀本，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他並暗示此書的出現是因日本亦有偏激之著作激發而成。雖然做出以上的辯駁，但中國政府還是決定順應日本的要求，取締和修正私人教科書裏「排斥友邦」的言論。1915 年圍繞著廿一條的問題，中國掀起了廣泛的「排日」風潮，日本政府的關注轉移到杯葛日貨問題，比較不注意教科書問題；且日本駐華外交官也有人認為，此次的問題確實是由於日本國內分裂中國言論導致中國人反感而起的，因此日本政府不應採取過份強硬的姿態，此次教科書問題在雙方政府都不願意擴大爭執的情況下而落幕。¹¹⁴

1918、1919 年又發生圍繞中華書局新式教科書內容的教科書問題。1918 年末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1860-1939）提出照會，要求禁止中華書局發行這本強調國恥、發揚國威的教科書。教育部要求中華書局修正，中華書局表面上接受，實質上卻沒有更改。1919 年發生五四運動，日本政府的關注又轉移到五四運動上，教科書問題相對又不被日本政府重視。1920 年末，日本外相內田康哉（1865-1936）曾要求在華各領事調查中國的「排日」教科書，但大部分領事調查的結果發現，特別是經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內容多是面對國權喪失於列強的困境，強調中國國民應該奮起自立自強，並沒有專門針對日本的內容，而日本政府也考量到如果僅以這樣內容的「排日」教科書要求中國政府取締，也許反而會激起民眾更大的反日情緒，因此 1920 年代初期教科書問題暫時沈寂了下來。¹¹⁵

從廿一條要求、五四運動兩次教科書爭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兩點結論。首先，教科書問題與外在的中日關係變化息息相關，因此教科書問題都發生中日關係出現問題之時。其次，教科書問題之所以平息，主要是由於日本方面特別是外務省官員並沒有認真地將教科書問題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很容易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不過到了第三次教科書爭議也就是九一八前後的教科書爭議，日本方面的狀況則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少在滿日人

¹¹⁴ 徐冰，〈民國時期中日教科書考略〉，頁 125-138。砂山幸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特集〉戰前期教科書問題研究（2）），頁 1-19。

¹¹⁵ 徐冰，〈民國時期中日教科書考略〉，頁 125-138。砂山幸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特集〉戰前期教科書問題研究（2）），頁 1-19。

將教科書問題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認為這反映他們當時的情況：被中國逼入絕境。



圖六：日本駐華使館所蒐集的排日繪畫（1926年蘇州中學實驗小學）

二、1923-27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狀況

1910、20 年代中國局勢的變化，使得滿鐵公學堂教育受到很大的衝擊。1910、20 年代的中國是個激變的年代，用學者羅志田的話是：「那時的世局幾乎可以說是年年翻新，一年一個樣。」¹¹⁶此時中國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民族主義的發展，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在實踐上很大程度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根據當時日本中國問題專家長野朗的看法，當時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主要可分三類：一是反文化侵略，表現為收回教育權運動；二是反經濟侵略，表現為抵制外貨而提倡國貨；三是反政治侵略，表現為確立國家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領土、鐵路。¹¹⁷當時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日本並非唯一要反對的對象，教育上收回教育權運動也非僅針對日本而來，西方教會學校也是此時教育權收回運動的目標。¹¹⁸但一次大戰後作為列強中涉入中國事務最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單獨的敵人」¹¹⁹的日本，逐漸成為中國主要的攻擊對象。教育問題由於涉及到國家建構、國民培養的問題，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比政治、經濟問題更深層的問題。

¹¹⁶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2001），自序頁 1。

¹¹⁷ 長野朗，《支那の反帝國主義運動》（東京：行地社，1927），頁 9-133。收於《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

¹¹⁸ 佐藤尚子，〈教育権回収運動下の中国キリスト教学校〉，《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5（東京，2002），頁 27-37。

¹¹⁹ 川島真，〈緊密關係化與對立的原型——從甲午戰爭到“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頁 27-48。

1923 年中國掀起了收回東北利權的浪潮。原來如果不承認 1915 年中日間因廿一條要求而締結之條約的話，¹²⁰按照原約旅順、大連租借地與安奉鐵路部分將於 1923 年到期（1898-1923）。同年 3 月北京政府的國會決議廢棄 1915 年與日本簽定之條約，3 月至 6 月收回旅大運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進行著，主要表現在日貨的杯葛上。由於日本方面堅持 1915 年簽訂條約有效，堅決拒絕中國方面的要求，最後整個事情不了了之。學者平野健一郎認為，收回旅大活動在中國東北以其他的形式展現，在教育相對比較被重視的奉天省，收回旅大活動主要以教育權回收運動的形式發展著。1923 年是東北中日關係發展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到九一八事變的 1931 年，中國東北中日間形成了一種文化對抗的態勢。¹²¹

面對 1910、20 年代中日關係的惡化，滿鐵公學堂教育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進行某種程度的調適。前面提到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教育傾向「現地適應主義」，不過實際的作為仍是因時而異。以教科書的使用來說，雖然滿鐵公學堂在 1912 年就確立了中國語、修身、歷史與地理等科目使用中國教科書的原則，¹²²但實際上不一定真的使用中國教科書，如中國語在 1917 年以前用自編講義，而高等科歷史在 1918 年以前採口述的方式講授東洋史。¹²³另外，在 1923 年以前，各公學堂堂長沒有自行選用課本的權力，雖然名義上由教育研究會的前身教務研究會決定，但實際的決定權 1920 年以前是在滿鐵地方課長，1920 年後則是從地方課獨立出來的學務課長手中。¹²⁴

不過滿鐵公學堂在 1923 年以後，對於課本的使用與選定情況，有所改變。根據 1923 年修正的公學堂規則規定，各公學堂堂長可以自行選用課本，並增加中國教科書的使用。¹²⁵1923 年公學堂教科書使用的改變，主要是因應日益升高的「排日」風潮，因而賦予公學堂堂長較大的權力決定課本的使用，以臨機應變。¹²⁶

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選用，實際由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負責。1920 年成立的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分為一、二部，第一部是日本人教育，第二部是中國人教育，各學

¹²⁰ 該條約全名為〈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簡稱〈民四條約〉。見唐啟華，〈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兼論外交史的「神話」與「史實」〉，頁 239-255。

¹²¹ 平野健一郎，〈1923 年の満州〉，《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頁 247-252。

¹²²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66-77。

¹²³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編，《公學校日語學堂教育の實際》，頁 3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九冊。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2097-2115。《「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²⁴ 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三卷，頁 139-150。

¹²⁵ 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冊，頁 66。

¹²⁶ 1922 年「支那人教育主任會議」上還有教科書全用中國教科書的建議，不過最後沒有被採納。竹中憲一，〈日本の關東州・滿鐵付屬地における中国人教育——「満州國」成立以前〉，《人文論集》31，（東京，1993.2），頁 1-24。

校成員如教員、校長是研究會委員。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代表滿鐵教育者希望追求自治，降低滿鐵高層對初等教育控制而成立之組織，其運作的特色是：重實際、自由、活動範圍廣和參與人數多。該研究會雖然無法改變學制、人事與經費，但其態度對滿鐵初等教育有一定影響力，如教科書的選用。¹²⁷

1923-31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選用有兩個特色：一為中國語、修身、歷史與地理等敏感科目，多使用中國的教科書，主要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為主；理科、算數、圖畫與音樂等比較不敏感的科目與沒有中國課本的日本語，基本上使用日本或自編的教科書。二為教科書的使用有彈性、自由，不僅各校各科使用的教科書不一，同校同科不同年級使用的課本也不盡相同（見附表四），這也與中國方面教科書選用狀況相似。

表三：滿鐵附屬地公學堂各科主要使用教科書表

科目	主要使用教科書
修身	《新法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4 《新學制適用公民課本》中華書局 1928（初等科） 《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8（高等科）
中國文	《共和國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17 《新法國語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6 《新學制國文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8 《新時代國語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31
理科	《公學堂高等理科教科書》滿鐵教育研究所 1921
算術	《新算術》商務印書館 1918 《公學堂算術教科書》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 1924
歷史	《新歷史共和國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14 《中華高等小學歷史教科書》中華書局 1914 《新法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3 《新式歷史教科書》中華書局 1923 《新學制歷史教科書》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會 1930
地理	《新地理共和國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14 《中華高等小學地理教科書》中華書局 1914 《新法地理教科書》商務印書館 1923 《新式地理教科書》中華書局 1923 《新學制地理教科書》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會 1930
圖畫	《新定畫帖》文部省 1909 《圖畫教科書》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 1926
音樂	《日華歌唱集》滿鐵教育研究所 1919 《初等歌唱集》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 1925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125-199。

為了消除中國人的反感，滿鐵公學堂增加中國教科書的使用程度，但這也不得不面對

¹²⁷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1-2、7。

中國教科書「不合適」內容的問題。「不合適」內容問題有兩個，一個是不重視鄉土教育的問題，一是「排日」內容的問題。1920 年代的日本教育界受到新教育思潮「兒童中心主義」影響，認為教育內容應從兒童日常生活環境出發，因而重視鄉土教育。¹²⁸事實上，奉天省教育界也注意此問題，而試圖加強鄉土教育。¹²⁹不過，比鄉土教育更顯著的問題，仍是「排日」內容問題，當時中華民國教科書的一個特色是：時事很快被編入課本，特別是所謂的「國恥」，如 1916 年中國的教科書，就已寫入 1915 年廿一條要求的內容。¹³⁰這些課本內容，如租借地、租界與廿一條要求，也許對居住於滿鐵附屬地或周邊的中國人來說，是相當真實的，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深受這些事情的影響，教科書內容就是現地實況，滿鐵教育本身就是日本方面所謂「滿蒙特殊權益」的一部分。¹³¹

既然中國教科書有「不適當」內容，為何不與關東州公學堂合用教科書，或自編課本？1922 年成立的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負責編輯關東廳、滿鐵的教科書，當時滿鐵公學堂確實有自編課本的能力。關於此問題的可能解釋有二：首先，滿鐵公學堂與關東州公學堂學制不同，很難與關東州公學堂合用課本；其次，若自行編輯則所費不貲，對當時須自行負擔課本費的學生來說，費用太高。¹³²當然，就後來滿鐵公學堂自行編輯中國語、修身、歷史與地理課本，且當時理科、算數、圖畫與音樂等科目都使用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編輯的教科書兩件事情看來，費用似乎不是最主要的考量。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教科書的「排日」內容雖然有些麻煩，但還不是嚴重的問題，並且中國的教科書也有可取之處，如滿鐵學務課長保保隆矣認為當時中國修身教科書關於公民團體生活的內容，比日本還完備。¹³³只要中國教科書的「排日」內容還在可以容忍的範圍，滿鐵公學堂還是可以使用中國教科書。

由於缺乏資料，我們無法知道究竟滿鐵教育者用怎樣的標準選擇課本，不過從結果來看，1920 年代滿鐵公學堂偏好使用商務印書館而少使用中華書局的課本。試比對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地理課本中可能引發爭議的內容（見表四），就敘述的語氣來說，商務的課本恐怕還比呂思勉（1884-1957）所編中華書局課本激烈。但就課本結構的安排來說，呂氏所編課本隱含了「收回失土主義」（irredentism）思想，¹³⁴也就是在中國的地理課本的

¹²⁸ 實際當時日本教育界重視鄉土教育，還有「愛鄉即愛國」國家主義式的思考存在。見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262-273。

¹²⁹ 郭建平，《奉系教育》，頁 112-113。

¹³⁰ 砂山幸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特集〉戰前期教科書問題研究（2））〉，頁 5。

¹³¹ 加藤陽子，《滿州事變から日中戦争へ》，頁 19-28。

¹³²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2097-2115。《「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³³ 保々隆矣，〈中國人教育ノ方針ニ就テ〉，《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386-38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³⁴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1983），頁 290-291。

本國地理部分，不僅有旅順大連、膠州灣等租借地，還有臺灣、朝鮮與琉球這樣失去的領土與藩屬國，這與當時商務的課本有很大的差異。我們無法知道滿鐵公學堂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的理由而不使用中華書局的課本，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滿鐵公學堂所使用的教科書，裡頭也有不少「排日」爭議內容，形成了日本人開設的學校使用「排日」的教科書的奇特現象。

表四：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地理教科書與日本相關之記載（1922、1924）

商務印書館《新法地理教科書》(1922、24)		中華書局《新式地理教科書》(1924)	
課名	主要內容	課名	主要內容
第一冊第四課 山東要埠	膠州灣青島是德國向我國租借的地方，歐洲大戰的時候，日本用兵力奪取……	第四冊第十四章 租借地	大連灣……日俄戰後，轉入日本，設政廳治焉，並設都督府於旅順口。膠州灣……清光緒二十四年，為德國所租借，歐戰時又為日本所據。
第一冊第四課 旅順口與大連灣的租借	民國四年，日本又逼我政府訂延長租借的條約，這樣看來奉天省的鎖鑰，不要永遠落在他人手裏麼。	第四冊第十五章 割讓地一	臺灣及澎湖群島……光緒二十一年，割於日本。 庫頁島……清廷以其荒遠，不務墾闢，為日俄所佔（占）。
第三冊第三課 間島交涉	日人曉得他地勢便利、物產豐盛，就造出許多偽證，硬指他是韓國舊領。	第四冊第十五章 割讓地二	朝鮮本中國藩屬。中日戰後，離我獨立，日俄戰後，歸日保護，至清宣統二年，遂為日所併。 琉球……清光緒五年，日本併之，廢其王，建為沖繩縣焉。

資料來源：譚廣編，《新法地理教科書》；呂思勉編，《新式地理教科書》。

1923 年以後，滿鐵公學堂採取更溫和的態度來應對中國東北局勢的變化，包括更廣泛地使用中國教科書。不過中國東北中日對立的情況，仍在逐漸加溫，1924 年奉天省教育權收回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著。1924 年 3 月，奉天市政公所教育課長羅振邦參觀滿鐵經營的公學堂與中學堂後，認為公學堂雖高舉中日親善的理念，「此種偉大之博愛精神，雖耶蘇復活，亦不是過」，但其「日本化」教育使中國學生毫無國家觀念，任用舊式中國人教員，「與二十年前中國最腐敗之私塾無大差異」。¹³⁵ 同年 4 月，奉天省教育廳長謝蔭昌（1877-?）也在日本教育訪察團歡迎會的場合中發言，認為教育特別是初等教育是培養國民性、國家觀念最重要的手段，不能假於外人之手。同月奉天省教育會召開了臨時會議，討論如何收回滿鐵教育權的方法，也討論如果不能順利收回教育權的話，各種抵制日本教育的方法，如在滿鐵附屬地周邊附近大量設置中國學校；使畢業於日本設置的各級學校的中國學生無法擔任中國的官吏、教師；阻止日本各種學校發散招生廣告；勸告日本學校

¹³⁵ 羅振邦，〈參觀南滿中學校公學堂及第一、第二尋常小學校後之感想〉，《遼寧教育史志資料》，第二集，頁 909。

之中國教員速退出日本教育界，不得已時，「得用特別勸告，使促其天良發現」；勸家屬使其子弟退出日人學校，屢勸不聽者「除其國籍或處以平民以下之待遇」等等。¹³⁶不過在奉天省教育廳方面要求慎重起見的情況下，這些建議大部分沒有付諸執行。之後雖然奉天省教育廳長謝蔭昌與日本奉天總領事船津辰一郎（1873-1947）曾會談討論收回滿鐵中國人教育，但在滿鐵教育者的極力反對下，沒有具體結果。1924年6月奉天省教育廳長謝蔭昌去職，一般認為是日本方面對張作霖（1875-1928）、奉天省長王永江（1872-1927）施加壓力的結果。

表面上隨著謝的去職，奉天省教育回收運動就此平息，但事實上餘波仍在蕩漾。奉天省教育會所提出一些抵制滿鐵中國人教育的方案正默默進行，如在滿鐵附屬地內外成立學校，如在開原附屬地外由華商公議會成立商立初級高級小學校、在松樹附屬地外成立瓦房店縣立第十二小學，¹³⁷對附屬地內及附近中國人子弟採取免除學費的方式，或是直接在附屬地內，如昌圖與公主嶺成立私立小學校與公學堂競爭；¹³⁸勸說滿鐵附屬地公學堂的中國學生不要再去公學堂上課，轉退學的人數明顯增加，1924年遼陽公學堂就因學生人數不足而廢校。在奉天省，瀋陽、遼陽縣是初等教育最好的兩個縣，¹³⁹遼陽公學校的廢校，可說是公學堂教育敗北的象徵。¹⁴⁰

1925年的五卅事件與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兩事件，使中國東北的民族主義情緒明顯的升溫，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¹⁴¹滿鐵經營各種學校的中國學生群起罷課，最嚴重的公主嶺農業學校六十餘名學生僅剩十名，其餘皆退學，使得憂心此事的校長自殺。經過1923-1924年的教育權回收運動及其後續的發展，再加上1920年代中後期滿鐵財政的惡化的雙重影響，¹⁴²滿鐵中國人教育政策漸趨消極，當時有滿鐵小學校的教育者認為，公學堂教育排擠小學校資源，而且反而教育出排日家，招收附屬地以外學生一事，激發中國人猜疑心，要實現「共存共榮」理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廢掉公學堂。¹⁴³滿鐵副社長松岡洋右

¹³⁶ 〈奉天回收教育權運動之進行概況〉，《教育雜誌》，16：6（上海，1924.6），頁4-6。

¹³⁷ 山路猶龍，〈教員講習所的一期生〉，《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190-19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³⁸ 關於1923、1924年奉天省教育權回收問題詳見阿部洋，〈旧滿洲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事業と教育権回収運動〉，《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戰前日本の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頁133-167。

¹³⁹ 曹德宣著・滿鐵學務課譯，《奉天省教育事情》（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學務課，1923），頁16。收錄於《「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六冊。

¹⁴⁰ 楠木瑞生，〈南滿中學堂覺書〉，《同朋大學論叢》，56（名古屋，1987.7），頁178。

¹⁴¹ 五卅事件時蓋平、松樹與長春公學堂的學生擔心事件的發展，要求停課、回家，在教師的說服下才作罷；日本出兵山東時，中國巡警阻撓奉天公學堂學生上學，最後尋求日本警察的保護，才順利通學。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507-517、619-628。《「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⁴² 鈴木隆史，《日本帝國主義と滿洲》（東京：塙書房，1992），上冊，頁433-451。

¹⁴³ 吉浦富吉，〈滿洲教育上特に改善を要すべき點〉，《南滿教育》，99（大連，1930.1），頁76-83。

(1880-1946) 將中國人教育比喻成「雉孵鷺卵」，雞想孵鷺的卵是沒有好下場的。¹⁴⁴ 滿鐵沒有新設公學堂的計畫，公學堂的經費也減少，中國人教育陷入很大的困境。

三、1928-31 年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狀況

1928 年以降，隨著國民政府北伐與東北易幟，中國東北中日文化對抗的態勢更加升高。1928 年 3 月國民政府公布〈中小學暫行條例〉，重申教科書送審制度，未經審定通過者不准發行。¹⁴⁵ 同年 5 月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決議以三民主義為中國教育之宗旨，「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之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聯，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¹⁴⁶ 中國教育明顯地產生新的變化，重視三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教育。雖然最近的研究，常指出黨化教育的局限性，¹⁴⁷ 不過這些改變對原本就較偏向中國的滿鐵公學堂來說，還是很難不造成衝擊。

滿鐵公學堂的日本教員也意識到中國教育的顯著變化。1929 年 3 月松樹公學堂堂長山路猶龍在參訪中國南方的學校時，觀察到學校「如同神一樣的」紀念孫文：

學校於紀念日之時，倣效日本的形式，彼等如同御真影（當代天皇、皇后肖像）般奉拜〔孫文遺像〕，又校長如同奉讀敕語般以尊嚴之態度朗讀孫文遺訓。¹⁴⁸

曾任滿鐵學務課長、地方部長的保保隆矣也將黨義、三民主義比擬為日本的〈教育敕語〉。¹⁴⁹ 有意思的是，滿鐵教育者將孫文遺照與遺訓比做「御真影」與〈教育敕語〉一事。〈教育敕語〉頒布於 1890 年，強調教育的基本在於「忠君愛國」，代表戰前日本國家主義教育的最高教育理念。通常學校等教育場所會有「御真影奉安殿」或「奉安庫」，放有〈教育敕語〉謄本與「御真影」，在特殊節日時會由校長奉讀〈教育敕語〉，學生也被要求背誦〈教

¹⁴⁴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65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⁴⁵ 不著作人，《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五冊，頁 129-130。

¹⁴⁶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 (1929.4.26)〉，收錄於顧明遠編，《中國教育大系——20 世紀中國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5-16。

¹⁴⁷ 總體來說，狹義的黨化教育的成效不彰，但與廣義包含民族精神的黨化教育效果較好。以缺乏背景知識的師資，對年幼學童講述複雜的政治思想，常使三民主義教育流於形式。以同樣曾為奉系勢力範圍的山東省為例，若僅就形式來看，鄉村初級小學除了課桌椅及黑板以外，其他教學器材盡付闕如，但教室內卻掛有孫文遺像與國民黨黨旗、國旗，三民主義教育的影響力看似無遠弗屆；但實際教學，卻有教員將孫文遺訓的「矢勤矢勇」寫成「失勤失勇」，或有認為民生係大家分產者。而當時的中國教育界，也並非所有人都支持三民主義教育，如受自由主義思潮的蔡元培 (1868-1940)，與不認同黨治教育的國家主義教育者，都對三民主義教育有所批判。蔡杏芬，《抗戰前十年中國的小學教育：魯青地區個案研究，1928-1937》，頁 123-127、134。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 124、128-144。

¹⁴⁸ 山路猶龍，〈南支那及臺灣を視て〉，《南滿教育》，92 (大連，1929.3)，頁 39-41。

¹⁴⁹ 保々隆矣，〈滿洲の教育〉，《教育科學》，第 10 冊，頁 34。

育敕語〉。¹⁵⁰「如同神一樣的」紀念孫文在意義上，畢竟還是與奉拜「現人神」的天皇不同，不過建構國家認同的本質是一致的，滿鐵教育者確實敏銳地掌握了中國教育重視建構國家認同的趨向。滿鐵教育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從近代日本民族國家教育的經驗中，看到中國教育更進一步走向民族國家教育的可能性。

1928年底張學良（1901-2001）的易幟又使問題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張學良年輕時想當醫生，而想進日本方面的南滿洲醫科大學，後來因為父親張作霖要其當軍人而放棄。¹⁵¹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起初張學良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教育，也許沒有很大的反感。但其嚮往一個強大、統一中國的情感，加上其父為日本人謀殺的仇恨，使他與父親張作霖以兩面手法周旋在日本勢力與中國民族主義不同，而是走上明確與日本對抗的路。¹⁵²張學良在無視日本方面「勸告」的情況下斷然宣布易幟，此事對在滿日人來說衝擊相當大，認為往後的「排日」行為會變本加厲。曾擔任瀋陽領事的森島守人（1896-1975）認為：

〔張〕作霖時代，雖說是排日與抗日，還是偶發的或不出片斷之範圍，並沒有思想的背景或組織的體系；可是〔張〕學良時代的排日與抗日，已非個別事件的反覆或連續，而是在一貫的思想背景之下，基於一貫方針的組織型態。¹⁵³

這樣的想法，很大程度可以代表當時在滿日人對時局的看法。在滿日人間一種想法開始醞釀：若任由事態發展的話，他們最後的結局就是被趕回日本，¹⁵⁴也出現了「滿鐵包圍網」的說法，認為張學良政府要置滿鐵於死地。¹⁵⁵

東北易幟也意味著所謂的黨化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將更全面性的影響中國東北教育。1928年易幟後，滿鐵學務課長平野正朝在中國人教育各學校校長會議上「悲壯」地要求

¹⁵⁰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頁 77-79。

戰前日本雖說是立憲國家，但 1882 年頒布的〈軍人敕諭〉與 1890 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實際上並非從屬於 1889 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法令，而是具有自外於甚至是超越於明治憲法的地位。大江志乃夫，《張作霖爆殺》（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頁 131-132。

¹⁵¹ 白井勝美訪問・陳鵬仁譯，《張學良與日本》（臺北：聯經，1994），頁 12。

¹⁵² 張學良明確與日本對抗的政策，相當程度是承繼張作霖時代晚期一些政策而來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對軍閥的惡劣觀感，使得過去的研究在討論奉系政權時，會強調其親日的一面，而忽視其亦有自主性的一面。1925 年以後張作霖也開始規劃鐵路並行線等與日本勢力對抗的政策，張學良繼承了這樣的方針，只是在實行上更為明確、激烈。見水野明著・鄭樸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頁 13-20。西村成雄著・曾淑卿譯，《張學良——「滿洲」與中日之霸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1-5、199-207。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4-126.

¹⁵³ 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一外交官の回想》（東京：岩波書店，1950），頁 29。

¹⁵⁴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増補版》，頁 92。

¹⁵⁵ 所謂「滿鐵包圍網」指的是認定張學良政府藉與滿鐵幹線平行鐵路與葫蘆港修築計畫，欲致滿鐵於死地的說法。學者尾形洋一指出這樣的說詞，誇大了當時滿鐵的危機。即使張學良政府確實有這樣的想法，在現實的執行上，有其困難性。尾形洋一，〈東北交通委員會と所謂「滿鐵包圍鐵道網計畫」〉，《史學雜誌》，86：8（東京，1977.6），頁 39-72。

各教育者，面對東北教育的變化不得不有所覺悟。¹⁵⁶事實上若就後來 1929-1931 年中國東北教育的狀況來看，確實有這樣的趨向。一般認為張學良的中央化有其局限性，亦即東北名義上雖已易幟，但在實際政治、軍事運作上，東北依舊相當獨立自主。¹⁵⁷但在教育事務上，也許是尋求一種與日本對抗的意識型態，¹⁵⁸中國東北教育界相當積極的以三民主義的名目，推行愛國、國恥教育，試圖實現過去教育權回收運動未竟的事業。¹⁵⁹在滿鐵教育者的眼中，這是「在三民主義的美名下賣狗肉」，在三民主義的美名下，實施「排日」教育。¹⁶⁰在日本外務省與陸軍的報告中，常可見到中國東北三民主義教育盛行的觀察。¹⁶¹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間教育衝突的情況繼續升高，滿鐵教育者對現況想必是相當失望，這或許可以從九一八事變後〈建設新教育的宗旨〉中提出的口號中，略可感受一二：(節錄)

打倒國民黨的暴民教育政策！ 教育本無國境！

彼此研究彼此的語言！ 保證教員生活！

打倒學匪化的教育！ 打倒排外教育！

要求共榮化教育！ 打倒侮日教育家！

打倒黨化教育！ 教育經費須要獨立！

打倒三民邪教！ 保境安民自教育始！¹⁶²

中國東北局勢的變化影響到了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1927 年中國北伐之際，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組織了「中國側教科書調查委員會」，指派委員撫順公學堂長荒木馨、四平街公學堂長小田獻四郎、蓋平公學堂長森田良一調查中國教科書，決定 1928、

¹⁵⁶ 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568。《「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⁵⁷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支那ニ於ケル排外教育》(東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1932)，頁 68-69。收於《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第五卷。

¹⁵⁸ 「滿洲國」的王道主義則可理解為對抗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40-245。

¹⁵⁹ 1931 年遼寧省教育廳長吳家象向各縣長發出訓令，要求其趁暑假期間，派遣教員與警察到中國人學生家中勸說，要求學生離開滿鐵的學校，轉至中國小學校。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771-77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六冊。

¹⁶⁰ 不著作人，〈三民主義教育の根源と進轉如何〉，《南滿教育》，92(大連，1929.3)，頁 1。

¹⁶¹ 1929 年 5 月吉林總領事川越茂 (1881-1969) 報告該年二月份吉林省解除禁令後，各書店競賣三民主義相關書籍，實質掌握全省教育事務的教育廳秘書肅文誠，要求各校長使用《新時代三民主義教科書》。1929 年 5 月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報告奉天教育會、奉天省城教職員聯合會是奉天省各組織中，最早受國民黨風氣影響的；而奉天省政府委員會決定該年 3 月後，各學校修身課每週上一次三民主義，教科書多使用商務、中華與世界書局的三民主義教科書，其中以商務教科書「排日」情況最露骨。1929 年 6 月日本陸軍的報告說遼寧省遼陽縣雖然沒有專設排日教育的時間，但在三民主義課程中談排日、排外。同時在遼寧省的開原、鐵嶺等縣，見到排日海報及國民政府內政部頒發之「廿一條問題說明錄」、「不平等條約一覽表」。〈各国ニ於ケル教育制度及狀況關係雜件／中国ノ件 第一卷 13 排外教育關係〉，《日本外交文書》，JACAR.B02030187900，畫面 12-14、18-26。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研究センター〈昭和四年〉《陸軍密大日記》，JACAR.C01003889100，畫面 7-8、24-31。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研究センター，2007 年 10 月 23 日瀏覽，網址：<http://www.jacar.go.jp/>

¹⁶² 自治指導部調查課編，《奉天省中心教育調查（事變前後）》(奉天：自治指導部調查課，1932)，頁 59-62。

29 年度滿鐵公學堂修身科用中華書局新學制課本，中國文、地理與歷史科用商務印書館新學制課本。¹⁶³新學制課本指的是中國各書局配合 1922 年施行新學制編輯的課本，滿鐵公學堂使用的是 1928 年的版本。1928、29 年度滿鐵公學堂的使用，暫時沒有問題。

不過東北易幟以後，問題開始出現。1929 年度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要決定 1930 年度使用什麼課本時，發現各書店已買不到新學制的課本，而盡是 1927、28 年陸續編成的商務「新時代」、中華「新中華」與世界「新主義」這些滿鐵教育者認為是「排外」教科書的課本。¹⁶⁴在這樣的情況下，滿鐵教育者決心要編自己的課本，1929 年 12 月教育研究會第二部組織了「中國文教科書編纂委員會」，決定自編教材，地理、歷史由松樹、瓦房店、熊岳城、蓋平公學堂負責，中國文由奉天、開原、撫順公學堂負責，修身由長春、公主嶺、四平街公學堂負責。¹⁶⁵在新教科書編成前的兩年內，暫用現有版本，也就是將 1928 年版的新學制課本，刪除「不適當」的內容，如該版本國語課本原有之青天白日旗、孫文肖像與其「革命尚未成功」，並修訂地名如將北京、奉天改為北平、瀋陽，拍照後印刷。滿鐵公學堂 10 校與補充學校 3 校都使用共同的課本，這可能是成本考量下的結果，滿鐵公學堂原本多元使用教科書的情況，開始有所改變。¹⁶⁶

1931 年 4 月，滿鐵公學堂完成部分的自編教科書，《新時代常識教科書》（常識為初級一、二年級社會科）全四冊，《新時代國語讀本》初級一、二年級四冊，都是低年級使用的課本。與商務印書館同樣使用「新時代」之名稱，頗有互別苗頭之意。滿鐵版的《新時代國語讀本》，是商務 1922 年《新學制國語教科書》與 1927、28 年《新時代國語教科書》的混合。以初年級第二、三冊為例，兩冊合計 100 課，有 34 課來自《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有 7 課來自《新時代國語教科書》。與商務版的《新時代國語教科書》相較，一些「不適當教材」消失了（見表五），這些消失的課文，內容多與中華民國之國家認同、對日認識有關。¹⁶⁷滿鐵教育者想藉由這些「優良」教科書的編纂，在附屬地內驅逐「排外」教科書，甚至當時滿鐵地方部長保保隆矣還有想把這些教科書要賣到上海的想法。¹⁶⁸

¹⁶³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71。

¹⁶⁴ 小田獻四郎，〈公學校用滿文教科書について〉，《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51。《「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⁶⁵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75-77。

¹⁶⁶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中国人用教科書の変遷〉，《「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八冊，頁 194-195。

¹⁶⁷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中国人用教科書の変遷〉，《「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八冊，頁 196-202。

¹⁶⁸ 小田獻四郎，〈公學校用滿文教科書について〉，《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5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表五：滿鐵自編《新時代國語讀本》(1931)與商務印書館《新時代國語教科書》(1932)之比較（初級第二、三冊）

課名	滿鐵版	商務版	備註
第二冊第二課	我們的學校	國旗	
第二冊第三課	上學	愛國歌	
第二冊第十八課	希奇真希奇	鳥的恥辱	
第三冊第四課	從村莊到城裡	他爲甚麼要做亡國民呢	新學制 3
第三冊第五課	母親的慈愛 一	好孩子愛國	
第三冊第七課	青草出汗	青蛙與蛇訂條約	蛇暗指日本，青蛙暗指中國
第三冊第八課	懶漢	蛇占青蛙的地位	蛇暗指日本，青蛙暗指中國
第三冊第十五課	誰願意關在你的籠子裡	黃雞與白雞	黃雞與白雞有中國人自立自強，以面對外侮內容
第三冊第二十課	我們的小團體	國慶節	新學制 3
第三冊第二十一課	借燈光	祝賀國慶	新學制 4
第三冊第二十二課	互助歌	孫文	新學制 3
第三冊第二十三課	瞎子和跛子	孫先生小時候的故事	
第三冊第四十五課	泥人妹洗澡	國貨	新學制 2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八冊，頁 196-202。

說明：備註「新學制 3」表示滿鐵版課本該課原文來自商務「新學制」課本第三冊。

1931 年 9 月 18 日，發生九一八事變，1932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建國，滿鐵教育者認為因應新局面也應該有新教科書，最緊要的是地理、歷史教科書的編輯。在當時奉天公學堂堂長坪川與吉的協助下，1932 年 4 月，在「滿洲國」建國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就編成《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從原來的中國到世界的架構，改為「滿洲國」、日本、東洋與世界的架構。¹⁶⁹ 《歷史教科書》上冊為「滿洲史」，下冊為中國、朝鮮與日本並立的東洋史與西洋史，都是中文（見附圖三）；這與同期關東州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上冊為中文的中國史，下冊為日文的日本史不同（見附圖四）。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地理教科書，滿鐵的《地理教科書》上冊為「滿洲」、關東州與中華民國，下冊為日本與世界（見附圖六），都是中文，不過日本地名附上讀音；而關東州的《公學堂地理教科書》，上冊為關東州、「滿洲國」、中華民國，下冊為日本與世界，兩冊皆為日文。「滿洲國」成立後，關東州租借地依舊施行較滿鐵附屬地更靠近日本本國的教育。滿鐵新編的歷史、地理課本，內容則建構相對於中華民國教科書的觀點，如否定中國革命，認為「國民革命以來，爭亂不已，國民的生活，極其不安」；或是將張學良政權、國民政府描述為無道的政權，如「學良忘敵仇，竟與蔣介石相提攜」。¹⁷⁰ 「忘敵仇」認為張作霖之死為國民黨所為，

¹⁶⁹ 小田獻四郎，〈公學校用滿文教科書について〉，《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5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⁷⁰ 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五冊，頁 7-44、59-142、231-257、303-428。

「相提攜」指的是「東北易幟」一事，這反映了滿鐵教育者對中國東北時局的不滿。

國語則是已出版的《新時代國語讀本》初級一、二年級四冊略加修訂，如圖七左方將國旗改為滿洲國國旗，正在編輯初級三年級以上之課本，則改用新的編輯方針，於 1932、33 年陸續出版。1932、33 年編的初級三、四年級課本，與 1931 年編的初級一、二年級課本相較，初級一、二年級課本沒有出現的地理、國民教育題材，卻在初級三、四年級課本大量出現，如描述「滿洲國」建國的「建國的早晨」、「滿洲國歌」與「王道主義」等課，這恐怕是編寫課本者想試圖迅速建立學童對「滿洲國」認同的結果。¹⁷¹「新時代」常識教科書全四冊因為「不適當」內容太多而放棄使用，正在編輯之課本「新時代」公民教科書，也改用新的編輯方針，與國語課本一樣，首先改訂字句，將「滿洲」改為「我國」，將「我中國」改為「那中國」。¹⁷²這些教科書是以後「滿洲國」教科書的雛形。¹⁷³

隨著 1933 年以降，「滿洲國」局勢的逐漸穩固，¹⁷⁴滿鐵公學校（公學堂 1931 年以後改稱公學校）從中國轉為「滿洲國」的國家認同更明確化，¹⁷⁵1934 年滿洲國語讀本、1935 年滿洲國史教科書、日本歷史教科書、1934、35 年修身教科書陸續編成。¹⁷⁶1937 年滿鐵附屬地回歸於「滿洲國」，滿鐵附屬地與「滿洲國」間的差異完全消弭。



¹⁷¹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中国人用教科書の変遷〉，《「滿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八冊，頁 201。

¹⁷² 小田獻四郎，〈公學校用滿文教科書について〉，《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5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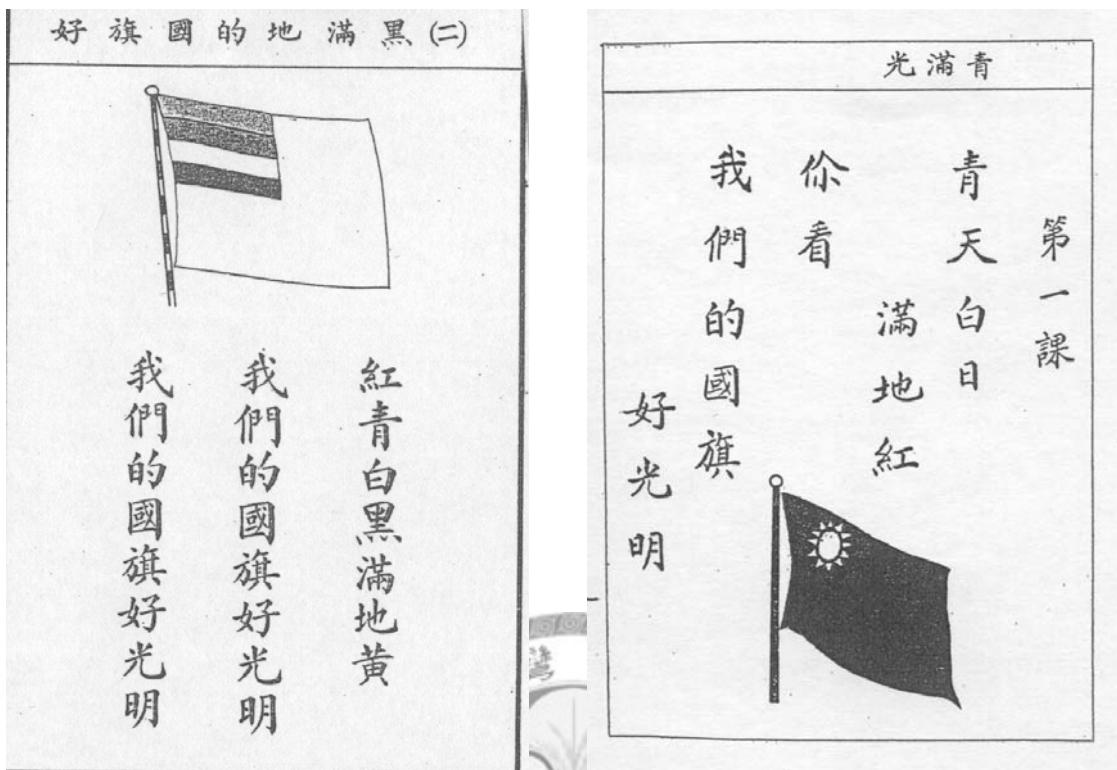
¹⁷³ 磯田一雄，《皇國の姿を追って》(東京：皓星社，1999)，頁 275。

¹⁷⁴ 小林英夫認為 1933 年關東軍取得熱河一事，使「滿洲國」成立的局勢大致底定。不過，直到「滿洲國」消失，反日游擊隊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滿洲國」政府。小林英夫，《〈滿洲〉の歴史》，頁 122。

¹⁷⁵ 見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頁 60-67。

¹⁷⁶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編，《公學校日語學堂教育の實際》，頁 30、37、49-50。《「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九冊。

圖七：滿鐵附屬地與關東州租借地使用課本中出現的國旗



左方為 1932 年滿鐵附屬地使用的《新時代國語讀本》第一冊第十一課課文

右方為 1932 年關東州租借地使用的《中國文教科書》卷二第一課課文

為何「滿洲國」建立後，關東州課文的國旗並未改為「滿洲國」國旗？可能的解釋是關東州與「滿洲國」的關係不如滿鐵附屬地密切，不需立即建立對「滿洲國」的認同所致

肆、滿鐵公學堂與「排日」教科書

在滿鐵公學堂與「排日」教科書部分，藉由 1929 年的《支那排日教材集》與 1931 年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打倒日本》兩個對「排日」教科書的收集與批判案例，我們將看到教科書問題如何擴大成為政治、外交問題，日本方面關於「排日」教科書論述如何定型化的過程。

一、1929 年的《支那排日教材集》

前面提到 1928 年底東北易幟一事對在滿日人的衝擊相當大，滿鐵日本人教育者很快地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回應。1928 年 10 月，在東北易幟之說風聲鶴唳之際，長春公學堂堂長小林治郎就有意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¹⁷⁷ 在 1929 年 1 月滿鐵公學堂堂長會議上，小林提議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曾任滿鐵學務課長，時任地方部長的保保隆矣認為「使日本人認識，並進一步向世界控訴支那『排日』教育是緊要之事」，因而決定進行中國「排日」教科書的調查。¹⁷⁸



圖八：小林治郎

小林治郎（1882-?），廣島師範學校畢業。¹⁷⁹ 1912 年教導長春小學校支那學生班，1919 年至北京留學一年，目擊五四運動，歷任四平街、開原與長春公學堂堂長。1924 年、1928 年底滿鐵附屬地長春地方委員會兩度向全滿地方委員會聯合會提出廢除公學堂的提案，認為「阻礙日支親善與滿蒙開發」，小林與長春地方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論戰。他認為滿鐵公學堂不只維持現狀，還要以能收容附屬地內所有兒童為目標，是滿鐵公學堂教育的「積極擴張論者」。¹⁸⁰

保保隆矣（1883-?），1910 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¹⁸¹在學時通過高等文官行政科試驗，1911 年畢業時獲得成績優秀學生才能獲得的天皇御賜銀表，進入當時官僚嚮往的內

¹⁷⁷ 小林治郎，〈滿人教育の回顧〉，《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62。《「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⁷⁸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 71。

¹⁷⁹ 竹中憲一，「『滿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冊，頁 249。

¹⁸⁰ 小林治郎，〈滿人教育の回顧〉，《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59-163。《「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⁸¹ 東京大學正式成立於 1877 年，1886 年至 1947 年稱為東京帝國大學，1886-1919 年間採分科大學制，1889 以後有法、醫、工、理、文與農六個分科大學。見東京大學網站「東京大學の歴史」：

http://www.u-tokyo.ac.jp/gen03/b03_01_j.html （2009 年 7 月 14 日瀏覽）

務省任職。¹⁸²後來在愛知縣歷任警察署長、郡長、工場課長，因 1918 年有效壓制米騷動而聞名。原本走菁英官僚路線的保保，在 1920 年做了一個改變自己生涯的重大決定，就是渡滿擔任滿鐵地方部學務課長。學務課長要管理 700 公里長的滿鐵附屬地各教育機關，被認為是個重要的職務，一般由重要人物來擔任。¹⁸³保保之所以選擇渡滿，很大程度是薪水的考量，擔任滿鐵的課長，薪水是原來的兩、三倍。不過一旦渡滿，就不容易回到日本本國的官僚體系中。保保事後對自己選擇渡滿一事，頗為後悔。¹⁸⁴

對保保隆矣個人而言，選擇來到「滿洲」，也許是個錯誤決定。不過，對滿鐵教育來說，保保卻是相當重要的一號人物。保保在 1920 年與 1923 年，兩度就任滿鐵學務課長，被認為是真正的學務課長。¹⁸⁵他取得上司地方部長，也就是後來擔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1875-1944）的信任：「如果是教育的事情，就交給保保。」¹⁸⁶他在學務課長任內，相當積極地強調日本人教育「現地適應主義」的方針，希望為日本在滿洲的長期殖民做準備，因而重視中國語教育、體育。在滿鐵財政吃緊時代，無視滿鐵教育人員的反彈，執行滿鐵會社既定裁員的政策。保保是警務官僚出身的能吏，在 1920 年代的滿鐵教育界有相當的影響力。¹⁸⁷

長春公學堂堂長小林治郎提議收集「排日」教科書一事，相當具代表性。小林在滿鐵公學堂服務超過二十年，是滿鐵公學堂的元老級人物。保保隆矣曾指出滿鐵小學校長與公學堂長的不同：

當時的校長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由於在內地無法如意，認為在滿洲可以存錢而渡滿者；第二種是有國士風，日俄戰爭後留下來的胸懷滿洲併吞論之野心

¹⁸² 1899-1918 年中，當時東京帝大法科大學的畢業生能獲得御賜銀表的只有 88 人。明治四十三年（1910）高等文官試驗行政科 130 名合格者中，在學中就已及格者僅 8 人。當時日本內務省管轄地方行政、警察、土木、衛生、社會福利與宗教等業務，管轄的業務是現在三至四個部會的管轄範圍。更由於內務省管轄選舉業務，對政界的影響很大，內務省相當被重視，吸引了「富野心與活力的秀才們」。見秦郁彥著・梁鴻飛、王健譯，《日本官僚制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 20-30、253-258。秦郁彥編，《「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頁 469-471。

¹⁸³ 草柳大藏，《実録滿鉄調査部》，頁 236-237。

¹⁸⁴ 1910 年高等文官行政科及格者 130 人中，初任官進入內務省的有 42 人。其中，擔任過地方知事職務有 14 人、中央官廳局長的有 3 人。保保最終的職務是滿鐵地方部部長，同樣擔任過滿鐵地方部部長的中川健藏，離開滿鐵後擔任香川縣知事，滿鐵地方部部長在官僚體系的地位應略低於地方知事，保保的職務只能說是中等的發展。對當初成績名列前茅的保保來說，對自己沒有在本國官廳繼續發展一事，仍耿耿於懷。保々隆矣，〈思ひ出るまゝ〉，《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4。《「満洲・滿洲国」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秦郁彥編，《「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頁 165、469-471。

¹⁸⁵ 西村秀治，〈保々學務部長とその當時〉，《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6。《「満洲・満洲国」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⁸⁶ 保々隆矣，〈思ひ出るまゝ〉，《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11。《「満洲・満洲国」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⁸⁷ 竹中憲一，〈滿鐵學務課長保々隆矣小伝（一）〉《教育における民族的相克——日本植民地教育史論 I》（東京：東方書店，2000），頁 173-207。

勃勃者。小學校長比較上多為前者，公學堂長大多為後者。從有活力的觀點來說的話，公學堂長會議是有趣的，同時脫線行為、狂暴言論相當多。¹⁸⁸

我們無法瞭解小林是不是就是上述的「野心勃勃者」，不過從引文中可以看到在滿鐵的教育者中，公學堂堂長屬於比較特別的一群人。相對而言，公學堂堂長比較具有某種理念性，以小林為例，他認為滿鐵中國人教育的目標是：

……吾人中國人教育之目的為，使彼等受和平教育，即引導他們可以過幸福安定之生活、作為國際的優秀中國公民、作為所處環境之友民、使其充分了解日本現在之國情，此為吾人確信之事。¹⁸⁹

這很明顯是以日本人為本位來思考的中國人教育，滿鐵公學堂的日本教員以一種指導者的立場，希望培養一群可以和平相處、了解日本的中國人。不過當外在的環境與其理念有所落差時，心中的頓挫與不滿，恐怕難以避免。

表六：參與蒐集「排日」教科書的滿鐵公學堂長之略歷

姓名	略歷
小田獻四郎	蓋平公學堂教員(1920-25) 四平街公學堂長(1926-29) 學務課督學(1930)
小林治郎	長春小學校中國學生班(1912) 長春公學堂(1913-17) 四平街公學堂長(1922-26) 開原公學堂長(1923-24) 長春公學堂長(1924-33) 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主任幹事(1922)
坪川與吉	蓋平公學堂教員(1914) 蓋平公學堂長(1915-22) 奉天公學堂長(1922-30)
森田良一	蓋平公學堂教員(1919-29) 蓋平公學堂長(1928-29)
荒木馨	開原公學堂教員(1919-21) 撫順公學堂長(1922-30) 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主任幹事(1932-35)

資料來源：榎木瑞生，〈満鉄の教師たち——中国人教育に携わった日本人の履歴〉，《同朋大學紀要》，頁 78-103。

另外長春公學堂所處之長春附屬地在滿鐵各附屬地中，「排日」氣氛相對地高。長春是南滿鐵路終點，中東鐵路起點，可說是當時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的最前端，「排日」神經特別敏感。¹⁹⁰ 1915 年廿一條要求前後，長春其他學校學生到公學堂示威抗議，在公學堂附近張貼招生海報，公學堂學生有滿鐵徽章的帽子被奪去扔到地上，從長春城內來的通勤學生紛紛轉學；1920 年因公學堂學生被酒醉日本站員毆打，引發全員罷課；1925 年五卅事件時，通勤學生一些不敢上學，來上學的學生，放學時由老師護送回家。¹⁹¹ 長春公學堂堂長小林治郎提議收集「排日」教科書一事，似乎並非偶然。

¹⁸⁸ 保々隆矣，〈思ひ出るまゝ〉，《満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9。《「満洲・満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¹⁸⁹ 小林治郎，〈中國人教育を回想して將來に望む〉，《南滿教育》，特別號（大連，1926.11），頁 26-27。《「満洲・満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四冊。

¹⁹⁰ 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冊，頁 118-121。

¹⁹¹ 伊豆井敬志，《満鐵附屬地經營沿革全史》（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9），下冊，頁 413-414。

保保隆矣要求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負責調查中國「排日」教科書。1929年2月，由原來「中國側教科書調查委員會」的三位委員，撫順公學堂長荒木馨、四平街公學堂長小田獻四郎、蓋平公學堂長森田良一，再加上長春堂長小林治郎與奉天公學堂長坪川與吉共五人，分擔調查工作。長春公學堂負責三民主義、黨義科；四平公學堂是公民、常識科，撫順公學堂是國語科，蓋平公學堂是歷史、地理與黨化科，奉天是社會與唱歌科。¹⁹²可以說，中國「排日」教科書的調查工作是滿鐵公學堂的共同成果。

保保隆矣雖然想使日本與世界認識中國的「排日」教育，不過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計畫或目標，直到預計1929年10月在京都召開的太平洋會議，才讓事情有了眉目。太平洋會議正式名稱為太平洋問題調查會（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IPR），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為中心，關心太平洋地域周邊事務的民間國際會議，以現在的用語來說是一種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從1925至1958年共召開13次，在當時被認為與國際聯盟、泛美會議並列三大國際會議。每次太平洋會議會有一個主題，1929年第三次京都太平洋會議的主題是當時頗受注目的「滿洲問題」。¹⁹³

日本方面相當重視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以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理事長新渡戶稻造（1862-1933）為團長，團員有曾任滿鐵副總裁的松岡洋右（1880-1946）、曾任奉天總領事的船津辰一郎、中國問題專家長野朗、東京帝大教授臘山政道（1895-1980）、國際法學者信夫淳平（1871-1962）、曾任臺灣民政長官，當時在朝日新聞任職的下村宏（1875-1957）與眾議院議員鶴見祐輔（1885-1973）等人。¹⁹⁴日本代表團的成員，有中國問題專家、媒體人、學者、外交官及有「滿洲」經驗者，恐怕是針對「滿洲問題」而特別挑選的一時之選。日本代表團並在正式會議之前，召開數次的準備會議，並事先至中國東北蒐集資料，日本方面可說是有備而來。

在中國方面，也沒有忽視這次會議。哈佛大學畢業的教育家余日章（1882-1936）為團長，團員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1876-1951）、南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何廉（1895-1975）、金融家同時也是《大公報》的社長吳鼎昌（1884-1950）、燕京大學教授國際法學者徐淑希。在會議中，徐淑希與松岡洋右就「滿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¹⁹⁵

一個問題是，為何中日雙方特別是日本，如此重視太平洋會議這樣不具實質影響力的非官方會議？事實上，與會者也知道此會議實質的意義不大，有不少表演成分在其中。與

¹⁹²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頁66-77。

¹⁹³ 山岡道男，《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研究》（東京：龍溪書舍，1997），頁1、119-153。

¹⁹⁴ 新渡戶稻造編，《太平洋問題：一九二九年京都會議》（東京：太平洋問題調查會，1930），頁9-16。

¹⁹⁵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東京：中央公論，1989），頁25-30。

會的日本記者松本重治（1899-1989）發現在會議中激辯的徐淑希與松岡洋右兩人，十五分鐘後卻和氣地一起用餐，「知道了國際會議原來有正面表演與背後技巧的。」¹⁹⁶

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時的國際局勢。一戰後藉由凡爾賽條約與華盛頓會議，出現了重視集體安全與協調路線的國際秩序，一般稱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雖然這樣的國際秩序相當不安定，我們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影響力不能過度高估。¹⁹⁷不過在這樣的國際秩序下，至少在理念上，民族國家成為世界體系中合法政治形式的情況已確立，¹⁹⁸各國特別是日本這樣仍稱為帝國的國家，對外不能採取過去赤裸裸帝國主義的外交形式；對內則要尋求的國民支持，民主的正當性越來越不能小覷。¹⁹⁹簡而言之，一戰後的帝國主義要比過去的帝國主義更重視正當性，必須獲取國內外更廣泛的支持。臘山政道說明日本參加太平洋會議有兩層考慮，一層是扭轉國際在討論「滿洲問題」時，同情中國而將日本視為被告的情況；另一層則是向日本國民解釋、說明。²⁰⁰對中國與日本政府而言，參與國際會議最主要的目的，也許是趁機向國內外輿論宣傳，至於能否藉國際會議解決實質問題，恐怕尚在其次。

太平洋會議如何與滿鐵公學堂接連上關係？1927年曾在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任職後在滿鐵工作的武田胤雄告知保保隆矣等人，1929年秋天即將召開太平洋會議討論「滿洲問題」，滿鐵應預先準備。不過，當時包括保本人，對太平洋會議的重要性並不瞭解，還有人認為太平洋會議「不過是美國傳教士洋和尚們的集會」。²⁰¹直到1929年3月，臘山政道等人到中國東北蒐集相關資料時，保才意識到太平洋會議的重要性。此時滿鐵公學堂已在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在與副社長松岡洋右討論後，決定將收集的資料譯成英文，由滿鐵監事（審查役）田所耕耘負責，武田胤雄、督學（視學）伊藤伊八、小島憲市等人翻譯。²⁰²最後譯成《中華民國教科書內發現之排外記事》（中華民國教科書に現はれたる

¹⁹⁶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頁25-26。

¹⁹⁷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從一開始就很不完備，美英日各國仍為自己的利益盤算，蘇聯、中國在此體系中被忽視，這也是為何1930年代初「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已瀕臨瓦解。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47-48。川島真著・廖淑敏譯，〈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頁81-90。

¹⁹⁸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9-25.

¹⁹⁹ 因此，學者Andrew Gordon認為日本近代史的大正民主時代可以「帝國民主主義」(imperial democracy)一詞概括。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1.

²⁰⁰ 新渡戸稻造編，《太平洋問題：一九二九年京都會議》，頁225。

²⁰¹ 保々隆矣，〈松岡總裁と京都の太平洋會議——支那排日教材集〉，《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259。《「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²⁰² 保々隆矣，〈松岡總裁と京都の太平洋會議——支那排日教材集〉，《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257-261。《「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排外記事、Anti-Foreign Teachings in Text-Books of China)一書，在太平洋會議中發給與會人員。²⁰³書名使用「排外」而不使用「排日」，用意也許是要向國際訴說，中國「排外」行為的普遍性，而非僅針對日本而來。

同時，滿鐵也計畫向日本本國出版收集的「排日」教科書。保保隆矣原本的想法是以「滿鐵地方部」的名義出版，不過松岡洋右要求在東京出版，最後由田所帶給東亞經濟調查局理事長大川周明（1886-1957），由大川注解後，在1929年9月出版了《支那排日教材集》。²⁰⁴值得留意的是，此次的書名使用「排日」而不使用「排外」；而松岡要求不以「滿鐵地方部」的名義，並在東京出版，可能是想增加該書在日本本國的普及程度。



圖九：松岡洋右
從上面的事情可看到，滿鐵公學堂收集的中國「排日」教材的出版，滿鐵副社長松岡洋右的影響力很大。松岡洋右（1880-1946），美國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畢業，1904年通過外交官試驗進入外務省，在當時日本外交官中以英語流利著稱。1919年擔任巴黎和會日本代表團的隨員，負責情報工作，對日本代表團在和會中，語言、宣傳能力的貧弱感到失望，在1921年離開外務省到滿鐵擔任理事。²⁰⁵

松岡洋右之所以來到滿鐵，某種程度來自於他對日本帝國發展策略的想法。他認為對日本帝國最具威脅的國家是俄國，而俄國革命造成俄國在東北亞力量的真空，正是日本發展的大好機會，作為當時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實質重心的滿鐵，是他發揮理想的大好場合。²⁰⁷「滿洲」經驗也成為松岡後來很重要的政治資本，1929年10月擔任太平洋會議代表，與徐淑希就「滿洲問題」進行辯論，受不少日本人贊賞；²⁰⁸1931年1月擔任眾議員時，發表「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言論，²⁰⁹儼然成為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滿蒙積極論」的代表人物。因此才有1933年松岡擔任日本國際聯盟全權代表，發表脫離國聯演說，及

²⁰³ 〈太平洋問題パンフレット「和」第十三号／「満州事変ニ關スル諸誘因雜集」〉，《日本外交文書》，JACAR.B02030187900，畫面2。

²⁰⁴ 保々隆矣，〈松岡總裁と京都の太平洋會議——支那排日教材集〉，《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260。《「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²⁰⁵ 三輪公忠，《松岡洋右——その人間と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32-37、42-44、56-57。

²⁰⁶ 松岡洋右 1921.7-1926.3 擔任理事，1927.7-1929.8 擔任副社長、副總裁、1935.8-1939.3 擔任總裁。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会社」の全貌》，頁70、244-249。

²⁰⁷ 松岡此時積極與張作霖談在中國東北北部「培養線」的問題，所謂「培養線」是名義為中國所有，但由日本出資所建的鐵路。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会社」の全貌》，頁75-77。

²⁰⁸ 媒體人德富蘇峰（1863-1957）說松岡在太平洋會議的表現，可比日本戰國武將本多忠勝在德川家與豐臣家的小牧山之戰（1584）之表現。保々隆矣，〈松岡總裁と京都の太平洋會議——支那排日教材集〉，《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257。《「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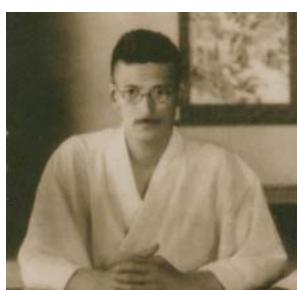
²⁰⁹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頁112。

後來回到日本政界擔任外務大臣的事情。松岡洋右與後藤新平是當時日本政界「由外而內」，由殖民地返回本國政界的顯著例子。²¹⁰

松岡洋右並非一位有著深邃理論的政治家，但他擅長掌握輿論的動向，將既有的事物，以嶄新的詞彙表達，如他創造了「滿蒙是日本生命線」、「大東亞共榮圈」等詞彙。²¹¹用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民粹政治家。松岡很能理解宣傳的重要性，在他的主導下，1929年出版了《中華民國教科書中出現的排外記事》、《支那排日教材集》兩書。由於缺乏足夠的史料，我們並不清楚這些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過滿鐵教育者，對中國「排日」教育的反擊，確實獲得了初步的落實。

二、1931 年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

1931 年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打倒日本》是《支那排日教材集》一書的重新刊行，但其「恰巧」於九一八事變前夕重新刊行，恐怕與右派分子用以製造九一八事件戰爭輿論有關。學者加藤陽子認為，雖然九一八事變的結果是日軍輕易的占領東北，但我們不能以後見之明以為日本關東軍在一開始便已料想此結果。事實上在關東軍事前的估算中，認為關東軍與東北軍將近一比十的懸殊兵力落差情況下，發動事變必須有長期雙方僵持的準備，因此積極鼓吹國內、國外輿論的支持有其必要。²¹²



圖十：大川周明

《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的出版者是一位著名右派思想家，同時也是宗教研究者的大川周明（1886-1957）。他在東京審判時之所以作為唯一的民間人士 A 級戰犯受審，可能就是因為其與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有著很密切的關係。1911 年大川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印度哲學科畢業，在研究印度哲學的過程中，對印度過去與現勢的思考，使他開始關心有色人種被壓迫的問題，並產生以下的想法：

印度過去有深奧的哲學，卻在近代為英國殖民，這是精於冥思，卻拙於力行的結果。因此，思想與行動結合是必要之事。²¹³大川相當強調思想的實踐性，這是大川思想一個很大的特色。

²¹⁰ 後藤新平在離開滿鐵後，擔任過遞信大臣、外務大臣與實質上有副首相地位的內務大臣。

²¹¹ 三輪公忠，《松岡洋右——その人間と外交》，頁 85-86。Louise Young 對「滿蒙生命線」有深入的分析，「生命線」一詞使日本國民與「滿洲」產生一種有機體的結合感。一方面喚起國民對日俄戰爭的回憶，產生世代間「血的恩義」之連結；一方面則使國民感受經濟上的強烈不安感，暗示「無限的寶庫」——「滿洲」是脫離困境的最好途徑。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pp. 88-95.

²¹² 加藤陽子，《滿州事變から日中戦争へ》，頁 18-19。

²¹³ 竹内好，〈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大川周明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頁 402-406。

大川周明在 1918 年進入滿鐵，於滿鐵調查部、東亞經濟調查局任職。東亞經濟調查局在 1908 年於東京成立，是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理念的具體實踐。東亞經濟調查局是滿鐵的外圍組織，除了進行經濟調查工作，也負責向國際宣傳滿鐵經營成效。²¹⁴ 大川研究的是滿鐵關切的特許殖民公司問題，在 1926 年得到東京帝大博士學位。²¹⁵ 1929 年大川說服滿鐵高層，使東亞經濟調查局財團法人化，滿鐵與東亞經濟調查局分離，大川擔任東亞經濟調查局理事長，握有實權。獨立後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更不受滿鐵拘束，成為大川實現復興亞洲夢想的「梁山泊」。²¹⁶

大川周明在 1919 年創立右派組織「猶存社」，邀請北一輝（1883-1937）加入，1925 年則創立「行地社」。²¹⁷ 1927 年大川與北一輝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揚鑣，反而得到了與過去一直警戒北一輝的陸軍接近之機會。大川屢次至參謀本部、士官學校演講，並與陸軍年紀相近有中國經驗者，如小磯國昭（1880-1950）、岡村寧次（1884-1966）、板垣征四郎（1885-1948）、土肥原賢二（1883-1948）與河本大作（1883-1955）等人逐漸親密，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志。²¹⁸

大川周明從對特許殖民公司與亞洲諸文明的研究中，得到未來是超大國爭鬥時代的結論。因此，從大正末期開始，大川相信本國資源貧乏的日本必須取得「滿蒙」，才能在超大國爭鬥時代中生存。但日本在「滿洲」的勢力卻在中國的「排日」風潮與日本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病下，日漸衰弱。1928 年夏天東北易幟前，大川與張學良見面，認為不少日本人以為張學良只是個貴公子，沈溺於鴉片的說法是錯誤的，對張學良相當警戒。1928、29 年左右，大川認為日本國內勇於內鬥的政黨與腐敗的資本家已經無可救藥，不值得依賴，要解決「滿蒙問題」只能靠日本國民。因此，1929 年 4 月起到九一八事變前後，大川開始在日本全國巡迴演講，一個縣演講三至五個地方，試圖喚起輿論的支持。大川至少在 1931 年 5 月時，從板垣征四郎那邊知道，「滿洲」即將有事發生，而要有「重大覺悟」。

²¹⁹

²¹⁴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頁 74-80。

²¹⁵ 大川認為特許殖民公司的歷史以十九世紀後半為界，可分為前後期。前期的公司商業性質較高，後期則是國家性質較高。他認為特許殖民公司是國家直接殖民統治的過渡階段。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東京：講談社，2009），頁 113-114。

²¹⁶ 1920 年代的滿鐵與日本本國政黨政治關係密切，一旦政黨輪替，滿鐵高層人事也會受牽連，連帶影響東亞經濟調查局調查。中村孝志，〈大川周明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大川周明日記》（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86），頁 519-526。

²¹⁷ 猶存社名稱的典故來自魏徵〈述懷〉詩中的「縱橫既不就，慷慨志猶存。」；行地社則來自「則天行地」一語，「則天」是認識、把握理想，「行地」則是將這樣的理想的實踐。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頁 124、137。

²¹⁸ 〈詢問調書（大川周明）〉，《現代史資料》，國家主義（5），頁 690-691。

²¹⁹ 如 1931 年 4 月，大川在愛知縣名古屋市演講「滿蒙問題概論」，並播放電影「滿蒙的資源」，吸引了 1800

從以上的背景我們可以瞭解，重新出版關於中國「排日」教科書的書籍，或許也是大川周明喚起輿論的途徑之一。「縮刷普及版」《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在 1931 年 8 月 26 日，由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這本書是 1929 年發行《支那排日教材集》的重新印刷，內容一致。《打倒日本》一書於 1931 年 9 月 1 日，以滿鐵前地方部長保保隆矣監修的名義，由邦文社出版，保保隆矣當時離開滿鐵，擔任邦文社的社長。²²⁰

《打倒日本》書中的「排日」記事也與《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相同，與《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相呼應。

《打倒日本》與《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如何看待中國的「排日」教育？對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有怎樣的影響？《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的序談到：

以萬寶山事件為契機，排日運動又以各種形式不斷擡頭、瀰漫於支那南北。若有一其為一時之現象者，此為過於缺乏深思之觀察。排日運動從當初感情的、無賴的雷同，漸次成為理智的、有組織的、有國家背景之事，為吾人所要深甚注意之處。

其問題是在彼處否？我霞關²²¹以其好人的、紳士的外交，雖不斷專念於使彼親日之事，為支那對日政策之根幹者，實「排日」一語盡矣。面對支那政府當局不擇手段方法、不斷努力普及排日思想，彼我外交遂為永不相交之平行線。

鄰邦政府當局所採之排日煽動方法，不止二三事，吾人最奇怪之處為，其國定教科書中隨處羅列排日記事、不斷灌輸排日毒酒於純真兒童之事。且此種記事大部分於真正史實有所曲筆，極力宣揚對日反感。想到受如斯教育兒童成人後於彼我國交之影響，吾人真不得不禁戰慄也。²²²

從上面我們可看到三個要點：首先，認為當時中國的「排日」運動已成為一持續、由國家主導、有計畫的運動。其次，指責日本當時外交政策，無法解決「排日」運動問題，「好人的、紳士的外交」暗指外相幣原喜重郎（1872-1951）的協調外交路線。²²³最後，認為

名聽眾；之後受邀為第二師團演講，有 800 名將校參加；在豐橋市演講，吸引了 1200 名聽眾，是該市未曾有的盛況。〈演講會記事——愛知縣下にて〉，《東亞》，1931：6（東京，1931.6），頁 163。〈詢問調書（大川周明）〉，《現代史資料》，國家主義（5），頁 692-695。

²²⁰ 從《打倒日本》版權頁中得知邦文社地址在帝國教育會會館內，邦文社與帝國教育會應該有某種程度的聯繫。帝國教育會（1896-1944）是一個國家主義教育色彩濃厚的組織，其特徵為與皇族、文部省、府縣教育行政機關關係密切，常協助政府推行國策、教育政策。芝崎文仁，〈帝國教育會〉，《文學と教育》，171（東京，1995.11），頁 57-59。

²²¹ 霞關，此處為日本外務省的代稱。霞關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南部，為日本外務省所在地。

²²² 東亞經濟調查局編，《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序頁 1。

²²³ 但必須留意的是，幣原協調外交的局限性。幣原仍以維持甚至擴大日本國家利益為考量，只是他著眼於日本在華經濟的發展，而非政治、軍事的發展，相對地溫和。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在まで〉，頁 91-95。

在中國的「排日」運動中，「排日」教育相當惡毒、影響也相當深遠，若使純真兒童被灌輸「排日」思想，後果不堪設想。

《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的影響力恐怕不低。以《打倒日本》為例，該書得到了前首相清浦圭吾（1850-1942）、媒體人同時是國家主義者德富蘇峰（1863-1957）、《大阪朝日新聞》的書評推薦。²²⁴到九一八發生的當天，《打倒日本》出版到第 15 版，在之後的 20 天又印行到第 35 版，也許是使用發送的方式，而達成 38 天發行 35 版這個驚人的數字。²²⁵「打倒日本」與「滿蒙生命線」一樣，一時成為日本的流行語。²²⁶1931、32 年日本出版界的特色之一，便是對滿蒙時局的關心（見表七），九一八事變後，關於滿蒙而出版的專書大量增加。但《支那排日教材集》（8 月出版）、《打倒日本》（9 月出版）與其他中國、滿蒙問題專書不同之處在於，它們不是因應大眾的戰爭熱而出版的書籍，它很有可能是製造大眾的戰爭熱而出版的書籍。

表七：1931-1932 年日本各月分中國、滿蒙／政治、外交出版書籍數量表

1931 年日本出版書籍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中國、滿蒙/政治、外交	5/31	5/39	11/60	29/55	45/93	36/95
1932 年日本出版書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中國、滿蒙/政治外交	22/52	26/92	30/75	28/62	24/59	25/80

資料來源：1931-1932 年份之《內務省納本月報》；圖書研究會，《綜合出版年鑑》，頁 1-33、963。

《打倒日本》與《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強化了日本國內認定中國教科書就是「排日」教科書的認識，這樣的認識恐怕是要正當化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是「不得已」行為的想法。我們無法瞭解《打倒日本》與《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對當時的日本輿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過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輿論確實陷入了戰爭熱。關東軍之所以無視若槻禮次郎（1866-1949）內閣的不擴大方針，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輿論的支持。²²⁷此後至中日戰爭爆發，「排日」教育是中國國家有意安排這樣的「排日」教科書認識，成為當時日本民間主流的「排日」教科書認識，滿鐵公學堂的教科書問題成為普遍的中日教科書問題。²²⁸

²²⁴ 保々隆矣監修，《打倒日本——支那排日教材集》，附錄頁 1-4。《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第五卷。

²²⁵ 經周婉窈老師指點，發行量如此大很有可能是發送的結果，但目前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佐證，無法證明這樣的假想是否成立。

²²⁶ 保々隆矣，〈松岡總裁と京都の太平洋會議——支那排日教材集〉，《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頁 258-259。《「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一冊。

²²⁷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pp.55-114.

²²⁸ 川島真，〈中日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問題為主〉。川島真研究室，網址：

www.juris.hokudai.ac.jp/~shin/。九一八至蘆溝橋事件日本所出版與「排日」教科書有關的書籍有：

北支居留民有志編，《支那小學校における排日教育の實相》（出版地不明：出版者不明，1935）。

池田弘編，《現代支那の政情——苛烈深刻挑戰的排日教育の實相》（東京：回天時報社，1931）。

伍、《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之分析

本部分將對《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進行分析，試圖理解兩書編輯者如何理解中國教科書的「排日」記事，對近代中日間歷史事件與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看法。

一、兩書中所見之中國教科書問題

以下筆者將對目前手中可取得的 1931 年出版之《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進行分析，試圖瞭解《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怎樣理解、論述當時中國的教科書問題。至於兩書所理解之中國的教科書問題是否就能確實反映當時中國教科書的真實狀況問題，由於當時中國教科書多版本、種類繁多的特色，使得要有體系地蒐集當時的教科書並加以分析有其困難性，本論文無法對此問題提出解答，在此僅就兩書中內容進行基本之分析。

1931 年 8 月出版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為 1929 年 9 月出版之《支那排日教材集》之普及版，此書收錄了 116 項當時中國教科書的「排日」、「排外」記事，每一項都有中文原文與日文譯文，可能意圖顯現其可信度，此外還有關於中國教科書「排日」記事的 13 項註釋，與當時日本出版的其他與中國「排日」教科書的書籍相較，該書原文、譯文對照的編排方式頗為特別。²²⁹兩書所引課文與原課文有不同之處，不過主要是錯別字，如「為民族努力」成了「為民族勢力」；²³⁰所引課文出處與原文也有不合之處，如應為《新中華三民主義課本》卻成了《新中華國民主義課本》、原文在《新中華國語讀本》第八冊第二十、二十一課，卻記為第八冊第五課。²³¹不過，這些錯誤屬於比較細小的錯誤，大體上引原文大致可信。《打倒日本》與前面提到的《支那國定排日讀本》一樣收錄了 116 項當時中國教科書的「排日」記事，只是註解比《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的註解多，共計 47 項，應該是以《支那國定排日讀本》為基礎再增加的。

若與日本其他同時期與中國「排日」教科書相關書籍比較，將會發現《支那國定排日

風岡一雄編譯，《排日教科書》（札幌：皇道書院，1936）。

後藤蒼洋，《戰慄すべき排日教科書の内容》（東京：支那事情研究會，1936）。

²²⁹ 山住正巳，〈「支那排日教材集」と教科書問題〉，《軍縮問題資料》，150（東京，1992.5），頁 38-45。

²³⁰ 〈中國領土的喪失〉，《打倒日本》，頁 35-36。葉紹良編，〈中國領土的喪失（上）〉，《新中華三民主義課本》（上海：中華書局，1932），第一冊，頁 3。

²³¹ 〈祖母的談話〉、〈中國是列強的次殖民地〉，《打倒日本》，頁 29、154。王祖廉、黎錦暉、黎明編，〈祖母的談話〉，《新中華國語讀本》（上海：中華書局，1932），第八冊，頁 28-31。

讀本》與《打倒日本》的特色，一是對「排日」教育進行有體系之蒐集，一是影響力比較大。其他如中國研究者、外務省與陸軍省出版的相關書籍，大多不是專以蒐集「排日」教科書為目的；即使有，也不採用全書中日對譯的方式，篇幅不如上述兩書。影響力上，外務省與陸軍省的資料多屬內部資料，流通性較低。²³²

《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解說〉部分說明了該書對當時中國小學教科書的觀察：

- 一、本冊為從現在支那於國民教育正在使用的教科書中，選擇排日記事，將其翻譯之書。排日記事散在於地理、歷史、國語、唱歌、公民、社會等所有種類之教科書，但三民主義化、黨化教科書中特別多。
- 一、通觀排日記事，其總括的題目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即對支那、壓迫主義云云。而其內容重點分為，武力的、政治的侵略、經濟的侵略、來自人口增加的壓迫三種。……
- 一、從來之排日記事多在高年級，不過國民政府治下的新教科書與其相反，明顯多在低年級而高年級少，多在小學教科書而中學教科書少。我等認為此蓋彼等相信從〔學童〕幼小之時將排日深植腦中效果甚多之故。
- 一、一瞥記述之體裁，有各科取得巧妙之聯繫，一科之教材得以被運用於各科中之結構。……
- 一、教科書之文章不虧是文字之國〔中國〕之故，誠為巧妙。從來〔教科書〕如例所示，僅是以慷慨悲憤之文句，使兒童情緒高漲，但最近之教科書，其進行之方式有所不同，表面看似尋常平靜之敘述，內容卻極為深刻，欲使兒童在不知不覺之間，於其腦中刻畫深刻印象。……
- 一、比喻巧妙之事也令人吃驚，玩弄如比喻日本為東隣之狡兒、旅順、大連為可憐老婦之雙胞胎、或〔中國〕為老病人、或藉渤海灣海鷗之口說出占領大沽〔砲臺〕故事之筆法。
- 一、文章的種類也運用論說、敘事、敘景、書簡、日記、韻文、戲劇等各式各樣的表現方法，促使對外人侵略支那國民之覺醒。²³³

以上的觀察可以歸納出幾個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中國小學教科書散布「排日」內容，但以與三民主義有關之教科書為多，二、「排日」記事的用意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²³² 目前已知同時期日本與中國「排日」教育有關的書籍有：西尾信治，《新興支那の國民教育》（東京：東京堂，1929）。收於《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第五卷。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支那ニ於ケル排外教育》。收於《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第五卷。

陸軍省，《支那の國定教科書に關する一考察》（東京：陸軍省，1929）。

陸軍省調查班，《支那の排日侮日に就いて》（東京：陸軍省調查班，1931）。

²³³ 保々隆矣監修，《打倒日本》（東京：邦文社，1931），解說頁1、3。

三、中國小學教科書的「排日」記事偏重低年級，四、中國小學教科書運用巧妙、頗具深思的方式進行「排日」敘事。

試著檢視《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的內容。當時中國教科書中最容易出現「排日」內容的是國語、歷史、地理與三民主義教科書。由於授課的年級不同，各科的冊數也不同，國語有 12 冊、歷史有 4 冊、地理有 4 冊、三民主義有 8 冊。《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116 項記事中，以科目區分，最多的是三民主義科，共有 24 項，還多於冊數較多的國語，並且 24 項記事還不括《三民主義千字文》、《小學黨化教材》等相關的課本，《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確實選了與不少三民主義科有關的排日記事。

《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的章節安排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中日關係總說，第二部分為歷史的事件，第三部分為政治，第四部分為經濟，第五部分為社會。兩書的章節安排，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為與日本直接相關的「排日」記事，特別著重於近代中日間像是甲午戰爭、廿一條要求等重大衝突事件，同情臺灣、朝鮮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如第一、第二部分；一為與日本間接相關，討論與帝國主義相關的「排外」記事，如帝國主義對中國如何進行政治、經濟與人口的壓迫，而中國應如何對應，如第三到第五部分。會有這樣的章節安排，恐怕來自於編排者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解，「排日」記事不限於狹義與日本有關的記事，廣義與帝國主義有關的記事也算「排日」記事，這樣或許也試圖說明中國的「排外」具有普遍性，以獲得國內外的支持。

附帶一提的是，日本外務省對當時中國三民主義教育的民族主義教育之觀察，認為三民主義教育的民族主義教育可歸納出三個特色：一、說明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壓迫、侵略中國，外國的侵略分武力、經濟與人口三種方式。二、對此侵略、壓迫的對策，抵抗的方法，積極的是振起民族的精神，消極的是不合作。三、對殖民地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如朝鮮、安南、印度與臺灣。《支那國定排日讀本》、《打倒日本》兩書與日本外務省對國民政府民族主義教育的觀察有相似之處。²³⁴

當時中國小學有 4 年之初級小學與 2 年之高級小學。《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116 項記事中明確可判定來自初級、高級小學課本的有 67 項，其中出自初級小學課本的有 28 項、高級小學的有 39 項，若考慮到初級小學年限較長的情況下，不能不說《支那國定排日讀本》中所載之「排日」記事，出自高級小學課本的比例還是很高。或許兩書中出現出自初級小學課本的「排日」記事之比例確實比過去的課本高，不過要說當時中國教科書的「排日」記事「明顯多在低年級而高年級少」，似乎有些問題。

²³⁴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支那ニ於ケル排外教育》，頁 24-36。收於《中國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第五卷。

若檢視《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的記事，確實不得不對當時中國教科書的巧妙、頗具深思的敘事方式，留下深刻印象，以〈解說〉提到的〈狡惡的隣兒〉與〈可憐的老嫗〉兩文為例：

我的弟弟有個皮球，球上漆著美麗的花，他很喜歡常常拿到一片空地上去玩。

有一天，東隣有個小孩子也跑（跑）到空地上來，要求我的弟弟把這個球和他同玩，弟弟就允許了。他玩了好久，這個小孩子又有進一步的要求，把這球當做兩人公共的玩具，不准我的弟弟帶回。我的弟弟正要和他爭論，他早一腳踢來，把我的弟弟嚇退了。

諸君，這個小孩子並不是這樣把我弟弟的球奪去的，他還想出一個詭計來和我的弟弟說：「我固不讓你把球帶回去，我也不要把這球據為己有的。」說罷，隨手把球拋到自己的屋上去，這時我的弟弟祇得飲恨吞聲的回家了。不多幾天，我的弟弟又遇到東隣的小孩子，眼見他手裡拿著一個球——就是那天拋在屋上的球。（標點為筆者所加）²³⁵

乍看之下，似乎不太容易理解這樣的故事用意為何。但若說明東隣的小孩子代表日本，我的弟弟代表中國，而那顆皮球是朝鮮，對中國近代史有基本認識的讀者應該可以恍然大悟，這是在指中日甲午戰爭、日韓合併的事情。〈可憐的老嫗〉則是：

小孩子跑過街上，看見一個老嫗坐在地上啜泣，小孩問他「你哭甚麼？」

老嫗說：「好孩子聽我告訴你，我有孿生的兩個孩子，一叫履舜，一叫達廉，他們已經長大了。不料一天外出，被暴徒槍（搶）了當苦工去，暴徒雖說過了，二十五年就會送還，但是後來又轉到別的暴徒處去做工了。那個暴徒聽說要過九十九年纔肯送回呢！他們倆在那邊做工，真像暴徒腳下的兩團爛泥，聽他隨便蹴蹋。」……（標點為筆者所加）²³⁶

現實上，當然不可能出現有小孩被捉去，99年後才歸還的事情。這則故事比上篇故事好理解，這明顯指的是「履舜」即旅順、「達廉」即大連先後為俄日租借的事情。兩書蒐集的其他記事也可看到不少類似的記事，如〈海鷗的話〉一文藉渤海灣一海鷗之口，描述英法聯軍如何占領大沽砲臺；〈祖母的談話〉一文藉一位生於鴉片戰爭前一年祖母回憶的形式，談及了鴉片戰爭以來至五卅事件的歷史事件，如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等。²³⁷這些巧妙、頗具深思的記事，確實引起了《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的編輯者的高度注意。

²³⁵ 〈狡惡的隣兒〉，《支那國定排日讀本》，頁 15-16。

²³⁶ 〈可憐的老嫗〉，《打倒日本》，頁 128-129。

²³⁷ 〈海鷗的話〉，《打倒日本》，頁 53-55。〈祖母的談話〉，《打倒日本》，頁 26-30。

表八：《支那國定排日讀本》內容概略

項 目	排日 記事	項 目	排日 記事
第一部 中日關係總說	6	第四部 經濟	8
第二部 歷史的事件	51	第一項 總說 3	3
第一項 倭寇	2	第二項 關稅 1	1
第二項 中日戰爭及其結果	15	第三項 銀行 1	1
第三項 義和團	3	第四項 交通 3	3
第四項 日俄戰爭之結果	6		
第五項 廿一條、山東問題	17		
第六項 五卅事件	4		
第七項 濟南事件	4		
第三部 政治	39	第五部 社會	12
第一項 總說	25	第一項 民族	5
第二項 不平等條約	2	第二項 人口	6
第三項 割讓地、租借地、租界	8	第三項 文化	1
第四項 交通諸權	4		
		小計	116

課 本	排日 記事	課 本	排日 記事
中華書局（初級 9、高級 17）	26	新主義社會課本（初級）	4
新中華國語讀本（初級）	4	新主義地理課本（高級）	1
新中華歷史課本（高級）	8	新主義歷史課本（高級）	1
新中華地理課本（高級）	2	新主義三民主義課本（初級）	6
新中華公民課本（初級）	1	其他	52
新中華常識讀本（初級）	2	三民主義千字課（大東書局）	15
新中華三民主義課本（初級 2、高級 7）	9	國恥讀本（中華愛國社）	11
商務印書館（初級 8、高級 14、不明 3）	25	小學黨化教材	11
新時代國語教科書（初級 7、高級 3）	10	黨化教育唱歌集	2
新時代歷史教科書（高級）	2	三民主義唱歌課本	1
新時代地理教科書（高級）	4	民智國語讀本（民智書局）	3
新時代三民主義教科書（高級 5、初級 1、不明 3）	9	新學制國語讀本（初級）	1
世界書局（初級 10、高級 3）	13	新學制地理教科書（高級）	1
新主義國語教科書（高級）	1	高級地理課本	4
		不明	3
		小計	116

科目	教授年級(1927)	出現「排日」記事	科目	教授年級(1927)	出現「排日」記事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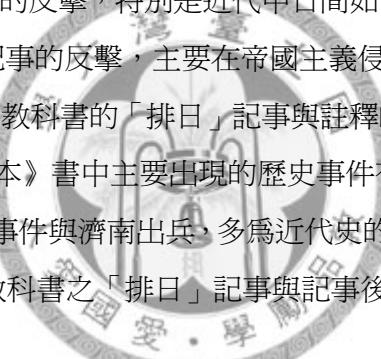
	年以後)			年以後)	
國語	初級一至四， 高級一、二	19(初級 12、高級 4、 不明 3)	三民 主義	初級三、四，高 小一、二	24(初級 9、高級 12、不明 3)
常識	初級一至四	2	歷史	高級一、二	11
公民	初級一至四	1	地理	高級一、二	12
社會	初級一至四	4	其他		43

來源：東亞經濟調查局編，《支那國定排日讀本》。

二、《打倒日本》中所見之中日歷史事件與近代中國

從《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兩書的註釋，或許可以一窺編輯者如滿鐵公學堂的教育者、保保隆矣對近代中國，包括了中日歷史事件、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理解。由於《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中所收之「排日」記事皆相同，而《打倒日本》註釋較多，以下將以《打倒日本》一書之內容為主。《打倒日本》註釋大體上也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對「排日」記事的反擊，特別是近代中日間如甲午戰爭、廿一條要求等重大衝突事件；一為對「排外」記事的反擊，主要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上。

從《打倒日本》所蒐中國教科書的「排日」記事與註釋的反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日歷史認識的差異。《打倒日本》書中主要出現的歷史事件有倭寇、甲午戰爭、義和團、日俄戰爭、廿一條要求、五卅事件與濟南出兵，多為近代史的事件。以書中關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廿一條要求中國教科書之「排日」記事與記事後的註釋為例，〈中日戰爭〉關於甲午戰爭的記事為：



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起因完全由於朝鮮是我國的屬國地位，適在中日兩國的中國〔間〕。自從日本維新，他們的海陸軍都效法歐洲的強國，國勢擴張之後，便想向外發展，中國首當其衝，朝鮮卻做了導火線。……民國前十八年，朝鮮有內亂，兩國同時派兵到朝鮮，亂黨也就潰散，日本藉口要改革朝鮮的內政，不肯退兵，兩國外交因此決裂。（標點為筆者所加）

此記事相當斬釘截鐵地認為甲午戰爭「完全」是日本對外擴張的結果。同項記事的註釋為：趁平定東學黨之機，日本與清國協力，提議欲計畫改革韓廷內政，但清不容於此，更加有欲使朝鮮為其藩屬之實。日本在韓王之贊同下，欲以獨自之力當改革之衝，同時依國王之依賴，追討國內之事大黨，偶與欲援其而來之清艦、清兵衝突，開啟戰端。²³⁸

註釋中的日本作為有心幫助朝鮮改革的國家，而與阻礙朝鮮改革的中國開戰。〈日本在亞

²³⁸ 〈中日戰爭〉，《打倒日本》，頁 18-20。

洲大陸上的發展》關於日俄戰爭的記事為：

日本自中日戰（甲午戰爭）後野心勃勃，也正式想向滿洲與朝鮮謀發展，於是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權益上的衝突便發生……朝鮮是中國的屬國，滿洲是中國的領土，一任他們掠奪，實在是國恥之尤。（標點為筆者所加）

該記事將日俄戰爭的發生理解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野心的持續發展，中國的恥辱不只在於領土被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也在於屬國被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同項記事的註釋為：

三國干涉以來，俄國一面危害日本之保全，一面破壞東洋之和平，逐漸實現對滿韓之野心。……日本為自衛行動與維持東亞之大局，代替支那使朝鮮獨立、保全清國領土而與俄國交涉，兩國關係遂訴非常手段而無解決之道，引起日俄戰爭。²³⁹

註釋中的日本為了自保及保全朝鮮、中國，「維持東亞之大局」，與俄國一戰。〈山東問題〉關於廿一條要求的記事為：

民國三年歐洲戰爭起，日本以對德宣戰為名，乘機奪取我租與德國的膠州灣，並派兵侵入山東。我國提出抗議促其撤兵，日本非但不顧，反於四年一月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那是袁世凱政府，毫無能力，竟於五月九日承認，國民引為大恥，定這日為國恥紀念日。（標點為筆者所加）

該記事認為日本藉機侵入山東，還得寸進尺地提出廿一條要求。同項記事的註釋為：

現行國際法承認戰爭行為。戰爭以打倒敵國所有力量為目的，敵國在第三國擁有之權利，如租借地、鐵道等亦不免為武力行使之對象。因而於日德戰爭中日本出兵山東一事在國際法上為正當之行為。……大正四年之日支交涉不應稱為侵略。於山東日本雖占領膠州灣，在此之前對德國進行勸告，將此處歸還於支那，並無根本永久占領之意志。只是當時英俄之勢力於滿蒙方面大為發展，日本也有鞏固於支那地位必要。從而把握占領膠州灣之機，開啟與支那交涉，確保既得權利之途。²⁴⁰

註釋認為日本出兵符合國際法，提出廿一條要求只是想確保既得權利，並無過分野心。

關於以上對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廿一條要求的說明，哪一種是「正確」的歷史認識的問題，本論文無法在此進行回答。不過從《打倒日本》一書確實可以感受到九一八前夕中日間彼此歷史認識的差異，可說幾乎是到了截然對立的程度。然而，中日間彼此對立的歷史認識也有共通之處，即合理化自己在事件中的立場。中國的教科書中強調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受害者，喪失了原本擁有的權利、土地，如屬國朝鮮。《打倒日本》

²³⁹ 〈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發展〉，《打倒日本》，頁 7-9。

²⁴⁰ 〈山東問題〉，《打倒日本》，頁 70-75。

他處的註釋曾批評中國教科書強調失去土地的說法：「各民族若將其歷史無限遡及的話，自民族之版圖將陷於不明之狀態。漢民族將回溯黃河，不得不回到中亞細亞。所謂『失去之領土』，以前難道不是『奪來之領土』嗎？」²⁴¹另一方面，《打倒日本》的註釋認為日本只是保障自己應得之權利，抵抗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維護東亞的和平，日本是守國際法的國家，之後我們將說明這樣的說法其實也是一面之詞。從《打倒日本》一書中可以看到，中日間對立之歷史認識使得彼此進行理性對話變得很困難。

從《打倒日本》所蒐集中國教科書的「排外」記事與註釋的反擊，我們則可以看到《打倒日本》編輯者對中國「排外」運動、近代中國的認識。面對中國教科書中呼籲要對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與人口的壓迫，《打倒日本》的註釋藉由否定中國特別是中國政府，來合理化外國勢力在中國存在的正當性。在中國教科書關於帝國主義政治壓迫的部分，面對其中強調不平等條約、租借地與租界等利權對中國危害的部分，《打倒日本》的註釋否定中國政府有收回種種利權之能力，拒絕放棄列強在中國之利權，「支那若有履行國際間義務、保全國內秩序之實力的話，不平等條約逕行撤回。不履行義務，只依權利上的主張期望達成目的之說詞，只有在支那才適用」、「因支那無法自治自立，外國自衛的管理與保護到底無法撤回。」²⁴²強調租界、租借地在外國人的治理下欣欣向榮，中國人不知感恩卻要收回，「不毛之曠野，如今化為殷賑之街區、港埠，對日本、其他外國之努力精進，支那人何等感謝之念皆無，卻說要無償收回？」²⁴³〈五四運動〉的註釋認為：

五月四日之學生運動或雖可謂民論外交之舉動，但斷不可稱為支那民主主義之勝利。支那之現實於今猶為新舊軍閥之專制，而無民主之實。因國民黨閥之搾取誅求，下層民眾與前清時代相比更為貧窮。〔彼等〕大聲高呼外國之政治、經濟壓迫，但於支那為國民真正之敵者卻多為為政者，彼等之煽動不外為爭奪政權之手段。²⁴⁴中國政府腐敗不堪，民族主義運動是中國政府爭奪政權煽動下的產物，這基本上代表《打倒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看法。《打倒日本》的註釋否定近代中國所有的政府，不止是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教科書也否定的清朝政府、軍閥政府不足取，對國民政府的評價也相當負面：「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為與北洋軍閥之奉天閥連結、唆使北京之官僚，由所謂土豪劣紳浙江財閥把持政權者。」²⁴⁵

在中國教科書關於帝國主義經濟與人口壓迫的部分，《打倒日本》的註釋中也可看到

²⁴¹ 〈中國領土的喪失〉，《打倒日本》，頁155。

²⁴² 〈帝國主義是甚麼〉、〈不平等條約〉，《打倒日本》，頁123、153。

²⁴³ 〈收回租界〉，《打倒日本》，頁166-167。

²⁴⁴ 〈五四運動〉，《打倒日本》，頁98。

²⁴⁵ 〈中國國民黨已往的奮鬥〉，《打倒日本》，頁142。

許多否定中國的看法。面對中國教科書中談到外國人管理海關、外國貨幣、外國輪船公司與外國人口不斷增加對中國的威脅，《打倒日本》的註釋認為低關稅只是減少軍閥的收入，對消費者有利，還指責軍閥濫收釐金；外國貨幣在中國盛行是中國軍閥沒有能力發行需大量準備金的信用紙幣之故，認為中國教科書中認為外國銀行具「掠奪」機能的說法是「支那式牽強附會之說法」；中國輪船招商局的失敗，意味著中國人沒有經營大企業的能力；中國人口停滯是戰禍、疾病與土匪橫行之故，若中國全國由外國管理，則人口停滯的情況就會改變。²⁴⁶

簡而言之，《打倒日本》編輯者對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看法相當負面，否定中國特別是中國政府，認定中國民族主義僅是政府權謀煽動的結果。《打倒日本》編輯者對中國的批評，「支配支那者至今猶此精神——即無自省、正觀之精神」²⁴⁷其實也可以用在《打倒日本》編輯者自己身上。《打倒日本》編輯者一方面認為日本為維護東亞和平與中國民眾之幸福，而在中國享有應得之權利；一方面又採取力即正義(Might is right; Macht ist Recht)的現實主義原則，兩種觀點常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如前面提到的廿一條要求的註釋中說：「大正四年之日支交涉不應稱為侵略。於山東日本雖占領膠州灣，……並無根本永久占領之意志。只是當時英俄之勢力於滿蒙方面大為發展，日本也有鞏固於支那地位必要。」一方面強調自己沒有領土野心，一方面又認為既然別國在中國的力量擴張，日本也不能落於人後，這很明顯是種帝國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國教科書〈國際的信義〉記事中藉孫文之口指責日本人履行英日同盟攻打德國膠州灣租借地，卻不信守馬關條約保持朝鮮獨立的規定，併吞朝鮮。同項註釋反駁說「彼一時此一時，史上之事悉皆如此，然獨甚於貴國？」，頗有既有事實既已造成，何須爭辯的意味。²⁴⁸中國教科書〈清季列強壓迫〉記事中談及清末以來因戰爭而失去不少領土、租借地與租界，同項註釋認為「戰敗國對戰勝國進行賠償為歷史之常道。」也是一種有力量者為大的想法。²⁴⁹這些想法不得不說與前面強調日本維護東亞和平、促進中國民眾幸福的說詞有很大的落差。

²⁴⁶ 〈外國人管海關〉、〈外國銀行〉、〈外國輪船〉、〈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打倒日本》，頁 178、180、182、194。

²⁴⁷ 〈維新與排外〉，《打倒日本》，頁 50。

²⁴⁸ 〈國際的信義〉，《打倒日本》，頁 43-44。

²⁴⁹ 〈清季列強壓迫〉，《打倒日本》，頁 135-137。

陸、結論

在本論文的前言部分曾提到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是，在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其真實面貌究竟為何？特別是主要的引起方日本方面的狀況為何？是怎樣的環境造就了教科書問題？為了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本論文選擇以東北地域為視角，希望能夠超越一國史觀的局限性；為避免浮光掠影的泛泛而論，本論文選擇以九一八事變前滿鐵公學堂教育為個案，希望能夠比較深入地理解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

乍看之下，滿鐵公學堂教育與近代中日教科書問題似乎沒有關連性，不過實際上則並非如此。滿鐵公學堂教育是近代中日教育互動上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依據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理念，作為九一八前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實際中心的滿鐵設立了公學堂，對中國人兒童進行教育。特別在 1920 年代，由於滿鐵附屬地的特殊地理環境，與滿鐵試圖尋求中日「共存共榮」的理念，滿鐵公學堂在運作上較其他殖民地小學如關東州公學堂更靠近中國小學，許多課本使用中國的教科書。

不過中國教科書內的「排日」內容，特別在 1920 年代，一直困擾著滿鐵教育者。由於當時中國的小學教科書採「一綱多本」的審定制，滿鐵公學堂原本的解決方法是選用「排日」內容相對少的教科書，如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但北伐以後，由於國民政府新的重視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教育方針。使得滿鐵教育者認為新的三民主義化教科書的「排日」內容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情況，他們選擇自編「合適」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是往後「滿洲國」教科書的基礎，而在「合適」的教科書編成之前，暫時以原本使用的教科書，加以「修訂」後使用。

東北易幟給予在滿日人很大的刺激，滿鐵教育者也做出了回應：在長春公學堂小林治郎的提案、滿鐵地方部長保保隆矣的同意下，滿鐵教育者開始收集中國的「排日」教科書。在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的運作下，滿鐵教育者收集的中國「排日」教科書資料被譯成英文，成為 1929 年太平洋會議上日本向國際控訴中國「排日」運動盛行的例證之一，並在日本國內出版了《支那排日教材集》。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在知名右派分子大川周明及原滿鐵地方部長保保隆矣的運作下，滿鐵教育者收集的中國「排日」教科書資料以《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等書名被重新出版，取「打倒日本」這樣聳動、有些煽情的題名，恐怕有藉以左右日本國內的輿論，以支持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為。《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中認定中國教育是「排日」教育，是國民黨用意深刻的教科書認識，成為中日戰前日本主流的教科書認識。

從《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等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日彼此的歷史

認識的差異性，幾乎到了完全對立的程度；《打倒日本》編輯者一方面認為日本為維護東亞和平與中國民眾之幸福，而在中國享有應得之權利；一方面又採取力即正義的現實主義原則，過度低估中國、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中國認識不得不說有很大的問題。

本論文所研究的滿鐵公學堂教科書與「排日」問題，是相當特定時空下的產物，本論文的狀況並不能完全地反映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的狀況。不過，從本論文仍可看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事情。本論文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1920 年代滿鐵公學堂使用中國教科書的情況，並且解釋滿鐵公學堂為何要使用中國教科書，此為本論文的第貳、參部分；一為 1929 年、1931 年兩次日本方面蒐集「排日」教科書，出版《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事件，並對兩書進行了分析，此為本論文的第肆、伍部分。兩件事情表面看似沒有關連性，但筆者的理解並非如此。1929 年、1931 年《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出版與滿鐵公學堂相關人士有所關連。在長春公學堂堂長小林治郎的提案、前任滿鐵學務課長保保隆矣的支持、滿鐵公學堂各校的分工下，對中國「排日」教科書有系統收集的工作才得以落實，成為兩書出版的基礎。滿鐵公學堂相關人士有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於近代中日關係癥結點的中國東北，並在使用中國教科書的公學堂工作的他們，與其他日本人相較，更有機會感受中國「排日」運動與「排日」教科書的「威脅」。

不過在討論《支那國定排日教材集》、《打倒日本》兩書的出版與滿鐵教育者之關連性的同時，同時也要注意兩者間的關連性並非如此地緊密，而有空隙存在。保保隆矣雖然一開始就有藉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的機會，向日本國內、國際訴說中國「排日」的可怕之念頭，不過從他一開始並不了解京都太平洋會議的意義，而是在滿鐵副社長松岡洋右的指示下，才將收集中國「排日」教科書的內容譯成英文，並於日本國內出版一事來看。保保一開始對如何具體落實向日本國內、國際訴說中國「排日」可怕一事，並沒有明確的方針。1931 年九一八事件前夕《支那國定排日讀本》與《打倒日本》的再出版，當然也與保保隆矣等滿鐵公學堂相關人士有關，不過是否如同右派分子大川周明那樣，有明確地運用「排日」教科書議題，遂行其以武力行動解決「滿蒙問題」的想法，是有所疑問的。當然在當時的氣氛下，滿鐵公學堂相關人士恐怕不會反對關東軍以「積極」的作為解決「滿蒙問題」，不過應該不會如大川周明一樣明確。簡單地說，在本個案中「排日」教科書的問題因滿鐵公學堂的相關人士而起，不過事件的後續發展不一定在他們一開始的預期之中。從事後的結果來看，看似可以說本個案是滿鐵教育者、日本政治家與右派分子「緊密合作」的結果。不過筆者認為此事件並不能如此簡單地下定論，至少對當事者而言，是否明確地意識到此點，恐怕是很有疑問的。

以上是筆者對本論文的基本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從本論文的個案中可以看到，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有其醞釀、發展的環境，主要引起教科書問題的當事者，有其複雜的面向，需要小心留意。

不過本論文也有難以解釋或無法處理的部分。首先，從本個案中可以看到 1928 年底東北易幟對滿鐵教育者的衝擊很大，為什麼以前可以忍受中國教科書的「排日」內容，現在卻變得無法容忍，除了改變滿鐵公學堂教科書的使用，還需要向日本國內、國際控訴中國「排日」教科書的可怕？或許我們可以用東北易幟後在滿日人普遍的危機、焦慮感來解釋，若放任事件發展，最後的結局就是被趕回日本。不過如何證明當時滿鐵教育者內心可能存在的危機、焦慮感與其行動之間有何種程度的關連性，是本論文難以處理的部分。

其次，是一個延伸性的問題，關於當時中國小學教科書實際內容的問題。既然日本方面有批判中國「排日」教科書的聲音，那當時中國的教科書究竟是如何理解日本的？是否就如同日方所說的那樣？前面曾經提過，當時中國教科書出版的狀況相當多元，教科書的數目異常龐大。並且以當時中國的狀況，教科書此一類型的出版品很難被有系統地保存的情況下，要進行妥善的收集與分析有其困難。這也是本論文的研究動機雖以戰前中日教科書問題有關，但在實際使用的研究資料上，並未大量使用當時中國教科書的主要原因。

本論文與其說解決了怎樣的問題，不如說發現了值得繼續討論的問題。本部分結論以此作為結束，也以此作為新的可能之開始。



圖十一：舊長春公學堂現址
(長春市寬城區南京小學)

附錄

附表一：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教育一覽表

年代	名稱	年限	科目
1909 〈蓋平公學堂規則〉	公學堂	4-6	修身、讀經、講經、漢文、作文、習字、算術、歷史、地理、理科、體操、手工、圖畫、唱歌、裁縫（女）、日本語
1914 〈附屬地公學堂規則〉	初等科	4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裁縫（女）、手藝（女）
	高等科	3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算術、歷史、地理、理科、體操、手工、圖畫、歌唱
1923 〈滿鐵公學堂規則〉	初級	4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第三、四學年）、算術、體操、歌唱
	高級	2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算術、歷史、地理、理科、體操、歌唱、裁縫（女）、手藝（女）、農業（選）、工業（選）、商業（選）
193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公學校規則〉	初級	4	公民、中國語、日本語（第三、四學年）、常識、算術、體操、歌唱
	高級	2	公民、中國語、日本語、算術、社會、自然、體操、歌唱、美術、裁縫（女）、手藝（女）、農業（選）、工業（選）、商業（選）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二卷，頁 19-113。

附表二：關東州公學堂教育一覽表

年代	名稱	年限	科目
1906 〈關東州公學堂規則〉	公學堂	6	修身、日本語、漢文、算術、體操、裁縫（女）、手工（選）、農業（選）、唱歌（選）
1908 第一次改正〈關東州公學堂規則〉	公學堂	4-6	修身、日本語、漢文、算術、圖畫、唱歌、體操、裁縫（女）
1915 第二次改正〈關東州公學堂規則〉	初等科	4	修身、日本語、漢文、算術、唱歌、體操、裁縫（女）
	高等科	2	修身、日本語、漢文、算術、歷史（1921 增加）、地理、理科、體操、歌唱、裁縫（女）、手藝（女）
1923 第三次改正〈關東州公學堂規則〉	初等科	4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算術、唱歌、圖畫、手工、體操、裁縫（女）
	高等科	2	修身、中國文、日本語、算術、歷史、地理、理科、唱歌、圖畫、手工、體操、實科（男）、裁縫（女）、手藝（女）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第一卷，頁 183-225。

附表三：清末民初中國小學教育一覽表

年代	名稱	年限	科目
1903〈重定學堂章程〉	初等小學堂	5	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
	高等小學堂	4	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術、中國史、地理、格致、體操、手工、圖畫、唱歌
1910	初等小學	4	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樂歌、讀經、講經
	高等小學	4	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術、中國史、地理、格致、體操、手工、圖畫、樂歌、農業、商業
1912〈小學校令〉	初等小學	4	修身、國文、算術、體操、手工、圖畫、唱歌、裁縫（女）
	高等小學	3	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算術、本國史、地理、理科、體操、手工、圖畫、唱歌、農業、商業、裁縫（女）、英語
1915	國民學校	4	修身、國文、算術、體操、手工、圖畫、唱歌
	高等小學	3	修身、讀經、國文、算術、本國史、地理、理科、體操、手工、圖畫、唱歌、農業、商業、裁縫（女）、英語
1922〈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	初級小學	4	國語、算術、社會、自然、工用藝術、形象藝術、音樂、體育
	高級小學	2	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工用藝術、形象藝術、音樂、體育
1928〈小學暫行條例〉	初級小學	4	三民主義、公民、國語、算術、歷史、地理、衛生、自然、樂歌、體育、黨童子軍、圖畫、手工
	高級小學	2	三民主義、公民、國語、算術、歷史、地理、衛生、自然、樂歌、體育、黨童子軍、圖畫、手工、職業科目
1929〈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初級小學	4	黨義、國語、算術、社會、自然、工作、美術、音樂、體育
	高級小學	2	黨義、國語、算術、社會、自然、工作、美術、音樂、體育

資料來源：不著作人，《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一冊，頁 23-27、421-423。

附表四：滿鐵公學堂使用教科書一覽表（1924 年 7 月）

科目	教科書名	發行者或作者	使用公學堂名及使用學年
修身	新法修身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松樹（初一二）、熊岳城、蓋平、奉天、開原、四平街、公主嶺（初級）、長春（初四以外）、撫順
	共和國新修身	商務印書館	松樹（初三四）、長春（初四）
	新法公民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公主嶺（高級）
中國文	新法國語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初級）、松樹、熊岳城（初一二）、蓋平（初級）、奉天（初一二）、開原（初一二）、四平街、公主嶺（初級）、長春（初一二三）、撫順（初一二三）
	新法國文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高一）、熊岳城（高級）、蓋平（高級）、奉天（初三四及高級）、開原（初三四及高級）、公主嶺（高級）、

			長春（高級）、撫順（初四及高級）
	共和國新國文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高二）、熊岳城（初三四）、長春（初四）
日本語 讀本	日本語 讀本	教育會編輯部	各校
	速成日本語讀本	教育會編輯部	蓋平（初四並用）、長春（高級預科）、奉天（高級預科）、撫順（高級預科）
算術	公學堂算術書	教育會編輯部	瓦房店、熊岳城（初二三及高級）、蓋平、奉天（初三四及高級）、開原、公主嶺、長春（高級）、撫順（初三四及高級）
	普通學堂用算術書	關東廳	奉天（初一二）、四平街（初一二）
	新學制算術教科書	駱師會	熊岳城（初一二）、四平街（初三）、長春（初四）
	公學堂算術教科書	教育會編輯部	四平街（初四及高級）、長春（初一二三）
	尋常小學校算術書	文部省	撫順（初一二）
	小學算術書	文部省	撫順（初三以上作爲教師用書）
歷史	新法歷史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各校高級（瓦房店高二除外）
	共和國新修身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高二
地理	新法地理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	各校高級（瓦房店高二除外）
	共和國新地理	商務印書館	瓦房店高二
理科	公學堂理科教科書	教育研究會	各校高級
圖畫	新定書帖	文部省	瓦房店、長春、四平街
	新體圖畫教科書	王雅南	撫順 (松樹、熊岳城、蓋平、奉天、開原、公主嶺不使用教科書)

說明：中國文另有尺牘與習字帖用書。

資料來源：滿鐵學務課編，《滿鐵教育沿革史》，頁 2109-2112。收錄於《「滿洲・滿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四冊。

附表五：滿鐵自編《新時代國語讀本》(1933) 與「滿洲」相關之課文（初級五至八冊）

課數	課名	備註	課數	課名	備註
5-1	滿洲		7-1	滿洲國歌	
5-19	娘娘廟(一)		7-6	湯崗子溫泉	
5-20	娘娘廟(二)		7-7	公主嶺農業試驗場	
5-26	大連		7-13	清三陵	
5-27	奉天		7-22	吉林	
5-33	新京西公園		7-23	哈爾濱	
5-46	滿洲的秋天		7-42	鞍山製鐵所參觀記(一)	
6-1	新京(一)		7-43	鞍山製鐵所參觀記(二)	
6-2	新京(二)		8-1	王道主義	
6-3	大豆		8-2	清太祖起居瑣記(一)	
6-7	白塔		8-3	清太祖起居瑣記(二)	
6-12	鴨綠江		8-8	旅順	
6-13	鏡泊湖		8-14	原站長的殉職(一)	
6-22	滿洲的梨		8-15	原站長的殉職(二)	
6-23	千山		8-16	撫順煤礦	
6-46	吉林人使狗的部落		8-30	關東三寶	
6-47	滿洲的森林		8-45	建國日的早晨	記述「滿洲國」的建國日
6-48	長白山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八冊，頁 196-202。

說明：課數 5-1 為第五冊第一課，以此類推。

附表六：《打倒日本》(1931) 內容大要

第一部 日支關係總說

項目	記事名稱	註釋	說明
1-0-1	日本的現勢	有	註釋認為日本出兵濟南是膺懲暴徒的行爲
1-0-2	日本東洋的勢力	有	註釋反駁琉球、臺灣與朝鮮為日本奪去的說法
1-0-3	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發展	有	註釋認為日本發動日俄戰爭是自衛行動與維持東亞大局的行爲
1-0-4	割讓地	有	註釋認為中國所謂失地過去亦奪自他人之手
1-0-5	國恥紀念歌	有	註釋懷疑黨化教育是否就是排日教育
1-0-6	黃大	無	課文係黃大（中國）受白氏兄弟（西方列強）、黃九（日本）所欺的故事

第二部 歷史的事件

項目	記事名稱	註釋	說明
2-1-1	倭寇的故事	有	註釋認為倭寇是明朝奸商官吏欺詐日本商民引發的結果
2-1-2	弔戚將軍	無	
2-2-1	中日戰爭	有	指甲午戰爭，註釋認為清朝阻礙朝鮮改革
2-2-2	日清戰爭的結果	無	
2-2-3	狡惡的隣兒	無	比喻朝鮮為日本所奪
2-2-4	朝鮮 臺灣	無	
2-2-5	祖母的談話	有	課文藉祖母之口說明鴉片戰爭、五卅事件等事件
2-2-6	臺灣的革命運動	無	
2-2-7	買蓆的故事	無	課文認為應抵制臺灣舊改用國貨
2-2-8	中國喪失的領土	無	
2-2-9	朝鮮亡國的故事	無	
2-2-10	環遊地球的六封信	無	課文談到朝鮮人民在日本統治下的苦境
2-2-11	朝鮮遺民余海山	無	
2-2-12	自由之鐘	有	課文聲援朝鮮三一運動
2-2-13	兩句喪權辱國的話	無	
2-2-14	國際的信義	有	課文談到孫文指責日本不守信用併吞朝鮮
2-2-15	傷心之地	無	指馬關
2-3-1	維新與排外	有	註釋認為八國聯軍之禍是清政府自己釀成的結果
2-3-2	辛丑條約	有	註釋認為八國聯軍之禍是清政府自己釀成的結果
2-3-3	海鷗的話	無	課文藉海鷗之口說明英法聯軍一事
2-4-1	國恥紀念地——金州半島	無	課文談到大連旅順租借地
2-4-2	遊南滿各地與友人書	無	
2-4-3	我國的物產與實業	有	註釋認為滿洲得以開發是日本努力的結果，中國人不思感謝，卻要收回
2-4-4	兩個半島上的商港	有	註釋認為大連的發展是日本努力的結果
2-4-5	遼東半島上兩個漁人	有	註釋認為關東州租借地的發展是日本努力的結果

2-4-6	蒙古與東三省的日俄勢力	有	註釋認為滿洲得以開發是日本努力的結果
2-5-1	山東問題	有	註釋認為日本占領山東符合國際法，廿一條並非不當要求
2-5-2	廿一箇條件和五卅慘案	無	
2-5-3	不平等條約	無	
2-5-4	世界村裏的華氏	有	比喻廿一條要求
2-5-5	五九國恥	無	
2-5-6	五月九日一個國恥紀念日	有	課文以大黃（中國）田產為小黃（日本）所併吞比喻廿一條要求
2-5-7	國恥歌	無	
2-5-8	五九國恥紀念	無	
2-5-9	國辱紀念畫	無	
2-5-10	五七與五九	無	
2-5-11	五月九日的日記	無	
2-5-12	南滿洲來的一封信	有	註釋反駁滿洲日人不斷增加壓迫中國人的說法
2-5-13	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	無	
2-5-14	五四運動	有	註釋認為今日中國猶為新舊軍閥專制，無真正民主
2-5-15	五月四日學生運動	無	
2-5-16	沿海旅行	無	
2-5-17	我國領土不完全	無	
2-6-1	五卅事件	有	註釋認為五卅事件是鎮壓暴徒的緊急措施
2-6-2	五月三十日	無	
2-6-3	上海漢口廣州的慘案	無	
2-6-4	五卅事件	無	
2-7-1	中國國民革命與日本	有	註釋認為日本出兵濟南是自衛之舉
2-7-2	五三濟南事變	無	
2-7-3	國民革命和中國前途	無	
2-7-4	報仇	有	

第三部 政治

項目	記事名稱	註釋	備註
3-1-1	帝國主義是甚麼	有	註釋認為中國仍缺乏自治自立能力，外國不能放棄利權
3-1-2	列強	無	課文認為列強以英日壓迫中國最厲害
3-1-3	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民生	無	
3-1-4	國恥紀念地	無	
3-1-5	可憐的老嫗	無	比喻租借地為各國強占
3-1-6	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	無	
3-1-7	次殖民地	有	註釋認為中國在清朝、軍閥與國民政府的統治下民不聊生
3-1-8	清季列強壓迫	有	註釋認為戰勝國對戰敗國要求賠償理所當然

3-1-9	中華民國之三大禍害	無	分別為列強政治力、經濟力、人口增加的壓迫
3-1-10	仇敵與好朋友	無	
3-1-11	侵略	無	
3-1-12	反抗與聯絡	無	
3-1-13	奪去我國的權柄	無	
3-1-14	奪回我國的權柄	無	
3-1-15	國恥紀念畫	無	
3-1-16	中國國民黨已往的奮鬥	有	註釋認為國民政府係與奉天軍閥、浙江財閥勾結之政權
3-1-17	列強政治力的壓迫	無	
3-1-18	列強政治的壓迫	無	
3-1-19	外交可以一朝亡中國	有	註釋認為中國的排外教育是非現代、反國際協調路線的教育
3-1-20	日本兵力可以亡中國	無	
3-1-21	外國人騙我國的金錢	無	
3-1-22	奮鬥	無	
3-1-23	可恨呀	無	
3-1-24	帝國主義	無	
3-1-25	五月裏	無	課文談到五四、五七、五九與五卅等國恥紀念日
3-2-1	不平等條約	有	註釋認為中國不履行義務，無法撤回不平等條約
3-2-2	中國是列強的次殖民地	無	
3-3-1	中國領土的喪失	有	註釋批評中國人歷史無限追溯的觀念，以為過去曾經擁有的領土都是失土
3-3-2	租地收稅	有	註釋說明租界收稅的正當性
3-3-3	租界	有	註釋認為租界的發展是外人努力的結果
3-3-4	各租借地條約	有	註釋認為日本租借旅順、大連合情合理
3-3-5	各國租借港灣	無	
3-3-6	別種之經濟壓迫	有	註釋為外國船運與滿鐵進行辯護
3-3-7	租借地	無	
3-3-8	收回租界	有	註釋認為租界的發展是外人努力的結果，中國人不思感謝，卻要收回
3-4-1	我國的鐵路	無	
3-4-2	我國的航路	無	
3-4-3	我國的郵務	無	
3-4-4	我國的電報	有	註釋強調外國各交通設施對中國經濟之正面發展

第四部 經濟

項目	記事名稱	註釋	備註
4-1-1	列強經濟的壓迫	有	註釋強調外貨盛行之合理性
4-1-2	兩個緊要的算題	無	計算辛丑和約之賠款、列強經濟力壓迫之情況

4-1-3	列強經濟力之壓迫	無	
4-2-1	外國人管海關	有	註釋認為關稅低下對消費者有利
4-3-1	外國銀行	有	註釋認為外國貨幣盛行是中國貨幣缺乏信用之故
4-4-1	外國人所造鐵路	無	
4-4-2	瀋陽、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有	註釋認為滿鐵之經營正當而公平
4-4-3	外國輪船	有	註釋認為外國輪船公司發展是中國缺乏經營大企業能力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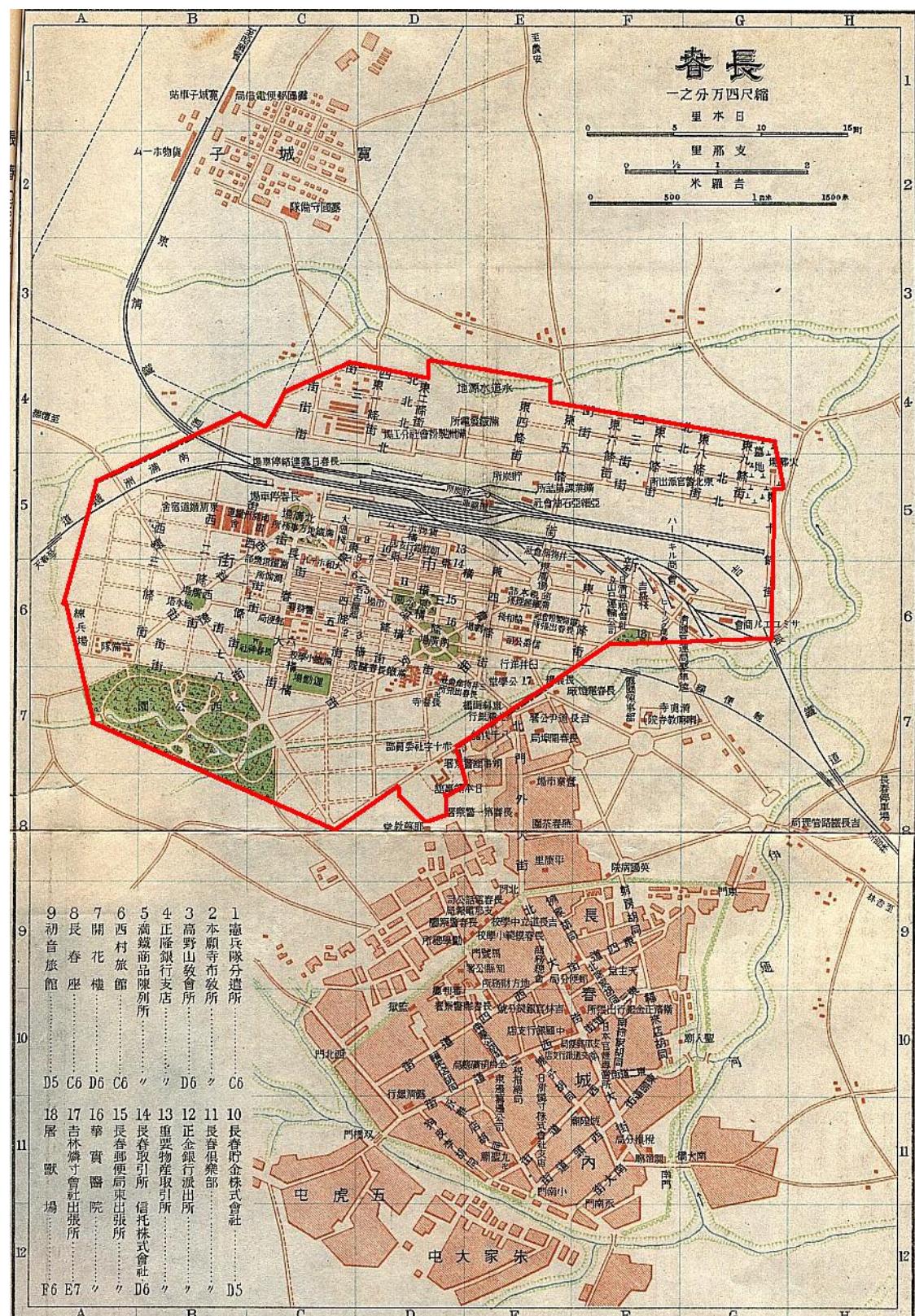
第五部 社會

項目	記事名稱	註釋	備註
5-1-1	怎樣實行民族主義	無	
5-1-2	老大病弱國	無	凱末爾拯救土耳其，而孫文拯救中國
5-1-3	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策	有	註釋批評國民黨不承認北洋政府對外借款，是俄國勞農政府式的想法
5-1-4	民族主義	有	註釋批評中國不思反省，只將問題責任怪罪於他人
5-1-5	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	無	
5-2-1	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	有	註釋認為中國人口不增是戰禍、疾病、土匪橫行之故
5-2-2	中華民族之生死關頭	無	
5-2-3	日本人的圖南政策	有	註釋反駁南洋日人發展在華僑之上的說法
5-2-4	鴨綠江的一劇	有	註釋認為 1925 年中日在查緝走私之衝突，責任為中國
5-2-5	這不是更可恥	無	提及日本人曾占據東沙島
5-2-6	海南島在南海的地位	無	
5-3-1	十二月二十五日怎樣紀念	無	

資料來源：保々隆矣，《打倒日本》，東京：邦文社，1931。

說明：項目 1-0-1 為第一部第零項第一則記事，以此類推。

附圖一：長春地圖（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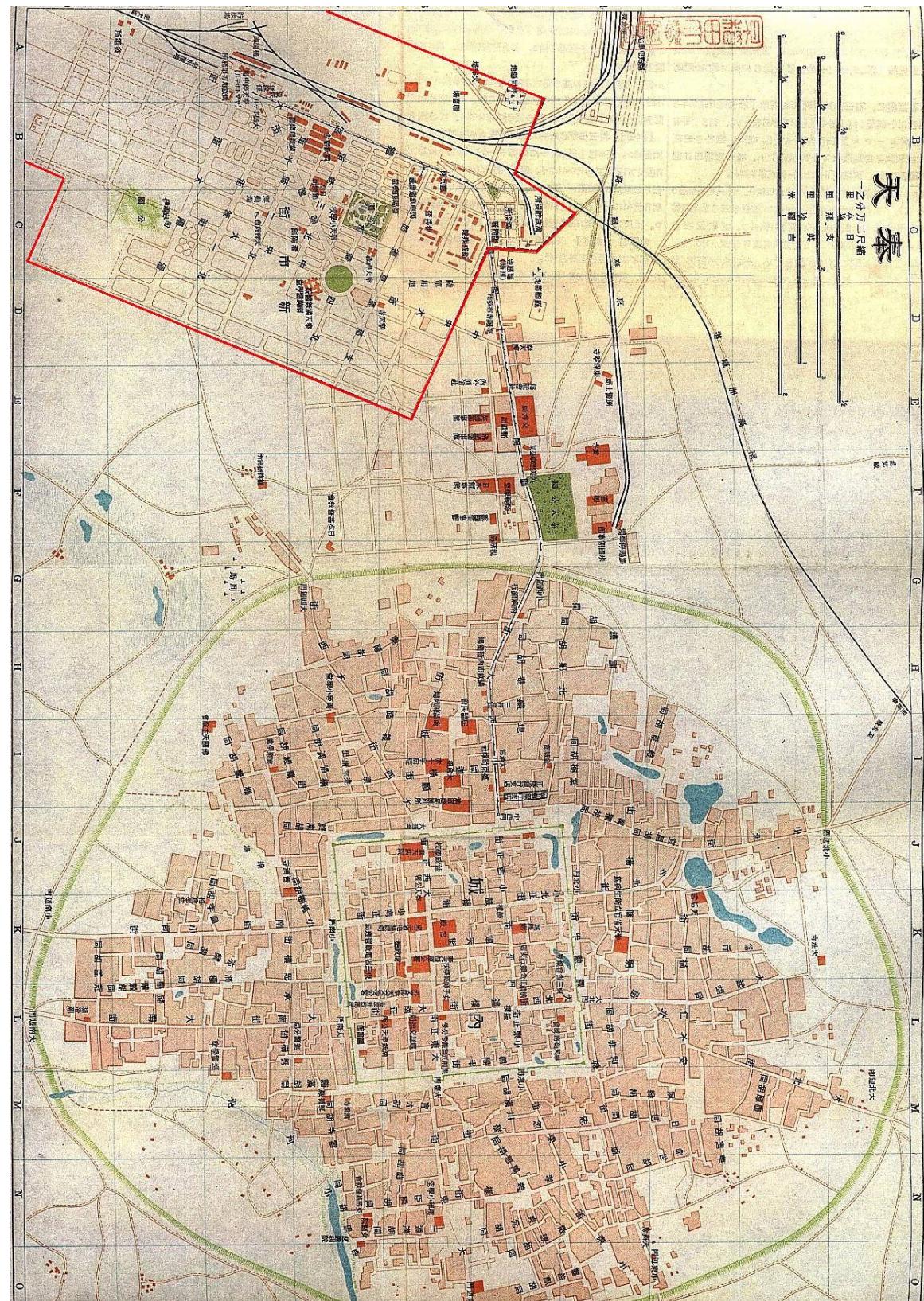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飛び地研究会 2009年5月5日瀏覽

<http://www.geocities.co.jp/SilkRoad-Lake/2917/zatsu/sokaimodoki.html>

說明：滿鐵附屬地為紅色線內區域，公學堂位於E7處。地圖上方寬城子地區為俄國中國東鐵路附屬地，下方為長春城內，城內與滿鐵附屬地之間為商埠地。

附圖二：奉天地圖（1919）



資料來源：世界飛び地研究会 2009年5月5日瀏覽

<http://www.geocities.co.jp/SilkRoad-Lake/2917/zatsu/sokaimodoki.html>

說明：滿鐵附屬地為紅色線內區域，綠色線內區域為奉天城內，城內與滿鐵附屬地之間為商埠地。

附圖三：滿鐵自編《歷史教科書》目錄（1932）

歷史教科書 上冊 目次		
滿洲史		
一	肅慎	一
二	萬里長城	一
三	漢人的移居南滿	三
四	挹婁和扶餘	四
五	高句麗的興亡	六
六	渤海的建國	八
七	遼的興起	一〇
八	金的統一	一四
九	蒙古的勃興	一七
一〇	蒙古的盛世	一九
一一	元的盛衰	一〇
一二	清的創業	一五
一三	清的黃金時代	一〇
一四	清的滿蒙政策	三一
一五	俄國南下政策和清國	一五
一六	滿洲實邊策	三三
一七	日清戰爭和俄國的經 略滿洲	三五
一八	日俄戰爭和滿洲	三八
一九	最近的滿洲	四三
二〇	清的滅亡和革命的爭 亂	四一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第二篇 東洋史		
一	近古的中國	一
二	近古的朝鮮	九
三	近古的日本	一
四	近世的中國（一）	一六
五	近世的中國（二）	一〇
六	近世的朝鮮	一四
七	最近世的東洋（一）	三一
八	最近世的東洋（二）	三四
九	現代的日本	三七
一〇	現代的中國	三九
一一	近世的日本	一八
一二	近世的中國	一六
一二	近世的朝鮮	九
一三	近世的日本	一
一四	近世的中國（一）	一六
一五	近世的中國（二）	一〇
一六	近世的日本	一八
一七	最近世的東洋（一）	三一
一八	最近世的東洋（二）	三四
一九	現代的日本	三七
二〇	現代的中國	三九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第三篇 西洋史		
一	古代埃及和西亞的文化	一
二	波斯希臘的競爭	三
三	羅馬的統一	五
四	蠻族擾亂歐洲	七
五	回教徒興起及十字軍	一〇
六	歐洲各國的興起	一一
七	新航路新地的發見	一三
八	文藝復興	一五
九	宗教改革	一七
一〇	英國革命	一九
一一	美國獨立	一〇
一二	法國革命	一一
一三	德國統一	一二
一四	歐洲大戰	二七
一五	歐戰以來的事變	二九
一六	國際聯盟和華會	三一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五冊，頁 73-74、98-99。

附圖四：關東州用《公學堂歷史教科書》目錄（1925、1931）

上冊（1925）

目 次	
第一課 中國之太古	一
第二課 周之初世 春秋之世	三
第三課 戰國之世 周末之學術	五
第四課 秦之興亡 西漢之初世	八
第五課 西漢之盛世及末路	一〇
第六課 東漢之興起 佛教之傳來	一三
第七課 東漢之盛世及末路	一六
第八課 南漢之文化	一八
第九課 三國及西晉	一九
第十課 五胡及東晉	二一
第十一課 宋之學術文藝	四二
第十二課 蒙古之興起	四三
第十三課 元之盛世 宋之滅亡	四四
第十四課 元之末路	四五
第十五課 明之初世 咎本兒	四九
第十六課 明之衰微 歐人之東漸	五一
第十七課 明之學藝及美術	五二
第十八課 明代之滿洲	五四
第十九課 清之興起	五五
第三十課 清之新穎及學術文藝	五六
第三十一課 鴉片之戰	五八
第三十二課 清與列國之關係 日俄之戰	六一
第十一課 南北朝	一一〇
第十二課 上代隋唐	一一四
第十三課 隋及唐之初世	一一六
第十四課 唐之外國經略	一一七
第十五課 唐之中世及末路	一一九
第十六課渤海	一二〇
第十七課 遼	一二一
第十八課 五代及宋之初世	一二六
第十九課 宋之中世 宋金之關係	一二八
第二十課 金	一二九

下冊（1931）

公學堂歷史教科書 卷二	
目 錄	
第一課 建國	一
第二課 皇威の榮典	三
第三課 朝鮮の服飾と學問工藝の傳來	五
第四課 仁德天皇	七
第五課 佛教の傳來と工藝・美術の進歩	九
第六課 大化の改新と奈良朝	一〇
第七課 平安朝	一一
第八課 平安朝の文化	一二
第九課 鎌倉幕府と元寇	一四
第十課 建武中興と鎌町時代	一七
第十一課 豊臣秀吉	一九
第十二課 德川家康	二一
第十三課 桂園の復興と江戸幕府の中興	二三
第十四課 關闈と壬辰復古	二四
第十五課 明治維新	二七
第十六課 宪法發布	二九
第十七課 朝鮮事變と日清戰爭	三〇
第十八課 文物の進歩	三一
第十九課 日露戰爭	三四
第二十課 平和條約と韓國併合	三七
第二十一課 世界大戰亂に於ける日本の參戰	三八
〔附 錄〕系 圖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五冊，頁 7-8、45-46。

附圖五：滿鐵自編《歷史教科書》課文（1932）

上冊第十九課：最近的滿洲

一九 最近的滿洲

(1) 中日條約 從前當歐洲大戰勃發，日本和德國宣戰，攻陷了青島。日本看到民國的情勢，知道要想確保東亞的和平，非鞏固中、日的關係不可，所以到第二年就締結中日條約。其主要點如左。

第一、日本在山東省，繼承德國的既得權。

第二、延長關東州及南滿鐵道的租借期限。

第三、承認在南滿洲有商租和居住權，以及在東蒙古有合辦農業權。

第四、中國的港灣島嶼，不應割讓於列強。

歐洲大戰後日本把青島還給民國，以表示沒有領土上

的野心。其他協定事項，是把日俄戰後日本在滿洲所得的地位利權，綜合起來，易於明瞭，以避免中、日間的紛爭，並且豫防列強的干涉而締成的。

民國革命以來爭亂不已，國民的生活，極其不安，可是在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地，因為有鐵道的便利，經濟和文化都很發展，將來或能建設理想生活的區域，就是這條約的價值。

(2) 張作霖的出世和失敗
東三省的總督，駐在奉天，招駐防閨使，實際上成了滿洲的王。

天津的張作霖，做自己的羽翼。其後張作霖的勢力漸次伸張，初爲奉天省督軍，繼又任爲東三省巡閱使，

充實自家的勢力。他又本着國民政府排外的方針，忘却和睦鄰邦的大義，遂蹂躪日本在滿洲的各種權利，並迫害鮮農，惹出來許多不祥的事情。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的軍隊，在奉天的北方炸壞了滿鐵路線，並擊射巡察路線的日本兵。故此中日兩方面的軍隊，就引起不幸的大衝突來了。後來日本軍隊能攻破多數的張軍及其聯絡的兵匪，到底把他的勢力，由滿洲的地方，盡數的驅逐出去。結果滿洲的人民等，從盧政中自然被救得慶更生。二十一年二月，各省長及蒙古王等會議於奉天，議決建立新國家，國號滿洲，年號大同。三月九日推戴溥儀爲執政，在新首都新京長春，舉行盛大的建國式，完全脫離國民政府和舊軍閥等關係。於是這尊重民意，努力治安，使三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五冊，頁 95-97。

附圖六：滿鐵自編《地理教科書》目錄（1932）

地理教科書 上冊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編 滿洲
第二章 地方誌	一、位置、境域
第三編 中華民國	二、地勢
第四章 地方說	三、氣候
第五編 關東州	四、產業
第六編 本部	五、交通
第七編 中國南部	六、政治
第八編 蒙古	七、住民
第九編 中國中部	
第十編 中國北部	
第十一編 新疆	
第十二編 青海、西康、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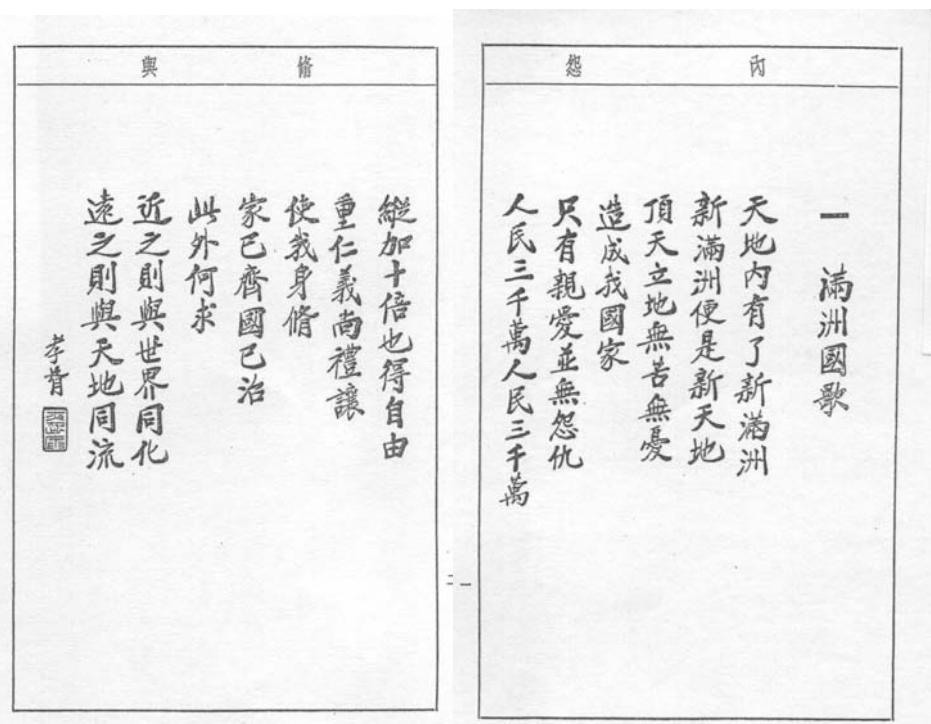
地理教科書 下冊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四篇 日本
第二章 各說	一、位置、境域
第三章 地勢	二、地勢
第四章 氣候	三、氣候
第五章 亞細亞洲	四、北海道、樺太
第六章 大洋洲	五、臺灣
第七章 澳大利亞	六、朝鮮
第八章 紐西蘭	
第九章 海威夷群島	
第十章 其他諸島	
第十一章 各說	
第十二章 總說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五冊，頁331-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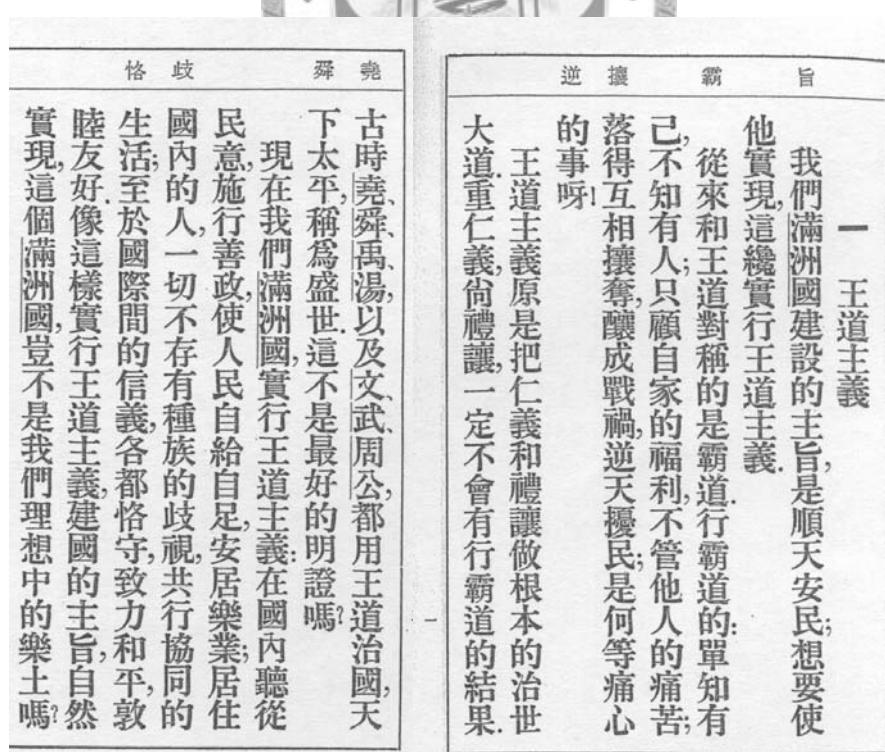
380-381。

附圖七：滿鐵自編《新時代國語教科書》部分課文（1933）

第七冊第一課：滿洲國歌



第八冊第一課：王道主義



資料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四冊，頁305-306、370-371。

附圖八：《支那國定排日讀本》之廣告（1931年10月）



資料來源：《東亞》，4：10（東京，1931.10），廣告頁。

廣告之文字為：

於純真兒童之教材中，公然羅列對友邦之罵詈謔謗，恬然不顧之政府當局，果真存在於世界之何處？此實乃支那政府當局，多年來對我國抱持之態度。若想到受如此教育之兒童，成人後於彼我國交之影響，真不禁戰慄。

將現下之排日運動，單視為市井無賴之徒之雷同，乃甚為輕率之事，在其背後實潛藏政府當局之方針。此為何種親善？何種共存？

弊局曩昔雖於（中國）國定教科書中摘出翻譯此種排日記事並公刊之，但其後彼我國交仍走上益加惡化一途，前途不堪憂慮。本普及版刊行之所以為，不外有以此使我國民瞭解支那對日態度之根源，欲使我對支國交回復正道之微衷。

附圖九：《打倒日本》之插圖



資料來源：保々隆矣監修，《打倒日本》，封面頁。

下方文字為：〔該圖為〕依三民主義收回國權之意？……看吧，不掃裡頭只掃外面
(按：暗示中國不修內政只排外)，此為〔中國〕國內至今尙且紛亂之所以。

徵引文獻

一、 史料

(一) 前人著述

1. 中文

臼井勝美訪問・陳鵬仁譯，《張學良與日本》，臺北：聯經，1994。

楊效震，〈解放前遼陽教育概況（1904-1946）〉，《遼寧文史資料》，瀋陽：瀋陽人民出版社，1985，第十二輯，頁 154-181。

國民政府外交部編，《中日問題之真相：參與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提出之二十九種說帖》，臺北：學生書局，1975。

雷殷，《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哈爾濱市國際協報館，1929。

2. 日文（戰前日文著作漢字用當時通用漢字）

大川周明顯彰會編，《大川周明日記》，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86。

山崎鑒一郎，《最新滿洲寫真帖》，大連：大正寫真工藝所，1939。

矢內原忠雄，《滿洲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4。

自治指導部調査課編，《奉天省中心教育調査（事變前後）》，奉天：自治指導部調査課，1932。

伊豆井敬志，《滿鐵附屬地經營沿革全史》，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9。

佐田弘志郎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二次十年史》，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8。

松本豐三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8。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

保々隆矣監修，《打倒日本》，東京：邦文社，1931。

岩波書店編，《教育科學》，東京：岩波書店，1931。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東京：中央公論，1989。

松原一枝，《幻の大連》，東京：新潮社，2008。

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編《樞の木カゲ》，大連：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1932。

高橋嶺泉，《滿鐵地方行政史》，大連：滿蒙事情調查會，1926。

草柳大藏，《實錄満鉄調査部》，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

陸軍省，《支那の國定教科書に關する一考察》，東京：陸軍省，1929。

陸軍省調査班，《支那の排日侮日に就いて》，東京：陸軍省調査班，1931。

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一外交官の回想》，東京：岩波書店，1950。

新渡戸稻造編，《太平洋問題：一九二九年京都會議》，東京：太平洋問題調査會，1930。
嶋田道彌，《滿洲教育史》，大連：文教社，1935。收於《旧殖民地教育史資料集》，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

滿洲事情研究部編，《滿洲教育史略》，大連：滿鐵地方部學務課，1933。

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林克馬），《滿鐵初等教育研究會第二部沿革史》，奉天：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初等教育研究會，1937。

關東長官官房文書課，《關東廳要覽》，大連：關東廳，1932。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勁草書房，1965。

3. 英文

Christie, Dogald, Christie, Iza.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 and recollections of Dogald Christie.* C.M.G. London: Constable, 1914.

4. 教科書

呂思勉編，《新式地理教科書》，上海：中華書局，1924，高級小學，1-6 冊。

胡貞慧編，《新時代國語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初級小學，7-8 冊。

譚廣編，《新法地理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24，高級小學，1-6 冊。

（二）雜誌

《內務省納本月報》（東京，1930-1936）

《南滿教育》（大連、新京（長春），1920.11-1940）

《奉天教育雜誌》（奉天（瀋陽），1921.11-1928.9）

《東北文化月報》（奉天，1923-28）

《東亞》（東京，1928-1944）

《教育雜誌》（上海，1909-1949）

《滿鐵教育たより》（新京，1935-1937）

（三）史料彙編

1. 中文

顧明遠編，《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遼寧省教育史編纂委員會編，《遼寧教育史志資料》，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2. 日文

みすず書房編，《現代史資料》，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1967，國家主義。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編，《中国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

竹中憲一編，《「滿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東京：綠蔭書房，2005。
「満洲国」教育史研究会編，《「満洲・満洲国」教育資料集成》，東京：エムティ出版，
1993。

（四）統計資料、年鑑與檔案

1. 中文

不著作人，《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傳記文學，1971。
外交部編，《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53。
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2. 日文

《日本外交文書》收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9年2月13日瀏覽，網址：<http://www.jacar.go.jp/>

外務省法制局編，《外地法制誌》，東京：外務省，1966。
秦郁彥編，《「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1。
圖書研究會，《綜合出版年鑑》，東京：圖書研究會，1932。

二、論文

（一）中文

川島真，〈中日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問題為主〉，中國研究工作坊（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舉辦），2005年12月13日。見川島真研究室，2009年1月20日瀏覽，網址：www.juris.hokudai.ac.jp/~shin/

徐冰，〈中國近代教科書與日本〉，《日本學刊》，1998：5（北京，1998.9），頁108-115。
徐冰，〈1914年中日教科書紛爭論考〉，《日本學論壇》，1999：1（北京，1999.1），頁1-7。
徐冰，〈民國時期中日教科書考略〉，《日本學刊》，2001：2（北京，2001.3），頁125-138。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1（臺北，2003.6），頁33-84。

唐啓華，〈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兼論外交史的「神話」與「史實」〉，《基調與變奏：7-20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239-255。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臺北，1986.6），頁371-402。

(二) 日文

- 山住正巳，〈「支那排日教材集」と教科書問題〉，《軍縮問題資料》，150（東京，1992.5），頁38-45。
- 竹中憲一，〈日本の關東州・満鉄付屬地における中国人教育——「満州國」成立以前〉，《人文論集》，31（東京，1993.2），頁1-24。
- 佐藤尚子，〈教育権回収運動下の中国キリスト教学校〉，《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5，（東京，2002），頁27-37。
- 尾形洋一，〈東北交通委員会と所謂「満鉄包囲鉄道網計画」〉，《史学雑誌》，86：8（東京，1977.6），頁39-72。
- 芝崎文仁，〈帝国教育会〉，《文学と教育》，171（東京，1995.11），頁57-59。
- 砂山幸雄，〈「支那排日教科書」批判の系譜（〈特集〉戦前期教科書問題研究（2））〉，《中國研究月報》，59：4（東京，2005.4），頁1-19。
- 閔斗基〈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教科書と時代状況——1920年代末から1930年代初期の初等学校教科書の内容分析〉《近きに在りて》44-45（東京，2004.6），頁137-151。
- 楢木瑞生，〈満鉄の教師たち——中国人教育に携わった日本人の履歴〉，《同朋大学紀要》，2（名古屋，1988），頁67-103。
- 楢木瑞生，〈南滿中学堂覚書〉，《同朋大学論叢》，56（名古屋，1987.7），頁155-180。
- 楢木瑞生，〈日本旧植民地における教育——1920年代の「満州」における中国人教育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紀要》，20（名古屋，1973.3），頁121-133。

三、 専書

(一) 中文

1. 日文譯作

-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水野明（李明）著・鄭樸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西村成雄著・曾淑卿譯，《張學良——「滿洲」與中日之霸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秦郁彥著・梁鴻飛、王健譯，《日本官僚制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1。

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 中文作品

-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2002。
-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范立君，《近代關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3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金光耀、王建朗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4。
- 郭建平，《奉系教育》，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6。
-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 程維榮，《近代東北鐵路附屬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8。
- 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
-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 蔡杏芬，《抗戰前十年中國的小學教育：魯青地區個案研究，1928-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2001。
-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

（二）日文

-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在まで》，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
- 三輪公忠，《松岡洋右——その人間と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 大江志乃夫，《張作霖爆殺》，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
- 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東京：講談社，2009。
- 小林英夫，《満鉄：知の集団の誕生と死》，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 小林英夫，《満州と自民党》，東京：新潮社，2005。
- 小林英夫，《〈満洲〉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
- 山本有造，《「満洲国」経済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
-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社，2004。
- 山室信一，《日露戦争の世紀——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界》，東京：岩波書店，2005。
- 山岡道男，《太平洋問題調査会研究》，東京：龍溪書舎，1997。
-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社，1970。
-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 平野健一郎，《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4。
- 加藤陽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東京：講談社，2002。
-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東京：岩波書店，2007。
- 加藤聖文，《満鉄全史——「国策会社」の全貌》，東京：講談社，2006。
- 西村成雄，《中国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93。
- 西村成雄，《張学良：日中の霸権と「満洲」》，東京：岩波書店，1996。
- 竹中憲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柏書房，2000。
- 竹中憲一、渡部宗助編，《教育における民族的相克——日本植民地教育史論 I》，東京：東方書店，2000。
- 佐藤尚子編，《日中比較教育史》，横浜：春風社，2002。
- 岡部牧夫，《満洲国》，東京：講談社，2007。
- 岩瀬彰，《「月給百円」サラリーマン——戦前日本の「平和」な生活》，東京：講談社，2006。
- 阿部洋《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戦前日本の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
-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1983。
- 島田俊彦，《関東軍》，東京：講談社，2005。
- 塚瀬進，《満洲の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 鈴木隆史，《日本帝国主義と満洲》，東京：塙書房，1992。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磯田一雄，《皇國の姿を追って》，東京：皓星社，1999。

(三) 英文

-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Duus, Peter,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Gordon, Andrew.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irano, Kenichiro (平野健一郎),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2: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 Cambridge, MA: Thesis (Ph.D.)—Harvard University, 1982.
- Matsusaka, Yoshihisa Tak.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McCormack, Gavan.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Tanaka, Steve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圖片出處

圖一：滿鐵標誌

來源：<http://plaza.rakuten.co.jp/niannianyouyu/diary/?ctgy=3> 2009年2月22日瀏覽

圖二：1930年代的奉天附屬地

來源：山崎鑒一郎，《最新滿洲寫真帖》，頁36。

圖三：九一八前中國東北要圖

來源：吳修安繪製

圖四：在滿中國人教育系統表

來源：關東廳學務課編，《滿洲に於ける我邦の教育施設》，頁44。收錄於《「滿洲・満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四冊。

圖五：遼陽公學堂宿舍狀況

來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學務課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營教育施設要覽》。收錄於《「滿洲・満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四冊，頁688。

圖六：日本駐華使館所蒐集的「排日」繪畫（1926年蘇州中學實驗小學）

來源：《日本外交文書》<http://www.jacar.go.jp/> Jacar B0401144900 畫面四，2009年1月20日瀏覽

圖七：滿鐵附屬地與關東州租借地使用課本中出現的國旗

來源：竹中憲一編，《「滿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四冊，頁20、46。

圖八：小林治郎

來源：「滿洲國」教育史研究會編，《「滿洲・満洲國」教育資料集成》，第十四冊，頁129。

圖九：松岡洋右

來源：加藤聖文，《滿鉄全史——「國策會社」の全貌》，頁71。

圖十：大川周明

來源：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封面。

圖十一：舊長春公學堂現址（長春市寬城區南京小學）

來源：陳榮聲拍攝